

房山解放概况

宋成明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联合发起了平津战役。解放房山、良乡县城不仅是平津战役外围战的一部分,而且拉开了解放北平的序幕。

1948年12月初,华北军区第7纵队20旅在刘秉彦旅长的带领下,沿平汉铁路乘胜北上,在解放保定、高碑店、涿县后,到达北平西南50公里的房山县城南,将指挥部设在房山城南2公里的顾册村,为扫清北平敌人外围据点,制订了解放房山城的作战方案。对房山城作战,重点是攻打城西南的小山坡、城西的山顶庙、城东北的齐家坡三个守城据点,驱房山城内敌人逃往北平城,以加重北平城内守敌的负担。为此,部署20旅58团攻打小山坡,59团攻打齐家坡,60团作后备;房山、良乡独立团和民兵大队配合主力部队行动;19旅57团及良乡民兵大队担负截击北平、良乡敌人增援房山和房山敌人北逃的任务。

房山人民积极支援解放房山城的战斗。房山县委、县政府抽调县城附近五区区委书记张进儒、四区区长吕镒专作随军支前工作,作战需用的人力、物资,由县城附近村庄全力以赴地支援,粮菜保证供应,马车、担架保证需要,民兵及时运送伤员,妇女昼夜烧开水和护理伤员,积极配合部队作战。

12月7日,作战部队包围了房山城,并以顾册为中心,开始向小山坡、山顶庙和房山城挖战壕,修筑作战工事。

房山城内和周围据点守敌,有保安33团2800多人及驻房山城大乡队500多人,配备各种迫击炮23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50挺,在团长张德祥、副团长陈亚林的指挥下,负隅顽抗。

20旅包围房山城后,旅长刘秉彦亲笔致信张德祥,讲明形势,劝其立即投降。在守敌拒绝投降的情况下,20旅按原作战方案,向房山城发起总攻击。

小山坡是攻击的重点。守敌在小山坡修筑了坚固工事,山顶上有3丈高的炮楼一座,四周有围墙和射击掩体,围墙外有宽4米、深3米的壕沟,壕沟底埋有地雷,壕沟外有铁丝网,网上绑有地雷。12日晚8时,刘秉彦旅长命令59团一营对小山坡进行攻击,部队向上冲,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向下压,战斗十分激烈。两个50斤炸药包爆炸后,壕沟没被炸塌,敌人戒备森严,战斗失利,我军牺牲40多人,还有些战士受了伤,部队撤了下来。

13日,20旅58团二营攻打齐家坡。齐家坡守敌修筑了坚固的地堡,配备了重机枪和迫击炮。上午9点,进攻战打响,二营六连主攻,守敌200多人顽抗。敌人火方凶猛,六连失利。营长蒋修直又从四连调来一个排,命令六连第二次冲锋。下午两点,六连再次发起攻击,用迫击炮、平射炮轰炸敌地堡,二营教导员蒋志鸿带领突击队冲入敌阵地,经过一小时激战,终于占领了齐家坡。这次战斗俘虏敌人100多名,缴获机枪4挺、步枪88支、子弹3800发。

13日晚9点,58团一营第二次攻打小山坡。刘秉彦旅长亲临阵地指挥,调来炮兵营将山炮安放在小山坡西南,距敌炮楼400米的地方。攻击战开始后,营长刘喜勤带领二连战士冲锋。当战士冲到距敌炮楼百米处,刘喜勤连发两颗信号弹。刘秉彦旅长看到信号弹,立即命令炮兵向小山坡连续开炮。炮弹平穿敌炮楼,炮楼被摧毁。二连战士冲进敌阵地,敌人拼命向房山城内溃逃。我军占领了小山坡。

齐家坡、小山坡被我军攻占后,房山城内守敌乱作一团,张德祥向伪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电报告急;楚溪

春回电要张德祥死守县城，若守不住就突围，如果突围不成就杀身成仁。张德祥接到电报，于13日午夜召集军政头目开紧急会议，决定弃城逃跑。14日晨3时，张德祥率保安团近千人，出北门向北平城内逃去。

山顶庙守敌没等我军攻击，便自动撤离炮楼，随房山城守敌仓惶出逃。

1948年12月14日清晨，房山县委、县政府随军队进入房山城内。

在解放房山县城的当天夜里，良乡县城的守敌弃城逃跑。14日早晨，良乡县委书记霍梁、县长阎振峰带领干部和民兵进入了良乡城内。

房山、良乡县城的解放，标志房山、良乡县全境的解放，为北平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房山城解放纪实

张东升

1948年12月，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中央军委分析了全国和华北的军事形势，又及时组织了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战场守敌傅作义集团总兵力六十余万人，以一字长蛇阵摆在从张家口到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一线。慑于我军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中的胜利，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他们既想从海路南逃，又想向西窜向绥远。因此，平津战役的关键一着，在于首先稳住敌人，不使其南逃或西窜。于是，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兵团，对平、津、张之敌实行战略包围，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办法，先稳住敌人，并隔绝诸敌之联系，切断敌之逃路。待完成总的战略部署后，再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术，各个歼灭。

平津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2月5日至21日，这是实行战略包围、战役分割阶段；第二阶段是12月22日至1949年1月15日，是执行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的阶段；第三阶段是1月16日至31日，和平解放北平的阶段。

战役一开始，即从12月5日起，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主力兵团密切配合，以突袭的办法，迅速将华北之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孤立据点……解放房山城的战斗，即属于平津战役第一阶段北平外围战的一部分。

全国解放战争，大致分为过渡、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几个阶段。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到1948年，房山人民的斗争也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自1948年3月的北南采——半壁店战斗和5月的解放坨里的战斗以后，解放区逐步扩大。为加速胜利的进程，除房良独立团和游击队频频出击，机动灵活地歼灭小股敌人外，配合军事斗争，县区干部和敌工人员，还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做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在解放区内，则抓紧土地改革的收尾工作，组织领导广大农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彻底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而斗争。

1948年5月以后，国民党正规军大部撤守北平，只有丰台、长辛店有残部留守。琉璃河至良乡铁路沿线和良乡至房山公路沿线地区，留给房、良两县保安团把守。敌人这时正是人心离散，朝不保夕。为防止士

兵逃亡,张德祥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保安团排长以上军官,大部是汉奸、地主、保长、叛徒担任。在政治上,敌人经过精心策划,还建立起政治工作团、军民合作站、自新招待所、社会服务处等组织,用以招降纳叛,刺探情报,进行反动宣传。在军事上,为据守房山孤城,一方面配备武器,扩充兵员,一方面加固城防,深沟壁垒。到1948年秋,敌人城防情况及兵力部署如下:

驻守房山城部从,为国民党河北省保安三十三团,团长张德祥,副团长陈亚林。保安团下设三营:一营营长尤茂之;二营营长马德福;三营营长赵清惠。连、班是“四四”编制;一营四连;一排四班。全团计十二个连,每连一百二十人。全团合计一千五百三十余人。另有王佐、坨里、城关、夏村、赵各庄、周口店乡大乡队数百人。

全团有八二迫击炮二门,三节式迫击炮一门,重机枪六挺,轻机枪五十挺,六〇炮二十门。

房山城东西南北各一里,城墙为方石砌成。城有东西南北四门。城墙上设哨所四十个。四门特备有煤油缸和棉花,专为夜间照明用。城墙半腰有洞,每隔二丈一个,每洞容二三人,内有一或二射击孔。城北面贴西一侧,有地堡二个,沿地道可直通城内。地堡高约五尺。城四门只开南北两门,另两门则关闭。城外有护城壕,深丈五,宽二丈。壕内存水,东南两面较深,约四五尺,北面最浅,个别段没水。水底布有蒺藜,壕外埋有地雷。南门壕沟上有吊桥。壕边土坎上建有地堡,隔二丈一个,每个可容三四人,内有二或三个射击孔。

城内兵力分布:保安团团部驻仓房胡同与北大寺胡同中间;城北街北头路西是一营营部,有一连兵力;城西北角娘娘庙,驻一个连;南街路东三元井胡同对过一个连;南街路西靠南门外驻一个连;马家胡同与三元井胡同中间驻一个连;北关真武庙两旁驻一个连……国民党县政府机关,驻西街靠十字街路北。

房山城外工事:城东北一里是齐家坡,驻有夏村大乡队五十余人,紧急时有两个连的兵力。城西二里是山顶庙,山高五百米,通山顶只有一条险路。庙四周遍布荆棘,内有工事,并布有地雷,外有三道铁丝网,由周口店大乡队一个连驻守,并配有重机枪一挺。城西南半里是小山坡,驻有赵各庄大乡队百余人。三处工事,分别从东北、西和西南三面拱卫房山城,和房山城成犄角之势。

1948年12月,华北军区第七纵队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旅攻击保定之后,乘胜北上。12月5日,由二十旅攻克高碑店,全歼守敌七百名。12月7日,又解放涿县。继而又围歼琉璃河、松林店、窦店等地之敌。之后,未及休整,于夤夜出发,急行军六七十里,于12月12日拂晓前赶到预定地点——房山城南,并乘黑夜隐蔽前进,以二十旅全部和十九旅一个团将房山城包围,指挥部设在离房山城二公里的顾册村。二十旅旅长刘秉彦任攻城总指挥。根据侦察地形和敌人防卫情况,并依据平津战役总的战略部署,很快制定了作战方案。对房山城的攻打集中在三点,即山顶庙制高点,小山坡,齐家坡,给敌人留条逃路,目的是驱敌逃向北平,加重北平守敌的负担。具体任务是:五十九团一营(营长刘喜勤、教导员武文俊)攻打小山坡,五团二营(营长赵修直,教导员蒋志宏)攻打齐家坡;六十团二营配合打山顶庙。完成包围后,战士们即开始构筑工事。攻打齐家坡的五十八团二营,由四连副连长大胡子赵宝山带领战士在距炮楼七、八十米远处挖掘工事。历次攻坚战斗,都是赵宝山带头。只见他一镐下去,刨出一个二十公分见方的木盒。这是敌人埋在炮楼附近的地雷,幸亏未响。他愤愤骂了句,轻轻把镐尖挪出,将地雷放在一边。黎明前黑暗的短暂时间里,敌人不断打出冷枪。战士们对枪声早习惯了,没人理会它,照旧埋头挖工事,工事挖好,又把运动沟挖出来。沟深全在一米以上。

二十旅将房山城围住之后,刘秉彦旅长当即致信张德祥。信中讲明了当前形势,为使城内居民免遭涂炭,要张德祥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张德祥接到信后,令王荫亭起草回信说:房山地小兵薄,俟平津解放之后,不攻自降。在敌人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我部队即按原定作战意图,对房山城发起总攻。

第一个攻击点是小山坡。这是战斗的主攻方向。因这里位置重要,既可以用火力支援县城,又能控制山顶庙的登山小路。站在坡顶,房山城内大街小巷尽收眼底。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坡麓上有高三丈

的炮楼一座，炮楼四外有围墙和射击掩体。围墙外七、八米远有宽四米、深三米的壕沟，壕沟内外壁均为石砌，沟底埋有地雷。沟外十几米有铁丝网，网上结有地雷……

12月12日晚八时左右，攻坚部队开始对小山坡据点发起攻击，一连打主攻，二连接应一连，三连为预备队。营里没有炮，只能靠炸药炸。夜色茫茫，队伍隐蔽在山下的坑坑洼洼里。突击班上去后，两个五十斤的炸药包爆炸后，壕沟并没炸坍。原来壕沟不仅用石块砌筑，石缝间都灌上黄米汤的灰浆。战斗带有突袭性质。两声巨响后，部队冲了上去。敌人发觉了，拼命用机枪扫射。我冲上去的一连战士一百三十多人，当场牺牲三、四十人，受伤者更多，部队只得撤了下来。

12月13日，攻打齐家坡的战斗开始。战斗序列是：六连攻坚，四连为二梯队，五连为预备队。营长赵修直同志按部就班做了交待：一敌情，二任务，三分区，四联络，五代理人。完毕，他顺手将摆在地上的电话机拿起，摇通后，告诉百米附近的旅山炮营×连长，做好击穿敌炮楼的准备。激战前的一刻是紧张而激动的，各连连长、机枪手、迫击炮手和号兵，都聚在营长周围。旗语、联络讯号都明确规定，牢记在心后，各连分头去做准备，紧急待命。

上午九时，营长指挥旗向下一挥，寂静而寒冷的旷野上，两声长长的号音划破天空。战斗开始了。迫击炮弹连续呼啸着在半空划出几道弧线，直落向敌人碉堡。平射山炮怒吼着直穿敌炮楼。两门炮各发出三发炮弹。没半分钟时间，攻击的步枪、机枪同时响了，有的封锁敌炮楼，有的封锁敌碉堡的枪眼。这时，冲锋号响了，六连突击队立即冲了上去。但号音还未落，连长刘云鹏已跃到营长赵修直跟前。原来，战斗失利了，部队伤之较众，六连除火力队、爆破组外，突击队还不足二十人，敌我力量悬殊。营长当即命令：原定方案不变，你快去组织力量，我从四连给你调一个排，充实你的突击队，组成个加强排，准备第二次冲锋。一定要拿下敌楼，确保全局。二营战士的鲜血从来不自流！刘云鹏连长立即举起右手，奋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打、打不下来，营长手枪照我头来（他有些口吃）！刘云鹏走后，营教导员蒋志宏把四连指导员李裕和六连指导员于宝珍叫到跟前，要他们分头到班、排去动员，说明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攻坚战斗，二营有经验，更有把握，要发挥党支部和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拿掉敌楼，战地练兵，配合四野，共打北京。要他们深入地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战斗胜利。

下午二时，战斗重新开始。山炮、迫击炮各发出三发炮弹。随之，机枪声和冲锋号声响成一片。敌人被封锁在炮楼里，不敢还击。战场上硝烟弥漫、碎砖、土坯横飞。爆破组在火力掩护下，又将被炮弹摧开的敌人工事缺口炸宽一段，为突击队开了路。教导员蒋志宏和突击队一起冲进敌工事内，高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敌人的防御彻底崩溃了，纷纷举手投降。下午三时七分，战斗结束，顽匪一连一百余人无一漏网，全部被俘。计缴获机枪四挺，步枪手枪八十八枝，子弹三千八百发。打扫完战场，部队带着胜利的喜悦，赶到离齐家坡约四里远的羊头岗村休息。

晚上，攻打小山坡的战斗再次掀起。旅长刘秉彦亲临前沿指挥。根据小山坡敌人工事、火力点的分布，从旅部调来了山炮，安放在距小山坡西南炮楼六、七十米处，由一营三连进行保护；一连剩下的十多个战士和轻伤员继续从西面，以爆破和火力攻击，吸引敌人兵力；二连在山炮支援下从南面发动主攻。为跨越壕沟，避开沟内埋设的地雷，二连战士事先准备好梯子，准备冲锋时横档在沟壑上。晚九时整，战斗开始。在夜幕掩护下，一连战士先从西面佯攻。当敌人集中火力对付西面的进攻时，山炮开火了。两发炮弹飞出，颗颗命中炮楼。敌人慌乱了，但还拼死顽抗。二连战士变换进攻方向，从西南面发起了攻击。眼看已逼近敌阵，但因敌人火力较猛，壕沟又宽，带上去的梯子用不上，越过壕沟遇到了困难双方僵持不下。后来，一个班战士（十二个人）绕着沟摸到吊桥边，趁敌不备冲了过去。敌人的机枪用不上了，只得从炮楼冲出来。战士们奋不顾身，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接着，又一个排的战士冲了过去。敌人胆怯了，除死伤的以外，一窝蜂一样，仓皇地跃出壕堑，向房山城内逃去，人数大约有二百余人。

小山坡据点被我攻破后，守在山顶庙的敌人见大势已去，没等我军攻击，就惊惶地从据点里逃出，奔入房山县城。至此，房山城外围的三个屏障——小山坡、山顶庙、齐家坡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攻占，房山城成了一座孤城。

是夜，房山城内一片混乱，是战是逃，敌人举棋不定。见房山城危在旦夕，张德祥便向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电报告急。楚溪春接到电报后，知大势已去，但从整个战局考虑，仍回电要张德祥死守，若守不住，就破坏掉城内重要设施，然后突围，如突围不成，就杀身成仁，以尽军人之职。而被困在房山城内的国民党党政要员，为保住身家性命，已决定弃城逃往北平，于是慌忙烧毁了县政府和县党部一些重要文件，并把一些重要物资分藏起来，还布置了一些潜伏人员。张德祥本是顽劣之徒，更加惜命。于是，12月13日午夜，国民党房山县党政官员及保安队一千多人，趁星夜出北门，急急向北平方向逃去。

敌人逃走后，12月14日凌晨，我攻击部队即从北门入城，并按照上级部署，分头去占领各要害部门。部队入城后，房山县县委书记刘祥庆、副书记崔乐春、县长杜恩霖等和第一批入城工作队进入房山城。14日下午，七纵队漆远渥副政委及二十旅刘洪涛副政委率后续部队入城，宣布戒严七天，在街头张贴了军分区入城布告，公布了治安公约十条、卫生公约十条。

具体接管工作，是在“入城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委员会下设市场、物资、接管、宣传、治安、俘虏处理、武装保卫等部门。入城第三天，派出所便开始登记户口。俘虏处理处，五个干部一天内就审查、释放敌人抓来的新兵八百一十七名，暂处理国民党政府、警察局人员六十八名，审查了监狱关押的犯人二十一名。由于工作队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以及卓有成效的工作，城内很快就平静下来，中小学三天内就开学上课了。各商店很快就恢复了营业。

七纵队的指战员们，在解放房山城的当日十四时三十分，即接到军区电示：……为不使北平之敌向东逃走，以便东北主力到达后合力歼敌，七纵全部立即出发，取捷径于十四日拂晓进至北平以南之黄村东南庞各庄地区，……应不顾一切牺牲代价，坚决阻滞可能由铁路向天津撤退之敌，不使其逃脱。于是，部队只有小部兵力留下来，协助地方处理进城事宜，主力则遵照上级指示，迅速向指令地点前进。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房山城解放拾零

王绍清 侯之扬

垂死挣扎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全面解放的进军号，战鼓雷鸣，震撼了敌人大小阵地，使敌军胆战心惊，丧失了抵抗的能力，且战且退，最后不得不狼狈地把军队集结在各大中城市，筑碉建堡负隅顽抗，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驻扎在房山的“国军”也紧急集结在北平城内。

房山保安团在我军攻克周口店、坨里等据点后，为保住他的老窝，急速把四下队伍撤进城内，强征民夫，昼夜不停地平障碍、拆民房，加固城防工事。为充实其损伤得仅剩有一千五百人的残兵败将，采取搜、劫、

堵、掏的办法，几天内抓壮丁八百一十七人。当时、城关镇公所直接控制下的四街三关，有九个保，一百零四个甲，一千四百九十户，五千一百一十一人。百姓及商人出入行动严加限制，农民下地干活也得到保公所开路条，三天两头查户口，派夫、要粮、要捐，民不聊生。青壮年怕抓兵，白日干一天活，晚上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工人员，蛊惑人心地宣传“八路军要进城、见东西就抢，见一个杀一个，共产、共妻”，白色恐怖笼罩了房山城。

市井萧条

古老的房山城，商业发迹较早，门类齐全，买卖兴隆，市面尚属繁荣。“七七事变”，惨遭劫难，元气大伤，在日本统治时期买卖不甚景气。日本投降后，各商户抱有重振店铺的愿望，皆因国民党对物资封锁之严，苛捐杂税之多，路站的盘剥，军警的敲诈勒索，加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理想终成泡影，只能维护现状，惨淡经营。特别是1948年，蒋家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夕，保安团集结在城内的日子里，城防加严，东西门通路堵死，只南北门通行。为限制百姓进城，南壕沟、南门两道关卡盘问搜查。由于各地交通受限，货源断绝，城内商号逢集到南门外出摊售货。后来局势吃紧，把集市轰到壕沟外南沙滩（今聚源商场西侧），各商号只好迁到南沙滩。平日城内的座商其主顾只不过是城内的百姓及伪军政人员和家属。商品卖一点少一点，唯一的一家烧锅卖出的酒，换不回原来的粮食，只好坐吃山空。有的店铺辞去伙计，夫妻看守；有的破产经营，维护生活而已。义和升有几间大门脸，而货架上仅摆着点规格不全的洋钉，昔日商品齐全，门庭若市，如今袖手伏柜，市井萧条。偶尔只能听到低沉无力的卖麻花、烧饼的吆喝声。一个古老的繁荣小城，此时阴森凄凉，商号濒临倒闭。城内有牌匾的二十多家店铺，从业人员还不足百人，资金不足二万元（折合人民币）。

难忘的一天

1948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庆祝房山全境解放，宣布废除封建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天。

12月13日夜，房山伪党政军率部弃城从北门逃跑，14日上午八路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从北门入城，宣布戒严三天，在此期间，政府工作人员积极进行入城接管工作，八路军则打扫战场、清理敌人设下的障碍，搜查地堡掩体，起地雷、清查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贴布告，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刷写大字标语一百七十条，挖开堵塞的东西城门，四门大开。

17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在东大操场，召开了庆祝房山解放的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场参加的人虽然很多，但鸦雀无声。随着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逐渐解开了人们对政府和解放军的顾虑，冲散了长期压抑人们头脑的恐怖心理。人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整个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大会散后，有的群众还围着政府和解放军领导，问这问那，久久不肯离开。参加会的群众听了领导的讲话后奔走相告，有的爬上城墙，走一走，登上炮楼四下看一看，还有的钻进地堡转一转。特别是天真无瑕的孩子们，在敌挖空的城墙掩体中钻出钻进，追着，打着，喊着。此时整个城内群众，似脱缰之马、破笼而出的鸽子，尽情地奔腾，自由地在空中翱翔。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房山解放入城工作报告

(1948年12月29日)

宛金城 黄兆林 选编

第一部分 情况简述

甲、敌人逃跑时的破坏工作：

A、烧毁文件，县党部的文件全部烧了，警察局除商贩证没烧外，其余全部烧掉，政府烧了好多有关文件(如户口册子，帐目……)，敌人并令各保烧掉户口册子。

B、散布恐怖性的谣言，如说：“共产党入城见一个杀一个，见东西即抢。”又说：“要共青年妇女特别是姑娘。”

C、分藏物资，将大米白面全部分散了，将帐烧掉，有三石或一二百斤不等，存放各户说：“要回来即还，不回来谁存谁要。”

D、让主要的一些人物随张德祥一同逃跑，说不跑共产党来了即得杀了。

E、布置潜伏，制造反证，宋锡禄、王德增、刘汉如等三人为张德祥之情报员。因其年老不能行走，故以判决死罪作反证，故意将判决书留于办公室内，企图骗我们，现在尚未找到这三人。

乙、敌人逃跑时情况：

在力不能支的情况，敌人即从北门而逃，警察局、县政府、党部、总队部的所有能走的主要人物全部而逃。伪政府内几个职员因在家住未逃。敌人逃跑之后我军即迅速从北门入城，故未发生抢夺现象，特别是几个大粮库均完好无损，一般说社会秩序不太乱。

丙、城关的社会概况：

全县城东南北关在内，有9个保104甲，1940户，5911人(连城外逃来的和敌伪各机关部队等人员约九千余人)，男3038人，女2253人。详情如：

1、商业情况，如表

商号名称	户数	商号名称	户数	商号名称	户数	商号名称	户数
饭 铺	9 户	茶 叶 店	3 户	炉 坊	3 户	药 铺	5 户
面 铺	11 户	肉 铺	6 户	染 坊	2 户	澡 堂	2 户
烧 饼 铺	7 户	菜 摊	3 户	成 衣 局	3 户	照 相 馆	1 户
麻 油 店	4 户	合 作 社	1 户	刻 字 铺	1 户	邮 局	1 户
麻 铺	2 户	鞋 铺	2 户	钟 表 铺	2 户	电 讯 局	1 户

杂货铺	13 户	轧油坊	2 户	罗圈铺	1 户	石印局	2 户
花生摊	6 户	酒烧锅	1 户	纸店	4 户	书局	1 户
洋广货店	5 户	车行	4 户	修械所	1 户	理发馆	5 户
布庄	6 户	铁器铺	3 户	医院	1 户	火药局	1 户
总计	125 户						
注 明	1、以上商户均有门市者（无门市的尚未统计），另外小贩流动性的占人口半数以上，没一定规律，什么货能流通即便弄什么货。 2、所有商户除一个油坊和一个烧锅（酒）有敌人股份及合作社纯系敌人经营，其余完全是私人经营的。 3、那六户花生摊主要是贩花生压成花生米发行。电话局、邮局已被我掌握。						

2、城内中学一、高小一、初小一，学生五百余人，城外三百余人，在北平读书的学生 97 名，在敌伪机关之公务员 125 人，在平津做事的 195 人，在张德祥及顽军领导下当兵的 918 人。城内伪属 473 户，城外逃来伪属 217 户。

3、城内有国民党三青团、防护团、情报网、青年壮丁队等组织。

4、城内有家礼、先天道、后天道、慈善会、大佛教等迷信组织。人数占城内人口三分之一弱些。

5、除上述特种户口外，尚有赌局 14 户、毒局 9 户、暗娼 5 户等特种户口。

6、一般人信神信鬼的风俗很严重、性虚伪，在生活上很好吃穿，在装饰上与北平相同。在敌统治的几年来，淫风颇盛。

7、城内人口很复杂，有山东、山西、察哈尔、东北、河南、湖北、热河等省籍人口。南关十日四集，每集人口约四千人左右。

8、自解放后迁入的没有，迁出已到派出所登记者有 193 户（至 12 月 23 日的数字统计），多系逃亡户和伪属（乡村人），现均回家。

9、城西有上方山之古景，城南有周口店煤矿，石灰业、水泥源，多经琉璃河运出。城北有坨里及红煤槽大石根煤矿。南有周口店至琉璃河的公路和至长沟的公路，并有琉璃河至周口店的支路，北有长辛店至坨里公路，东有房良公路，城东、东南、东北有良乡城、琉璃河、涿县、长辛店等城镇为邻，近则 30 里远则 50 里，公路均与县城相连。

10、来往人员相当复杂，有的是到城里看看，因十余年不能进城，有的探亲访友，有的经商，有的来找东西认东西（后已纠正），有的搬家，每日不下五百人。

第二部分 入城以后的接管工作

A、入城前的准备工作：

保定解放后，地委曾对我们明确指示，要我们对支前工作和准备县城解放后的进城工作，因此在未解放县城之前，县委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工作都是较充分的。

1、县委曾责成社城敌三部专门调查了解县城的全部情况，并为此情况之正确分析判断，县委这次曾开了三次专门会议，根据房山县城情况拟定入城工作计划，报送地委审核批准，变成了房山县委的决定。

2、12月7日(县城未解放前)县委即把入城干部集中一起,进行了三次训练式的教育,第一次于石窝,第二次于尤家坟,这两次的教育内容着重进行新区城市政策和工商政策,经教育之后大家都很虚心,如区委王全保说:“还得好好的学习,服从领导。不然就要犯错误,因为新区和入城工作咱们一点门也没有(没经验)。”

3、疏河解放于房山县城前,因而房山入城干部奉地委指示,先接收了疏河的工作,也给了试习机会,13日正式交待给良乡接管,当即把全部干部集中到双孝村作了接管疏河工作的全面检查总结(已送地委),在此同时县委对房山城一般情况和进城工作的计划及七纵队齐副政委的几个意见,在干部中也作了详尽的传达和讨论。但由于情况变化之快(敌人于13日的后半夜即弃城逃窜)、时间之短,未能做到在入城前地方与部队干部共同详尽地商讨入城部署和对政策认识一致的思想酝酿,所以在入城后的接管工作上发生一些问题(主要是物资清理)。发生的问题(略)。

B、入城后的具体工作:

入城后的工作是在入城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设市政、物资、接管、宣传、治安、俘虏、处理、武装保卫等四部,分工负责进行的如下工作。

(一)社会治安问题:

社会秩序。14号下午入城,立即张贴了分区入城布告,第二天即将人民政府、公安局、派出所的牌子挂出,并贴出布告,先宣布成立派出所,规定治安公约11条,卫生公约10条,随时又公布群众应遵守和要执行的三件事情,号召所有伪组织人员到派出所进行登记,献交敌伪物资枪支、戒严之后迁出迁入须有派出所的条子,否则不能通行。派出所第三天即开始掌握起户口。

在街道上为便于管理及不乱起见,在各街胡同口挂起了木牌和贴上纸条,标明街道、胡同等,并有大街的两旁靠左边走的标牌,街上污土马上让清道夫和牲畜车辆向城外拉,使城内卫生马上清洁起来。

14号进城为了便于管理,实行戒严三天,后来分区通知增加四天共七天时间(实际戒严五天),在五天之内,前由部队后由民兵负责设岗,在戒严期内禁止出入,没有出入城证者一律不得出入,出入时须经批准方能有效。出入城时在前几天实行检查,后来换了民兵检查得即不够严格了,在戒严期间不得干部、战士买东西,这点执行得还很好。

自14号起,为了稳定人心,消除思想顾虑和揭破敌人的反动宣传,召开了各种会议。肃清敌人地下潜伏特务组织和枪支。

1、初步地了解了中学内的特务组织,12区党部书记为邹树铭,城内区党部书记苏乃纯(没下层组织人员),另外发现了敌人的防护团情报网等特务组织,为稳定群众情绪尚未公开破案,仅将其中的个别人作为侦查对象。

2、入城之后在清查阶段中,共查获出短枪24支,加各区查获的4支共28支,除5支不能使用外,其余均能使用。子弹不多,均是二(三)粒三(五)粒不等。查获大枪14支,加各区查获16支共30支,这些枪从查获之中来看,有13人是经过暂时利用各种关系动员和调查发现出来的,有7个是武装特务掏了枪,经过宣传之后和经关系动员而交出来的,如卢振海、夏俊卿、少光贤(国民党员)等人即是这样。对这些武装特务经过教育之后,进行取保控制,有的利用他们发现敌人特务组织,现已收到一部分成绩。现有两个特务潜伏起来(一个是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叫张振民,一个是国民党部干事宋兰田,早即埋伏在韩继当教员去了),现在表现以假积极面出现,企图蒙蔽我们,正在侦查中,尚未破案。

3、伪组织人员登记,第一天布告出去之后,登记的不多,第一天登记115人,第三天登记213人。现在城内的伪组织人员,可以说全部登记了,共登记365人。在登记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别他们对清查敌伪物资是有很大帮助与成绩的,同时也了解了国民党的一些材料。

(二)处理俘虏:

14号入城后，马上由俘虏处理部的五个干部，审查敌人抓来的新兵，经过一天的审查，释放新兵817名，其中有花钱雇来的423名，抓走的389名，自动报名的79名。暂时处理了伪政府、警察局职员、警士等68名，他们没有和敌逃跑，是递投降书向我们投降的。其中有秘书主任一名，秘书一名，政府科员、干事、雇员37名，警长4名、四分局长1名、警察局职员9名，伙夫、看守员6名，电讯局职员5名、夫役4名，通讯兵1名，其中自动承认是国民党员的9人均入党不久，而且是集体入党的。这63人均愿参加工作，经审查后，将秘书主任、秘书等令其回家外，只留下了42名。这些人是下级职员，暂让他们工作听候处理，多系青年表现很好。并审查了监狱内押着的犯人，经审查释放犯人21人，被捕我方干部2人，为抓兵抓来的家属17人(内有女8、小孩4、老头5人)，为来我解放区半路被捕的大学生21人，北平人，我之城工关系。留下7人没有放，因这些人有的很坏，有一人可能是敌人有计划押起来的。在释放这些人时，给他们讲了话。放走时有的人说：“国民党押起咱们来，共产党放了咱们！”被放者欢欣鼓舞地走了，整队派人送出城外。

(三)敌伪物资的清查，除部队带走的，其余一切物资完全经过登记，现已分类入库，妥为保存(表略)。

(四)未经清理(登)记的物资：

在当日解放后，部队当天运走弹药十五大车，另有一部办公用品，纸张、电话机、自行车、较好的枪支，部队一个团每人带走一百发子弹，这些物资因为时间仓促未进行登记，并未计在以上数字之内。肖副司令员派人取走二十门分机两座，单电话机四个。

房山城的物资清理是属于部队和地方共同组成工作委员会负责，这是纵队齐副政委和地委的决定，这个委员会未很好形成部队就先入了城，在各种物资的接收上就首先由部队负责接管打扫战场，当地方干部入城，原入城部队即奉命另行执行任务，移交其他部队，这种情况由14号到18号每天换防一次(都是晚上来晚上走)，每天组织一次，工作委员会因此发生了一些问题。

甲、工作委员会没有很好形成入城后的核心领导和权力机关，对今天所收复的城市永为人民所有的建设思想和入城纪律贯彻不深入，所以产生了以下问题：1、四天四次换防的部队，真正执行一切缴获归公、统一接收、统一处理的纪律执行不够，因此每逢敌伪机关的文件纸张乱翻乱动，谁来谁想带走点东西，伪警察局有一个骑查队，据说有30余辆车子，入城部队将这部分车子全弄走，伪政府警察局有一马号，内有19匹马，七头驴、八个骡子，结果部队将这部分马乱拉，事先让给地方留下几匹，最后抓得仅留下一匹老马，如拉马部队自己骑来的马曾被乱拉，甚至自己马上带的铤(嚼)子已被摘走，地方干部从张坊骑来的车子也被部队后勤机关收拾了去(经交涉发还了另外一辆)。敌伪机关开办的合作社，有煤油两大桶，赖副部长(后勤部)运走了(以汽油名义运走)，五分区地方部队到后也拉走骡子一头。民兵也有不少的换枪换鞋、拿子弹等问题之发生。2、一切缴获归公，树立长期的建设思想，从上而下贯彻到底不够，所以在执行上也就不统一，纵队齐副政委谈：“所有一切地方建设性的完全保留，不准破坏乱动，属于军火器材工作委员会讨论分别处理。”但在下面执行上，第一次将属于地方机关性质的一些电讯器材留下了一部分，第二次的换防部队则下令全部电讯器材收归部队所有，结果连一部分保险线都收起(经一再和部队交涉，留下了十一部电话机)，二十旅的刘副政委还和地方上这样讲：一切东西我们尽量照顾你们，如照顾不到请你们原谅(他在还好办些，可是14日晚上他也走了，部队从此就无一定负责人)。

乙、各种物资未清理前，存有敌伪物资处是由地方军队共同接管，共同看守，每处都有地方干部一人参加，但地方干部坚持原则性差，看管形成了形式，部队看管物资之哨兵专看地方和老百姓，而对穿军服的部队自己乱抓乱翻则是采取放任态度，主要是最后接防的五分区地方部队那一连，换鞋换衣服很多。

丙、首先对敌伪物资之数量估计不足，所以事先只是由入城干部负责，而没有充分准备，领导上没有单独准备清理物资干部，造成入城后的工作多，干部少忙不过来。后来又电各区临时抽调来一批干部才解决了

此问题。

丁、这次入城虽发生了以上一些问题,但所有入城部队、民兵、党政民干部,执行群众纪律,不串民宅、不扰乱商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方面还是很好的。地方干部在清理过程中,曾开两次小组会进行思想检查,只是武装部一个干部叫胡金勇(总务),原决定在支楼兵站,不经批准,偷着由城外岗楼上抓了一部分东西,了解后经县委讨论,东西全部退回,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以教育其他干部(已请报地委)。

(五)宣传工作:

1、房山县的人民被日寇统治八年,又遭到国民党二年零六个月的蹂躏、压迫,到今年12月14日才获解放,城内人民所听所闻完全是一种奴化封建思想统治,欺骗和对我之造谣污蔑反动的宣传教育,这次张德祥临逃时,还组织了市民会议宣传说“共匪入城大杀大抢,青年妇女配给”等,再加上以往从四乡逃采的逃亡户和敌人的反动宣传力量勾结在一起,所以对城内一般市民蒙蔽麻醉是厉害的。特别是城内1100余户中,四百余户伪属,更是不摸底,因此市内人民的思想顾虑是很严重的,以致造成入城后的两天内:甲、城内街巷除穿军服的解放军部队和我工作人员外,市民很少来往,伪军伪属伪组织人员怕杀,逃亡户怕认对象。在15日的晚间,一个当伪军的张德儒,偷着到街上,碰见我们一个区干部便立即跪倒在地,大声哭喊留命。乙、所有买卖商户怕抢,则紧闭门市,摊贩绝迹,住户街门多为关闭,很少出入行人。特别是青年妇女怕露面之后配给。丙,城内的中学、简师、完小,尚有五百余教职员和学生们,见到我之工作人员表明我是无党派人士,学生则盲目地说:我们愿到里边读你们的书籍。

2、这种严重的恐怖情况基本问题在于不了解我党的政策,因此在进城后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门领导下,首先张贴了安民布告,散发张贴了宣传品和紧张地在15号一天之内组织了20余人完全涂去了敌之各种反动的宣传品和标语痕迹,刷写了我之标语口号170余条,并将县级各机关报纸抽出了29份,传送给一般知识分子,和粘贴在原有敌人的报牌处供大家阅读,以促进城内各界人士对我之明确认识。为此又组织了以下几个会议,目的在于宣传我之政策,揭破敌人之造谣、欺骗宣传,稳定其情绪,恢复新的社会秩序。①知识分子和教职员座谈会。②伪保甲长座谈会,商人座谈会。③妇女知识分子和一般妇女座谈会。④一般市民座谈会。⑤敌伪人员及其家属会议。

3、以上几个会议上分别讲了我党的各种政策,又释放了敌人抓来的八百多新兵,监狱21名犯人,和对68名伪组织人员的暂时处理以后,群众害怕思想逐渐减弱,情绪得到适当安定,秩序开始恢复,表现在:①学校在我们入城的第三天即开始复了课,共33个教员,到校者即达32个(一名不在者已去北平),学生达到五百余名,并且取消了敌人的公民课本,加上了我们人民日报和北岳日报的政治课程。②有门市的商号开了板,摊贩在街巷两旁也出现了,所以市民们又自由地交易起来,但在戒严期间,部队干部仍执行入城纪律不得买东西。③伪军伪组织人员每天有进行登记的,有的持枪者也进行携械登记,悔过坦白自己过去的错误。④最大的一个收获是立即将过去的伪保甲人员和商会组织共同组织起临时维持会,解决了我们进城后进行城市一切工作的跳板桥梁和解决了临时的支前动员工作。

4、虽解决了以上几个问题,但他们对我们的政策抱怀疑,不知我们言行是否一致,又因敌人给予的欺骗宣传比较深刻,所以他们的顾虑表现了。①教职员和一般知识分子们认为我们对他们的团结不会持久,可能暂时利用(对他们的改造也是必然的),有的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家(指我们)的人都到来就换下去。对前途抱悲观,恐怕将来失业,无事可作。②商户虽已开门,但有货物总不愿卖,对我们的货币靠不住(比值来回变更也是原因),以抬高物价达到不卖存货目的,再者不通过货币以物资交换。当时如一盒纸烟三升小米。③一些伪组织人员不敢亲自登记,其家属们报告登记之后,怕将来再扣起来,所以住在南关的伪属登记之后,又找到保长说:“如他们(指我们)找我们时你千万给包捣着点,只当行好呢,不会忘恩情。”④一些逃亡户低声不语躲避隐藏,怕内地群众找对象,托亲朋友找熟人给疏通维持。⑤一般的市民和群众到处寻看我们的标

语口号宣传品。出了布告，识字的人都抄下去，看我们的行动是否一致，考验衡量我们。索培珍（我政府的文书）的母亲谈：经过这两天看你们八路军现在是很好，不打人，不杀人，不骂人，不共大姑娘，将来是否共妻，是否还杀人呢？仍有怀疑。⑥为了众告周知，把我们的政策宣传出去。让所有各界人民群众清楚，了解我们政策，执行政府法令，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稳定群众情绪，所以于入城的第四天召开了城关的群众大会，庆祝房山城的解放，群众情绪极为高涨。

（六）现在的群众思想动态和反映：

甲、一般的反映①各阶层同情我们的一点则是真正得到解放了。戒严之后四门大开，来往行人便利自由，男女老幼都出来进去，由城上到城下议论着：“这可是真正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到是给人民办事，过去被张德祥统治的出入不方便，说话都不自由，过去他们（指敌人）行的都是美国法子，两千多人守城，修炮楼子封城门，不让老百姓随便出入上城，现在四门大开就民兵站岗也不乱，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真能干。”②解放军来的正是劲，这次城内就给我们摊壮丁 89 名，每个壮丁 25 石玉米。依剃头维持生活的赵老头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一点不错，不是解放军来这次我个人得交雇兵玉米费两石，收摊也不够，大买卖也得关了张。北关的农民孙玉保说：“敌人在时整天催着要枪款，子弹费补助粮，雨衣费、棉衣费、特别费等……记不清，我租种十七亩地，仅半年的光景大的花销就摊了我四次，头次每亩摊玉米六斤，二次每亩摊玉米八斤，大秋两次共摊小麦 226 斤半，玉米 165 斤，小米 342 斤半，另外每亩地交租子四斗。要不是解放军来，我怎样活下去呀。这还不算，张德祥为修堡垒把北关的房子拆掉 200 余间，假使解放军再不来，恐怕一间房也剩不下，特别是人民政府宣布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这真是人民政府给人民带来的新幸福呀。”③八路军说到哪里做到哪里，一位在县城很有名望的老士绅任伯华（他在民国初期任房山一区区区长，张德祥在时受打击最厉害的一个）说：解放军的纪律严明，公买公卖，秋毫不犯，不入民宅，是我活了七十余岁所未见闻的奇事。买卖商号也都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杜县长讲的工商政策真好。贫农王志的母亲说：咳，过去谁理我们，哪能和当官长的说话，现在真如走了个继母来了个亲娘。伪组织人员王久安说：我深深赞成共产党的大仁大义的宽大政策，对于痛改前非带罪图功者，还有宽大，国民党是做不到的呀！也有的伪属们反映说：人民解皮军来了大杀（意思是敌人造谣言），哪里杀一个呀。有一个叫海逢的伪属说：“我要知道不杀，说什么也不叫我儿子跑。”

乙、一般思想动态。1、城市的一般贫民和无产者认为将来共产党必要领导土地改革，城市无有土地，议论着向乡村迁移以便到时分一份土地财产，另外在一些富有之家也同有相反的一种想法，出财产表示没什么，只要不死人就好。中学教员绳伦如曾找到杜县长谈，情愿将自己的三顷多地交给农民耕种，落个开明的称号。2、一般伪保甲人员内心有愧，为了取得我们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工作上表现非常积极。但同时一般的市民特别是下层市民则表示，过去你们说话我们不听不成（因有敌人），今天我们再不能听你们的了（指对伪保长们），北关的群众，现在有清算负担的要求，在此次改造北关保公所为街公所时，群众已取消了保长的薪金，特别一些最饥贫的坚信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所以在解放县城的第四天即有两个未穿上棉衣的穷人到政府要求棉衣（从缴获的棉衣中给了他二人每人一身便衣）。

（七）解放后机关的具体组织工作和现在的一般情况：

甲、解放后的第四天正式建立了城关区公所，区级各部门干部配备情形，经地委批准暂请县委宣传部长任区书、政权民政科长任区长，全区共配备干部 14 名。

乙、现在的工作情况：1、敌伪的市政组织情况。城内共有六个保（79 甲），南关两个保（21 甲），北关一个保（4 个甲），城内和南关都是联保办公，直接受伪镇公所领导，每保有事务员、夫役、户籍员、民意代表等，职员挣薪金，每月小米 150 到 200 斤不等（分别职务），保长们口称义务制，实际上暗中贪污少拿花销。除此之外，还有商会组织，直接受伪政府领导，设有理事长，副理事长，下设理事监事，共 11 人，另外还

有六个职员(书记、文牍、司账、夫役等),每人挣160斤到210斤小米,分别职务不等。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伪政府摊下款粮之后,向各商户起粮款。他们的负担情况,保公所征粮征款按门户摊派,而商户的粮款只由商户出,所以不论大小商户都是负担着两份。城市卫生工作过去有三个大车专拉堆积的污土,有两个好的张德祥占了去,现在留下一辆破车一个老骡子,清道夫的开支是由伪镇公所开支(人和牲口),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组织。2、如何着手进行的市政工作:①市政组织机构改造意见:取消联保办公,保公所改为街公所,各甲变为市小组,甲长为小组长也为当然的民、财、教、工商、卫生等委员,关内增实业委员,保公所的书记改为街公所秘书,跑腿的改为勤务干事。随着群众的觉悟,发现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逐渐作到调整人选、抽梁换柱。②根据这个计划城内分开办公,都挂上了街公所的牌子,还召开了群众会议,已初步改造了保甲组织。改造的方式,首先召开甲长会进行座谈,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适合群众需要,才能真正给群众解决问题。当时介绍了我们的计划,和干部的分工负责,通过他们的思想又召开了群众大会,强调提出共产党每到一地立即从多方面减轻人民负担,领导生产,增加人民收入,最后大家决议取消保甲改为街公所(有的从农民中新选了两个委员),取消雇佣,减少开支,各委员轮流值日。过去挣薪金的职员当场也自动地说:我们三个月的薪金未补不要了。如北关穷人多又无买卖,又无营业,也无办法,其他进行的方式相同。但有的情况和北关也不同,南关和城内十户九商,群众决议是留一秘书挣薪金住街公所,有工作再召开会议,不致影响营业收入。

城市卫生工作。城关街上污土太多,一个车拉不过来,有碍卫生工作,所以决定除原车外还增一车,由政府解决二个人和牲口开支,暂由城关负担。

南关的集市原来没有什么组织,只有包税员一人,下设牲口、斗行……等牙行,包税员对牙纪的剥削很大,牙纪得集市税额百分之零点六,其余的由包税员缴伪政府税额百分之二十。已取消了这个包税员,由城关区的工商助理、派出所长,商会主任、商会两个代表、六个街公所的工商委员共11人均均为委员,主任共同组成集市委员会,设有正副主任,和组织、宣传、治安、交易等四股,人由各委员兼,另外设有“斗”、“牲口”、“秤”牙纪16人在交易股领导下进行工作,在集市上宣传了过去(敌人)一切交易3%到4.5%的交易额外,负担完全废除,改为牙纪1%的手续费,维持其生活,政府只收3%的牲口交易税。3、群众组织:①商会——将原来的行政组织取消,改为群众组织,暂由原来的11个人变成了委员制,正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业务三个委员,其余均为委员,过去的商人都参加商会组织,每家一个人为商会会员,还未分编小组,因为对商号正在进行全面调查。商号组织成员,有的商会会员,有的店员需参加工会,改组的方式是先召开原有商会理监会议讨论研究,通过新的组织形式之后,又召开所有商人会议讨论通过,原来的六个职员暂留职三个,负责清理以前商会的手续,打通向保、石和内地的贸易路线,交流商情,繁荣发展商业。薪金不变,一人挣210斤,一人挣160斤小米,仍由商家开支,这完全是该商会委员会和商人大会议讨论后的决议。②县城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先着手农、妇、青等群众组织,通过街长委员,将妇、农、青召集在一起,我们给予政策教育,在会议上发现积极分子,较好分子,指定为代表,然后加以审查、培养、教育,通过他们发展会员,准备正式地组织妇、农、青会的干部。现在不断地开妇农青会议,进行全面教育。现已在南关七个农民代表中发展了三个党员,北关四个农民代表中,发展了二个党员。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良乡县委关于良乡解放入城工作报告草案(摘要)

(1948年11月28日)

史长义 选编

第一部分 情况

良乡共有一百九十六个村庄，伪房山所属一百四十九个村、良乡所属卅七个村，都是在日本投降后才建立我之组织，个别村庄在1945年就有工作，如山根等村：打通了与保甲长的关系，交纳些公粮。大部分村庄日本投降后建县以来，工作才有开展，但在围城附近村庄仍未发动过群众，只是个别村庄(如崇各庄、豆各庄)进行了减租减息，扩大了政治影响，群众对我反应不坏。1946年4月环境变化我们退出后，近两年来我力量薄弱，敌人在军事力量上占优势，在良乡城附近我只能找到保甲长，完成一部分征收工作。在执行政策上，去年征收时，向大户押人要粮，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受了一些影响，特别是有些上层人物对我方有惧怕心理。

良乡城内共五保人，约1100户，共有大小商户104户，其中最大的商户有南北烧锅、增盛隆、宝合兴、济安堂、义顺兴药铺、同义轩饭庄等，商业很繁荣。社会阶级主要统治人物有大地主何善义、城参议会负责人张寿岭。伪机关有伪县政府、国民党党部、警察局、参议会、救济院、军民合作社、邮政局，镇公所、商会等；其次有城关乡、玻璃河乡、交道乡、安庄乡等。另，城内有伪中学一处。

良乡县在日伪时期即为国民党的模范县，抗日八年在军事上始终未受到过打击，因此为敌之较强县份。

第二部分 入城准备工作

(一)由部队和地方共同组织入城委员会，为军事管制时期最高领导机关，参加人员为县委书记、县长及城敌社武和入城部队之军政负责人，下设各股办事，有组宣股、社会治安股、接收敌伪物资股、处俘股等。

(二)入城委员会下设纠察队，在军管时期由部队组织纠察队，地方接收后县基干武工队和民兵两个排组成纠察队，负责维持城内秩序及警卫工作。在军管时不准随便入城，县制作入城证章。

(三)入城干部首先由县委召开会议，研究收复城市及新区工作，进行学习教育讨论；特别是入城干部城市工作经验缺乏，应该很好地学习政策与如何管理城市；根据本县具体情况学习地委对新解放区城镇工作的指示及报纸上有关材料，并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入城纪律。定出规则，任何人都要切实遵守。

(四)在入城干部配备上，县级各机关团体要抽一部分较强的干部廿人上下，另建立城厢区区公所(主要干部抽调三区区委书记刘永国任区委书记，其它任职由张庭亮任宣委、邢克芳任组委、刘志祥任区长、李锦魁为派出所长、杨怀亮为团体负责人、王文治任武装部长，其它干部另行配备，并组织宣传队。

第三部分 具体工作

(一)入城后，首先宣传我党的各种政策，政府颁布布告，消除群众对我之怀疑，在宣传内容上，应强调

工商业政策及宽大政策的宣传,安定民心。领导上首先抓住商会,开明绅士、教职员、知识分子召开座谈会,一般群众要分街道召开会议,进行普遍宣传。

(二)捕人杀人问题要提出少杀人、少捕人,杀人捕人要经过一定的法律手续,除武装特务人人可以逮捕外,其余只有公安司法机关才有权依法逮捕人。杀人必须按规定手续办理,对伪组织人员除依法逮捕正副县长、党部书记、警察局长等少数罪大恶极者外,一般的伪组织人员不加速捕,并让他们向政府登记,交出武器文件,坦白交代、悔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对不登记人员应加以调查,使其登记,从工作中审查教育改造,特别要防止民兵趁机报复,乱捕人,乱杀人,领导上必须注意。

(三)对敌伪物资,武器弹药仓库粮食等由入城委员会统一接收,分别何归部队、何归地方,报分区分别处理,派纠察队专门看守;入库要登记,以防遗失浪费。

(四)对私人工商业一律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对罪大恶极敌特人员之工商业请示上级处理暂时仍可照常营业)。入城后应宣布布告,迅速使工商业恢复起来;召开商人座谈会,讲明我之工商政策,利用旧商会,恢复工商业。

(五)对村乡伪政权采取改造之方针,使他们能给我们办事,第一步可以成立维持会,以后逐渐改造。

(六)发动附近村庄民力及内地民工三至四个连摧毁敌人之工事、碉堡、鹿砦,发动群众去搞,可做烧柴及木材用;收缴遗散人员之枪支,进行登记,令其坦白悔过自新。

(七)在地方上除利用维持会,给我方做工作外,还从小商人、工人苦力、小手工业者中物色人才建立秘密关系,做扎根工作,打下基础。

(八)、建立城关派出所,加强城市治安管理工作,布置岗哨监视坏人之活动,对工厂仓库邮电等公共事业派人看守,防止破坏,加强社会管理。

(九)组织宣传队。可抽三五区小学教员及高小中较好的学生,25人至30人;任务是宣传我之政策及目前形势;扩大政治影响,用群众会、小片会、街头会、知识分子座谈会、黑板报、大鼓、街头刷去宣传,并在大街上刷写我之标语,将敌之标语涂抹,且翻印一些宣传品。

第四部分 几个问题

(一)政府布告内容:

(1)一切商民人等均应遵守政府法令,一律加以保护,各安生业。

(2)凡一切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工厂商店、作坊等)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学校、教堂等),一切有关社会公益事业机关(电话、邮局、医院等)及一切公共建筑、名胜古迹(仓库、古庙、古塔、苗圃等)一律予以保护,严禁拆毁、破坏、迁移偷窃,倘有故犯者,不论任何人均有权制止,并上报政府依法处理。

(3)对蒋傅伪军伪组织人员,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依法逮捕外,凡不再持枪抵抗继续残害人民,进行非法活动破坏治安的一般伪组织人员一律采取宽大不加速捕,并准其迅速向政府登记,坦白悔过交出武装文件,保证以后不再做坏事,如仍执迷不悟,继续为敌服务或发现有破坏活动者,予以严惩。

(4)凡属敌伪军用仓库及一切物资一律没收,任何人不得隐蔽破坏,如有遗散和私人保存者,立即向政府报告,登记听候处理。

(5)解散特务组织,严禁蒋傅匪特务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一切扰乱社会治安的偷窃抢劫不法行为,所有居民商店、工厂、客栈、饭铺均不得包庇隐藏特务匪徒,否则一经查出,当予严办。

(6)所有私人经营之工商业,均应照常自由营业,政府并加以保护。

(二)入城纪律(除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

(1)在军管时期,进入城市必须佩带入城证,否则禁止入城。

(2)一切入城党政军民人员,必须宣传党的政策,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禁一切破坏群众纪律之行为。

(3)一切缴获归公,任何人员不能擅自动用仓库、工厂、企业、商家之物品、保护工商业不能侵犯,对铁路车站、电灯、电话、医院学校、图书馆等,均须严加保护,不能破坏。

(4)对人犯之逮捕除司法公安可依法逮捕外,其他人不准乱行逮捕。对武装特务及杀人放火放毒爆炸等现行犯,可加以逮捕,但应立即送公安机关处理,不得擅自扣押处理。”

(5)对回教均须尊重其教规与风俗习惯,不得歧视。

(6)不许无故鸣枪。

(三)制定入城证章。在军管时期,干部民兵入城必须佩带入城证章,否则不许随便入城。纠查队进行检查。

(四)几个注意的问题:

(1)采购问题:要统一办理,由入城委员会指定出入口商店办理(有上级批准的例外)。不准乱行抢购物品,以防影响物价上涨,于群众不利。

(2)我解放城市后,重视社会管理工作,防止趁机抢东西,对我内地之民兵,应加强教育,防止其报复行为;一般群众混入城内发洋财,必须注意制止,在各主要路口要加强岗哨。

(3)对隐蔽敌之物资:枪支武器、秘密仓库、弹药库等要动员自报,可加以奖励,对调查属实而不报者,应予惩办。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我印象中的良乡解放

翁向新

进入1948年以后,良乡的街面上越来越紧张,天空中总是笼罩着一层恐怖的乌云。那些土生土长的还乡团,便衣队和巡警,不分昼夜地以“查户口”为名,对“乡亲们”敲榨勒索;成千上万的鱼肉百姓的“丘八大人”们,还在良乡地区演起了“走马灯”:今天开走了“青年军”,明天又进来了“0760”,刚应酬完“红三角”,又得问候“绥靖军”。你看吧,一会儿派款,一会儿要粮,弄得家家鸡飞狗跳墙。

到了秋后就更加混乱了,火车经常停运,店铺连连“歇业”。西门交易场里的枣桑树杈上还挂了好几个“八路密探”的人头。吓得老百姓谁也不敢再赶集上店了。又过了几天,交易市场竟变成了远射程榴弹炮阵地,炮口一会儿朝着坨里乡,一会儿又朝着南梨园村……白天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匆匆的过客也多是来去慌张、心神不安;晚上,家家都紧闭门户,挤在房舍里判断着枪炮声传来的方向,以便寻找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让孩子们睡觉。农历11月12日这天夜里,天黑得好像扣了个大铁锅,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之后,枪炮声嘎然而止,这更使全城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此时此刻人们的心里可真的没了底——不知熬过这奇怪的令人生疑的“鬼夜”之后,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福呢,还是更大的祸!?

第二天,1948年农历11月13日,老天爷出人意外地送来了个大晴天。清晨,东方的鱼肚白好象比往常亮了,太阳也比往常升起得早多了、红多了。当通宵达旦一直处在忐忑不安之中的人们刚刚产生一丝睡意的時候,突然,从大街上传来了分明是青年男子用传声喇叭喊出的清脆声音:

“老一乡一们,父一老一兄一弟一姐一妹一们:你们好!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已经占领了良乡城!从现在起,良乡解放啦!大家不要惊慌……”

人们先是坐在屋子里竖起耳朵听,接着是虚掩着街门从门缝里边窥视边聆听,最后,当看清喊话的是个背着绿挎包、脖子上系着条白毛巾的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时,大家才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慢慢围到他的周围,听他宣讲那一张张用石版印刷的布告。

良乡人第一次发现,他讲的每一份布告上,都不断提到“人民”这两个字。什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呀,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呀,还有“良乡县人民政府”啊,等等,等等。大家边听边小声议论着:

“什么叫‘人民’呀?是不是就是老百姓啊?”

“什么叫‘同志’呀?它跟国民党里讲究的‘同志’是一个意思吗?”

“‘人民’、‘同志’都说的不是‘官面上的人’……”

“共产党、八路军好象把老百姓捧得比官府还高哪!”

“是啊,你瞧他们讲的不尽是些惩处战犯、济世安民的新主意嘛!”……

解放后三天内的事实进一步给良乡的老百姓吃了“定心丸”:开进来的队伍,一点也不骚扰百姓。借东西不但“打条子”,还保准按时还;买东西一定为数给边区票或“大头”(银元),说话办事总是和和气气彬彬有礼……人们明白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真东西,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与“刮民党”、“烙饼队”就是不一样!

几天来,最欢实的要数青少年们了:

天一亮就向喊口令、敲锣鼓的地方跑,看那些戴皮帽子的解放军出操,看那些穿灰棉服的“土戏班”扭大秧歌;白天,又东跑西颠地去看新鲜景,打听新闻,然后再互相夸耀着、争辩着交流每人所掌握的情况,晚上,刚撂下饭碗就忙不迭地赶到城隍庙戏台去看《夫妻识字》、《兄妹开荒》、《为谁打天下》、《白毛女》和《赤叶河》等文艺演出。

经过这阵子的“打探”,我们发现:原来这些部队大部分是从东北进关来的老抗日联军;而那些自称是“宣传队”的“土戏班”也并不都是“唱戏的”。他们是“杂牌军”:有的是从西山上下来的“中央团校”或“平西剧社”,有的是“四野”的文工团,有的还是准备去接管北平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大官儿”呢。至于那些住在“县衙门”里的八路军干部,许多人竟是从房山、涑水或门头沟来的当地干部。

经过这几天的跑腾,我们还看到:国民党兵在街头设置的地堡,沙袋清除了,商店开业了,集市恢复了,连铁路、公路也都通车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乡亲们都觉得,良乡的天突然高了起来,地突然热了起来,路突然宽了起来,人也纷纷乐了起来,连空气都显得格外清新了。

没过几天,“宣传队”的一男一女到我家来,让我母亲帮他们照看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儿。从此,他们每天下班后就轮流到我家,一边和孩子玩一边给我们讲共产党、解放军是干什么的,“人民政权”是怎么回事儿,什么叫“同志”,什么叫“土地改革”……我几乎被这些名词、新事情迷住了。好几次都是端着碗忘了吃饭。后来,他们知道我喜欢唱歌,还一句句地教我唱了好些革命歌曲呢!

我家居住的地面,当时属良乡县一区(城关)第四街。到我家来访贫问苦的工作队长老傅同志和区妇联主任姜希文同志,串过几次门之后,就决定以我家和另外三家为“核心户”,进行扎根串连。先组织农会,然后着手建立街政府,组织民兵,搞土地改革……

等到正式举行那天，全街的老乡聚在一起，大家用“玉米豆选举法”进行选举(候选人坐在主席台上背向群众，选举人逐一到台往自己想选的人身后的饭碗里放一个玉米豆)，选举结果是：王四爷爷当选为农会主席，我母亲当选为妇联主任，还有另外几个人分别当选为街长、治安员、民兵队长等等。在宣布完主要干部名单之后，工作队长还当众指定我和另一名少年共同负责组织少年儿童团工作。

打那儿以后，我的精神头儿可足了，几乎天天长在农会和街政府的院子里。一会儿参加学习土地法大纲，一会儿帮妈妈到各家各户去收集支前军鞋，一会儿给擦枪的民兵打下手，一会儿又带小伙伴们练习扭秧歌或粘糊“欢送解放军南下”的小纸彩旗……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说来也怪，那时候，只知道乐，不知道饿，一晃就是一天。

1949年10月1日，良乡的城里人刚吃过早饭，就按行业按系统集合好队伍打着红旗往阎家大院(会场所在地)进发。良乡的乡下人更是不辞辛苦，一反了“多年不办‘响动’”的做法，一大早就从村里出来了。待到帮晌午，良乡城里已经开了锅：黄辛庄的龙灯会，卢村的少林会，南梨园村的高跷会，公议庄的钗会，肖庄的跑旱船，还有不知属于哪村哪店哪街哪户的“张老背张婆”、音乐会、“吵子会”、小幡会……一班接一班地全来了。可比逢年过节热闹多了！

会场上，新搭的高台上挂起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红幅，台口的两边各挂了一个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见到的扩音喇叭。上空是飘着白云的高高的蓝天，最深处的“背景”是那雄伟壮丽的燕山。那气氛既庄重严肃，又欢快活泼，人们一进来，就感到了盛典的声势之辉煌博大。

大会是用汽油发电机发电，用收音机经过扩音，再把天安门的实况广播，送到了每个良乡人的耳鼓里。让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共享这平步青云的幸福。

宣布开会以后，几万人的会场里竟然鸦雀无声，人们都在悉心地聆听生怕那庄严时刻从首都的心脏传来的每一点声音从耳朵旁“溜”过去，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听得真切听得详尽。于是，礼炮声也一样在他们的心中发生着震颤，《国歌》声也同样在他们的心底产生着共鸣。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人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会场上立即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便是锣鼓鞭炮齐鸣。国旗、彩旗舞动，帽子花束也抛向了天空……经过好一阵狂欢，会场才在组织者们的再三引导和“限制”下又重新安静下来。可是，当扩音器里转播完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并宣布阅兵式开始的时候，良乡分会场就再一次淹没在红旗、花束、锣鼓、欢呼的热浪之中。各村的“大会头”们也不知怎么那么齐心，转眼间都在就地打场子走起会来了。直到晚霞染满天际夕阳收敛余辉的时候，各村来的欢乐的人群才陆陆续续恋恋不舍地各自散去。

可是，没过一顿饭的工夫，夜幕降临星月未明的良乡城，变得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了。

原来，良乡县人民政府事先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把学校师生、群众团体和驻在当地的中央机关、部队的人们都组织了起采，又开始了灯笼火把大游行。他们还特地邀请了刚从天安门参加庆典归来的几十名军乐队员做先导，为游行队伍引路助兴。

由于良乡城仅有一平方公里的面积，回旋余地小，游行队伍从每一条街巷，每一个胡同穿行，也还有几处出现了“首尾相遇”、“各路会师”的交叉现象出现，给游行活动凭添了几分意想不到的兴头：每次“会师”时，军乐队就奏了一曲又一曲，我们学生则是唱了一歌又一歌，群众的口号是一声更比一声响，记者拍照的镁粉也一回比一回添得多……“中国共产党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呼，与歌声、乐声汇合在一起，引发得每个人都流淌出激动的热泪。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兵败如山倒 ——房山城解放记忆

王凤梧

六十一岁的人，我掐指算来，已是四朝遗老了。生于民国十六年，那年炮打涿州。十一岁(虚)卢沟桥炮响，中央军一退，便早早地当了亡国奴。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又迎来了退走八年的国民党，算是“光复”之民。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冬，炮轰房山城，终于解放。出生后的二十年，枪声断续，炮火明灭……

中央军和老百姓一块往南逃，就听大人们感叹：兵败如山倒。我提着鞋过河，问：“兵败怎么就山倒，不如人倒、墙倒、房倒呢？”姐姐推我：“快走！不走，你也倒了……”

十年后，我也成了“如山倒”的“败兵”中的一个兵犊子，那次是1948年底房山县城解放。

兵败如山倒，我起码有三次应该写入我个人的《王凤梧大事记》。一次是随大日本皇军、保安队、警察局被八路军从河北省献县城内赶出来……如果有一天要写，题目应该是《随皇军败走献县城》。第三次则有点象征了，那应该是《傻鸣，傻放，一败涂地》。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天气已冷，已穿上了老百姓赐名“老虎皮”的黄色棉军装。不知别人如何，我总一阵阵瑟瑟发抖。大概是隐隐炮声震的。先是大安山、红煤场的保安队偃旗息鼓、鸡不叫狗不咬地撤回房山城，跟着是坨里、长沟的各路诸侯也班师回朝。被称为“老佛爷”的保安队总队长张德祥，胸无点墨，一脸黄肉带着三分气，这回气更大、肉更横，骂人更多……

总部队设在县城北街中间路东。门口一个砖砌抹青灰的矮堡，供岗哨夜间避寒或作战之用。并不象电影里高墙大堡，但也给人森严之感。

这些日子，当兵的和老百姓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去匆匆，乱乱轰轰……

我待的是保安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大队长叫尤茂志，小个子，镶金牙，挺精神……大队长住坨里，现在已撤回房山城。三中队队长叫赵立亭，黑红脸，大个子，半文盲。三中队原驻北门里路西一个大院(现在的大众饭店一带)。大队部一回来，三中队被挤出北门，驻在北关安保安善家和王家店的路东大门院里，防线是城北一面。

前二年为巩固城防工事，在围房山城一周挖了护城河。引东、西沙河水入护城河，水深没人，河宽不可跃过。四门各设吊桥一座，白天放下供人过往，晚上拉起，内外隔绝。城上的敌楼、墩台都有班、排驻守。为防八路夜间攻城、爬城，又准备许多铅丝、棉花、煤油——一旦有事便以棉花团蘸油点燃系之铅丝，以作照明之用。

那时候，我一直是“上士文书”。我的文件只有一本《花名册》。官兵108名，军衔、职务、姓名、年龄、籍贯、枪支名称、枪支号码都在册子上。换枪、换人我就另行注册。我的字写得不管好坏，但必须一丝不苟；不然，中队长点名时不认识；他就要发脾气。我这“上士”上比官小，下比兵大。官儿称我“先生”，兵也称我“先生”，其实是个“自由兵”。

那时候没什么“觉悟”，连这个词儿也没听过。我老家饶乐府离城二里。秋粮收下来不等脱粒，保安队就大队人马车辆把带“瓢”的玉米拉进城……乡亲们哭喊、追赶、咒骂我能看得听得清楚明白……这时候就

有了盼“八路”早来的愿望——要说热爱共产党还确没达到那个高度。

房山城东北二里的齐家坡，西南一里的小山坡，正西二里的山顶庙和西北角附近的西北关，都驻有数量不同的保安队——大概即兵家所谓“犄角之势”。

八路军攻打房山城是从“犄角”开始，同时并举。趴在城墙垛口上几乎能看到攻方每颗炮弹炸落岗楼的砖、坯横飞……张德祥的重武器只有两门“八二”迫击炮。只听炮兵忽跑向东，又跑向西，大概是从城内给以火力支援。但是可以判断：此时已处于顾此失彼、乱了阵脚的形势。

作为文书、庶务等中队勤杂人员都既手无寸铁，也从未经过战事。我和宋芝（庶务）、吕士超（文书助理）等人没有防守任务——这时，三中队已从北门外撤回，负责东城防守。中队指挥部就设在东城敌楼中。

房山城为外石内土。为死守，早已掏土成洞，开射击孔……此时保安队的武装力量全被赶上城，中队长便叫我们躲在“洞”中待命……

事先，我已将棉便衣套入军装，行李寄放民家，身边带的只有一只图囊装着一本《花名册》，囊带上左系几双旧鞋，右系一搪瓷缸。最重最贵的是“美国救济总署”发给的一条劣质毛毯——我不懂“轻装上阵”，我只望随时“轻身”逃跑……

不到半夜（那时连中队长也没表）时，一阵脚步响到了洞口，有人叫：“马上撤，去北门大队部集合！”我们几个爬起就跑，根本也没见着中队长和别的人……那时从东门斜向北门是一片空地（大概是今天的、粮食局、北大寺之间），距离不到一里，我的外束皮带已经跑丢了。我们跑到北门里大队部门前，已不成队伍。此时，尤茂志指指划划、骂骂咧咧。我听他喊：“剪刀预备好了吗？”大队部文书韩宇文马上举起一把剪刀：“预备好了。”尤茂志说：“马上剪断电话线！”

一出北门已不成队形。吊桥虽已放下，可是踏板不全、横三竖四。人们逃命要紧，挤挤撞撞、嗔怨低骂，也有的掉下桥在河里呼救……一过吊桥就象决堤之水，齐头向羊头岗的方向流去……

原齐家坡的据点只有散落枪声，估计已被“八路”夺取，这就使溃退的保安队望而生畏。我的一位本家哥哥王全信是某中队的伙夫，他拉我一把：“咱们回家罢？！”饶乐府只离我们脚下一里多地，但中间就是齐家坡的岗楼。我说：“别价，要叫人家给一枪呢？！”于是随大队又跑……

什么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次我有了亲身体会。一枪未鸣，前面的人忽地卷回了头，后面的掉头就往回跑……大家跑一段听听，似乎明白了是自己吓自己，于是又返回头再向东北跑——目标是北平。

过了羊头岗村南就是大石河。大石河明流、潜流相间，我不记得涉水。这时，官兵已是相见而不相识……

今天回忆，那次败走房山，队伍虽乱，但全都默默无语——大概是官兵都只顾逃命，怕一谈话被人家发现——其实真也无话可谈。

天明，眼前一道不宽的河。这时有人说：“哑叭河，离长辛店不远了……”我回头看见，“八二”炮还被炮兵扛着，已没了炮盘；重机枪也没扔掉，可已没了脚架……光头的，光脚的，哭的笑的，开玩笑骂人的……身后，已远离“八路”，东方，已近望北平。听传说，房山保安队要进北平——一点生机，大概来自这点希望。

到了长辛店西的王佐，我已寸步难行。中队长不知身归何处。一位叫段玉恒的排长和我和几个兵自然结合成一伙，段排长已成为最高指挥。他指派二人去放哨，随时报告情况……我们进了一户农家，未见主人，桌上有白酒（也许是段排长自己带的，他好喝酒），锅里有还热的蒸白薯：土炕挺热，我们便喝酒暂息。不一会儿，岗哨报告说，八路已从西面追来……我希望不是八路，最好是保安队，那样我能多歇歇腿。岗哨咬定是八路，我们只好再走……庶务宋芝是附近村庄人。领我去投一家他的亲戚。人家已去北平，只有一个看门老人。此时我已不怕八路追上，便舀热水洗脚、换鞋——其实我已胸有成竹。

再回到“喝酒”的人家，段排长正找宋芝和我，准备撤退……我对段排长说：“你们跑罢，我跑不动，回家了！”他一愣：“你这身‘皮’，叫他们逮住就命了！”我解开军装扣子，叫他看，“我有便衣！”我把装

了《花名册》的图囊、搪瓷缸全给了他，只留下了那几双旧鞋……正好来了这村的保长。段排长说：“保长，照顾他点儿！”保长和我一对脸，原来是在天津学徒时的相识——他叫王殿荣。他说：“这不是风梧吗？快脱，跟我走！”我脱下那身“老虎皮”塞进灶洞……后来才发觉，连几十元“金元券”和一支钢笔也葬身灶洞了。

王殿荣相当经理或副经理的角色，在煤栈我只是学徒。他仍不失旧谊，以长兄之情安慰我，招待我。吃了他家一顿精致的小米饭、豆面汤……他一定留我，等局势安定再回家……

我自度：我只是个孩子。虽当了二年多“伪军”，我毫无民愤。乡亲们出城进城不方便，我常用“公章”给他们开证明……

西望房山已见家——我不必愧见江东父老。

饶乐府村公所正有工作人员为顽伪人员登记。我登记后，那工作人员相视之后，原来也算熟人：1945年他主持后朱各庄村选“国大代表”，我作为这村的教师，为他写标语，当司仪……有一面之识。他说：“你当过教员，就还在本村当教员罢！”于是，我第二天就又当了饶乐府小学的教师——北平尚未解放。

往事如烟，倏已四十年过去。时间、地点虽依稀可忆，但应有的历史的翔实，就不足了。不过，经历和体会却真实，因为我总是兵败如山倒中的一个成员。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七纵攻克房山城 人民彻底得解放

张成基

1948年12月5日，东北野战军结束辽沈战役后，入关与华北野战军联合起来，发起了平、津大汇战。首先将天津、北平、怀涿、新保安、张家口八百里战线上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对平、津两地包围圈形成后，党中央发出了“要扫清包围圈外的一切据点”的命令。房山、良乡城的解放，属于平、津战役外围战的一部分。当时平西地区部队都去包围北平，没有力量打掉这两个城市据点。上级领导决定，调冀中区七纵队二十旅来执行这个任务。

为圆满完成任务，七纵二十旅旅长刘秉彦率领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昼夜兼程急行军来到房山城南各村扎了营，指挥部设在顾册村。刘秉彦旅长首先和平西军分区前来配合作战的负责同志了解房山城敌人现状，并制定作战方案。当时房山城内除伪县级军、政人员外，各大乡的军、政、警、奸、特、匪、商、贸等人员都怕八路军吃掉他们，也逃进房山城，投奔靠山。城内单位复杂，人员很多，一片混乱，吃饭都成问题。房山城墙东西南北各一华里，城墙上筑有哨所四十个。东西两城门关闭着，只有南北两门开放。城外挖有护城壕沟，深一丈五，宽两丈。沟内有水，沟的堤坡上建有地堡，沟外地带埋有地雷。南北门外各有吊桥，白天放下，来往行人可走，夜间提起不能通行。城内有保安团一千五百人，团长张德祥，副团长陈亚林，配备各种迫击炮二十三门，重机枪六挺，轻机枪五十挺。驻房山城的大乡队四百多人。

房山城东南一华里是周口店至北平的公路。城东一华里是齐家坡，驻有夏村乡大队九十多人，紧急时有两个连的保安队增援。城西两华里是山顶庙，山高五百米，只有一条小路通庙内，庙里有坚固的工事，周口店大乡队一个连兵力驻守，有重机枪一挺，是房山城的主要屏障。城外西南半华里是小山坡，有炮楼一座，

工事坚固，驻有赵各庄乡大队六十多人，遇事有保安团一个连增援。北关驻保安团一个连和城关乡大队七十多人。南关驻保安团三大队，有迫击炮三门，保安团部设在城里仓房胡同、北大寺胡同中间，配有三门炮，两挺重机枪。西街靠十字街北侧是伪县政府所在地。

自二十旅来到房山城南各村扎下大营，我房山、良乡两县县委、县政府和县武装部及各人民团体积极向全县各村广大群众展开了政治宣传活动。从老解放区到新解放区，从山里到山外，村村都召开群众大会，由各级干部作形势报告，使人民了解我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全歼东北全部敌人四十七万的伟大胜利；了解中原解放军在淮海地区将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也层层包围起来，被吃掉的日子就在眼前；了解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把华北之敌全部包围在由天津塘沽至张家口八百华里的战场上，很快也要全部被歼灭。使群众知道在毛主席要扫清汇战外围之敌的命令下，上级调来了冀中区七纵队二十旅已对房山城实行包围，房山城解放大局已定。现在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克服困难，全力以赴地支援平津战役特别是攻打房山城的战斗。经过宣传发动，据不完全统计，我房山六区在四个小时内集中了六十辆运输大车、三十副担架，立即开往房山城前线执行任务。顾册村在三个小时内完成了一百多条麻袋的任务。顾册附近的一些村，发动大车、牲口。及时保证了军队粮草、烧柴等多项运输任务。民兵们积极完成带路、侦察敌情、站岗放哨的任务，妇女们昼夜不停地烧开水、做稀饭、煮鸡蛋。群众积极支援部队的行动，鼓舞了广大战士的作战情绪。

我二十旅掌握情况后，先将房山城实行包围。刘秉彦旅长当即给伪保安团长张德祥写了信，讲明当前形势。为使城市和居民免遭涂炭，要张德祥马上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张德祥接到信后，令王荫廷起草回信说，房山地小兵薄，候平津解放之后，不攻自降。在敌人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我军即按原定作战计划，向房山城发起了攻击。

首战先打小山坡，因其制高点位置重要，这里既可用火力支援县城，又能控制山顶庙上山的小路，站在坡顶，房山城内的大街小巷尽收眼底。敌人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坡顶上修建了一座三丈多高的炮楼。四外挖有射击掩体，在围墙外七、八米处有宽四米、深三米的壕沟，内外壁都是用石头砌成的，沟的各处都埋有地雷。沟外十几米处有铁丝网，网上挂有地雷和手榴弹，防范十分严密。

12月10日，刘秉彦旅长命令五十九团一营对小山坡据点发起攻击。一营长刘喜勤、教导员武文俊作了战斗动员后，命令一连主攻，二连支援，三连作预备队。晚八时攻击开始，敌人早有准备，向我猛烈还击。我军较开第一道铁丝网，扯响了网上挂的地雷和手榴弹，遭到了一定伤亡。想越过壕沟炸掉炮楼，因壕沟又宽又深；沟边上和沟底都埋着地雷，随时都能爆炸，后来用了两个五十斤的炸药包炸沟帮，未能炸毁。对岗楼枪打不进去，手榴弹扔不过去，就是扔了过去炸在外边，也不起什么作用。几次组织战士冲锋，都不能过壕沟。战斗非常激烈，枪声、爆炸声震天动地。经过近两个小时战斗，部队牺牲三十多人，伤者更多，战斗失利。营长、教导员请示刘秉彦旅长后，停止了战斗，撤出阵地。

刘秉彦旅长和平西分区领导分析了形势，认为我军初战不克，影响不好，应暂停攻打小山坡，转攻齐家坡。因为齐家坡地势宽阔，回旋余地大，便于攻克。又分析了敌人精神状况，据几天来从城里出来的人说，城里敌伪人员太多，一片混乱，都知道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人，淮海大决战已经开始，平、津两市至张家口一带的国民党军和傅作义军队也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包围起来，眼看也将被全歼，决不可能再取得胜利。所以房山城里军心涣散，都想逃命回家，和全家人团圆，只因为把守太紧跑不出来。由此可见，敌军战斗力一定有了很大削弱。只要下决心攻击，敌军必败。

12月13日，五十八团二营攻打齐家坡。当天拂晓，二营四连在山坡炮楼的东北侧八十米处构筑工事。近九点，二营长赵修直首先作了战前动员，而后部署六连攻坚，四连为二梯队，五连为预备队。九点整，攻打齐家坡战斗开始，夏村大乡队近百人、伪保安队二百多人顽抗。我军几次冲锋，都被还击回来，战斗失利。营长又从四连调来一个排交六连指挥，并命令六连作好第二次冲锋的准备。下午两点，我军再次发起攻击，

先用迫击炮曲射敌碉堡，再用平射炮直穿敌炮楼之后，二营教导员蒋志鸿带领突击队冲入敌军阵地。敌人军心厌战，士气低沉，七零八落，大部分向我举枪投降，求饶留命。三点零七分，部队攻占了齐家坡。此次战斗共俘虏敌伪军一百二十多人，缴获机枪四挺，步枪八十支，子弹三千八百多发。

12月13日晚，刘秉彦旅长命令五十九团一营第二次攻打小山坡，并亲临前线指挥。根据小山坡敌据点地势窄小、工事坚固的特点和火力点分布的情况，调来一门山炮，安放在小山坡炮楼西南四百米处，由三连保护。一连剩下的二十多名战士和轻伤员继续由西面以各种火力向敌人攻击，吸引敌人兵力，敌人拼命还击。这时我山炮连扣两发炮弹，命中敌炮楼门口和炮楼顶部，敌人震得东倒西歪，头晕体软，都失去了战斗力，顺地沟仓惶逃进了房山城里。我二连在山炮掩护下，从南面发起了主攻，为跨越壕沟，避开雷区，把事前准备好的两架梯子横在壕沟上，战士们一拥而上，占领了小山坡。

驻扎在山顶庙的敌人一听到我军攻打小山坡的炮声后，也担惊受怕起来。自感到也禁不住两发炮弹，所以屯居着的二百多敌伪军，也慌忙撤出阵地，向房山城逃去。这样，护卫房山县城的三大屏障——小山坡、齐家坡、山顶庙全被我军攻占。这时我军对房山城的战略部署早已明确，外围据点被攻克后，围住房山城的东、南、西三面，留下北面逼迫守敌逃向北平，以增加北平的吃喝压力。三面包围形成后，房山城内一片混乱。张德祥为首的伪军官兵各持己见，均无主张。张德祥向伪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电报告急。楚溪春回电，要张德祥率队死守房山，若守不住，就破坏城内重要设施，而后突围，向北平靠拢。如突围不成，则杀身成仁。最后，张德祥决定弃城逃往北平。于是慌忙烧毁伪县政府和县党部的一些文件，分藏了物资，并散布谣言，布置了潜伏人员。13日夜，伪房山县军政官员率保安队一千二百多人和各部伪职人员挤出北门向北平逃去。很多人出了北门就各奔他乡，溃散而去。只有张德祥为首的二百左右伪军和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以及从乡村躲到县城来的恶霸地主、富农等逃到南岗洼一带，发现到处是围困北平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北平逃窜是没有路可走了，只得向东南大红门一带逃去。

1948年12月14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从南门和北门进入房山城，受到了城里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部队入城后，在西街路南场地上集中，由二十旅副政委刘拱涛、县委书记刘祥庆讲了话。不久，前线指挥部命令二十旅除纵队漆副政委和刘洪涛副政委留在房山，协助地方政府作好接管工作，其余部队指战员迅速渡过永定河，奔赴廊坊，卡住北平、天津敌伪逃跑的要路。部队立即出发，撤出了房山城。城内的保卫工作，由房山县大队接管，还有民兵配合。

随部队进入房山城的有我房山县委书记刘祥庆、副书记崔乐春、县长杜恩林、宣传部长宋广宽、敌工部副部长隗甫林等人，还有第一批入城工作队。入城后首先宣布戒严七天。张贴军分区入城布告，公布治安公约十条，卫生公约十条，告示伪职人员登记，限缴敌伪物资和枪支弹药。入城第三天派出所开始登记核实户口。在俘虏处理处，五个干部一天内审查释放敌人抓来的新兵八百一十七名，暂处理伪政府、警察人员六十八名，审查监狱关押的犯人二十一名。另有专人清查登记遗留物资，分类入库。共计缴获七九步枪一百九十条，三八枪七十条，子弹三万五千二百发，手榴弹一百七十二箱，机枪身八个，迫击炮弹五十二枚，六〇炮弹一百五十二发。小米一万三千斤，玉米一百五十万斤，什豆四百万斤，黄豆一万五千斤，黑豆十二万斤，大米二千斤。未经登记部队运走弹药十五大车。部队一个团每人带走一百发子弹。肖克司令员派人取走电话交换机两台，电话机四部。

1948年12月15日，房山县政府由张坊迁入房山县城，人民民主政府第一次在自己的县城内办公。我人民政府入城前，曾在1948年7月18日召开的县委会议上制定了进城工作计划，并集中进城干部在石窝、尤家坟、双孝村进行了三次培训。这些工作人员入城后，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首先有组织地召开群众大会和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讲明接管城市后的各项政策，稳定每个人员情绪。中小学在三天内开了课，商店恢复营业，各项工作有秩序开展起来，人们都欢天喜地恢复了正常生活。

我冀中七纵二十旅攻克房山的消息很快被良乡守敌得知。冀中七纵二十旅兵发房山，很清楚是为平津汇战扫清外围，拔掉房山、良乡两座城市据点而来。敌人非常忧虑，考虑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已到了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首先想到的是负隅抵抗，觉得一旦平、津战役解放军打不胜，还能存在下去；同时想到辽沈大战已经结束，东北全被共产党解放，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包围平津，国民党取胜已无丝毫希望；向解放军投降是唯一出路，但想到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投降后害怕受到镇压。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当时良乡城驻有保安大队二十团的十二个连，一千五百之众，各大乡队龟缩到县城来的有二百多人，共一千八百多人。城内军心动摇，敌人造谣说：“这次解放军要和保安队决战。共产党把保安队都看成是反革命，捉住一个杀掉一个；就是当时不杀，审讯后，得到了要得到的材料后也是镇压为止”。许多伪保安队员和大乡队员由于对外界不知情况也就相信了谣言，准备顽抗到底。于是开始调整枪支，配足子弹，加固工事，准备决战。良乡是砖城，当时很整齐，又很坚固，城墙四面各建有六个岗楼，共有二十四个。城墙内部挖了不少通道和暗堡，也能往出打枪放炮。西门早已关闭。南门里斜街驻有二十团团部。东大街西路路北是伪良乡县政府，即原来大地主吴风金的宅院。城外有新旧两条护城壕沟，沟内两侧均有地雷并建有地堡。距良乡城一华里的纸房村驻良乡保安团两个营。在城东铁路东侧的燎石岗和昊天塔周围有地堡、壕沟，形成良乡城的屏障。

良乡守敌在加强武器装备、做顽抗准备的同时，也加强了情报工作。命令汉奸、特务、情报员加强侦察工作，严密注视房山城的战斗形势，如有变化随时报告。12月13日夜，特务报告房山城内守敌全部从北门撤出，向长辛店方向逃去时，良乡守敌乱了阵营，不知所措。还有特务报告，解放军要立即出发包围良乡城，敌人思想更加混乱。这时逃进良乡城的各村地主、富农、恶霸等有钱人达百户之多，他们要求伪军要向解放军决战，保住良乡，也使他们能活下去。如果保安团要走，也得带上他们。这些人家的老人和家财有的是用一、二辆马车拉着，有的是用四、五头骡子或三、四头毛驴驮着。军队撤走，怎能和这些人走到一起。最后有几名伪军官向前来请愿的头面人物讲明，当前保安队也危在旦夕，解放军已占领了房山城，很快就要攻打良乡。保安团已无法再战，要向北平撤退。随后，敌伪保安队和伪县政府及所有机关都作了简单安排，于14日清晨全部向长辛店方向逃去。

1948年12月14日，天还不亮，我良乡县委、县政府正在辛开口村集中开会，与接管良乡进城干部研究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时接到军分区命令，因琉璃河守敌逃跑，要良乡县委书记霍梁、县长闫振峰、武装部长晋朝明带入城干部火速赶至琉璃河。就在这时，大部分人还未到琉璃河又接到报告，良乡城守敌已于14日早晨逃跑。于是县委决定，将县里部分干部和三区、四区干部留在琉璃河，其余县区干部及民兵迅速接管良乡城内。14日上午，我良乡县区干部和民兵大队进入良乡城内。下午三时，由城南来了八十多人，其中有四十多人带着枪，这些人是琉璃河的大乡队、乡绅以及家眷，因不知良乡城保安团弃城逃跑，特来良乡城避难的。当时被我护城民兵发现，一个冲锋上去缴了他们的械，成了我们的俘虏。15日上午，燎石岗和塔坡上又出现了二百多敌伪军。经过侦察原来是良乡逃跑的敌伪军。他们跑到南、北岗洼以后，碰到的全是我围城部队，想去北平的目的已成泡影，所以返回。大队留在塔坡喘息，派人来城里联络，被我民兵捉住。县武装部长晋朝明立即派民兵将塔坡、燎石岗包围，让伪军联络者回去向伪军官报告，命令他们立即投降，免动枪炮，否则也要立即将其歼灭。敌伪闻之，无路可走，只有缴枪投降。良乡这支败兵，被我民兵全部收降。

我良乡县委早在入城前的11月28日，就制定了接管工作方案。由部队和地方组成入城工作委员会。部队政委任主任，县委书记、县长任副主任，敌工部长、社会部长、武装部长和城工部长任委员。因接管城市的都是地方武装，所以没有成立军管会。入城后，以政府名义宣布戒严和发布安民告示。首先向群众宣传我党、政、军的各项政策。分胡同或地区召开群众大会和不同人士的座谈会，消除各界人士对我的怀疑。接着对敌伪留下的一切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粮食、蔬菜由入城委员会统一查点登记入库，妥善加以保管。城市治安工作也同时进行，宣布对工商业一律不得侵犯。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广大群众很快恢复了正常

生活,我党、政、民、武也顺利地开展起了工作。

良乡县城解放以后,从河北省的西南部以及山西等地运来的粮草、肉类等军用物资都畅通无阻地运到围城的部队手中,城内街道、城外乡村也都成了远来的担架队和运输队休息的场所,良乡地区已成了围困北平的外围之地。中央领导彭真、叶剑英同志曾在良乡城里停留,商讨解放北平事宜。同行的还有赵振生(李葆华)、邓拓、范长江、钱俊瑞等同志。停留期间,中央领导对摧毁伪保甲制,建立人民民主新政权等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同志还特来良乡在城隍庙给四百多名进城干部作了报告。进城的局委办干部,很多人都在这里等待进城并听过少奇同志报告,原市农机局副局长边建平就是其中之一。

房山、良乡两城的解放,标志着房、良两县全境范围的彻底解放。至此,房山县、良乡县广大地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基本结束。领导群众恢复生产,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随着房、良两城的解放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一次收缴“地枪”的战斗

张成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属王佐地区的南岗洼至北车营等六十个村庄,由宛平八区划归良乡一区。在区委书记吕永珍、区长谭天瑞领导下,该区群众和其他地区一样,都在庆祝胜利,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各村建立了民主政府,并先后建立了抗联会、工、农、妇、青等群众组织以及民兵组织,有条件的村还建立了党支部,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内战。良乡一区处于战略要地,很快被国民党占领,并在该区南岗洼、王佐、魏各庄、北洛平、焦各庄五个村修筑了岗楼,由坨里和王佐两个大乡分别统治这块地区。我党、政、军对这块战略要地当然不能放弃,要针锋相对地坚持斗争,把各项工作由公开转向秘密。按着“区不离区”的原则,该区干部白天在山沟隐蔽,夜间去各村开展工作。除组织群众进行各种抗击外,还不断地对向人民进攻的匪徒,进行围追堵截的战斗。

1947年初,坨里和王佐两个乡的还乡团和大队,为了防止我军的铁拳打到他们的头上,除组织各村青壮年夜间站岗,发现我军政人员向他们报告外,同时采取多种手段阻止我方开展工作。在我军政人员经常出入的北车营、晓幼营、长乐寺、西市府、羊圈头等村埋地雷、下“地枪”。当时一区机关驻在三区的河北村,上万村是联系一区和三区的咽喉要道,去晓幼营、西市府、长乐寺、大富庄、后甫营、大灰厂一带,必须由北上万村通过。去南四位、魏各庄、王佐、南宫和南岗洼等村,得从南上万村通过。因此,坨里的敌人强制上万村以保甲为单位,对大街小巷,进出村路口,都要下“地枪”。“地枪”的来源是让各户出钱买一寸左右的铁管,组织当地红炉铁匠制造“地枪”,从大乡买黑色枪药,并给各户分配用破铁锅砸碎的枪砂子数量。坨里伪军把上万村作为重点,南北上万两个自然村,每甲十户人家,根据地形的需要,都要分给几支“地枪”,使用方法由坨里伪军和大队来教。很快把上万村布置得森严壁垒。

从1947年2月开始,在坨里伪军和大队的监督下,老百姓每天晚上把“地枪”下到指定地点,天亮

时再收回来。把上万村布置好后，还强迫晓幼营、西市府、长乐寺、羊圈头等村也尽快把“地枪”搞起来，给我方出去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针对这种局势，我良乡一区党委也研究了对策。首先，凡是到敌占区工作的人员，都要拿上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棍，在危险地带，推着这根棍在前边去挑“地枪”线，这样如碰到“地枪”拉线，“地枪”不响我们就退回来，绕着走过去。如挑响了“地枪”，也打不着人。其次，我们尽量不走有“地枪”村的正道，到无“地枪”村去工作。第三，如到村中办公地点和有关的户中去，要从后门走，或跳墙进院等。通过这些办法，我们仍然坚持向全区各村开展工作，但也发生过一些伤亡事故。例如在2月的一天夜里，我一区大队长王文志去魏各庄、南宫村一带工作，回来路过南上万村，在村西的路口上趟响了“地枪”，被打成重伤，抬到军分区后方医院马兰村进行治疗。手术时由胸部往下，膝盖往上，从深浅大小不同的四十多个刀口中，将枪砂子全部取净。养到11月初，才痊愈出院。

敌伪得知上万村“地枪”打中了良乡一区大队长王文志很得意，立即强迫上万村再增加“地枪”支数，增加枪位，要让解放军和武工队寸步难行。随之强制晓幼营、西市府、常乐寺、羊圈头等村也要尽快把“地枪”下好，堵住我军的出路。

在这严重危急的情况下，良乡一区区委书记杨义、区长崔景泉主持召开了全区干部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会上决定向良乡县委请示，对上万村必须给予强有力地反击，把这个“地枪”堡垒村彻底摧垮，扫除摆在我们出入口的障碍。同时也向县委请示，这场战斗由我区武工队来打。

良乡县委很快批示，同意对上万村收缴“地枪”的战斗请示。此次战斗山区干部和武工队自己进行，在收缴“地枪”战斗中，如有坚决与我为敌，抗拒不交的个别反动分子，可以就地击毙。大多数群众下“地枪”是被迫的，缴“地枪”后就地释放，不究既往。

2月中旬，区委立即集中全区干部三十多人，武工队四十多人，组成八十人的队伍。因为敌人掌握了我们在晚上的行动规律，这次战斗要利用一个早晨时间，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攻其不备，把“地枪”全部收缴上来。

我军出发前，把南上万村大庙中的两个和尚作为重点监视对象。因为据我们了解，这两个和尚是敌人的情报员，如发现我军、政人员到上万村，他二人就以打钟为号，向敌人报警。坨里和焦各庄的敌人听到钟声，互相电话联系，很快就出兵包围，这是他两个经常干的事。所以，这次行动对他们两个不能不防。于是就派了三班战士吴德恒专去大庙看管两个和尚，如没有反动行为，战斗结束后再撤出，如这二人有向敌人报警行为，可将他们杀掉。吴德恒走到庙前，大门没开，就翻墙进了院埋伏在钟楼里。这时我军各小组正在进入阵地，村中狗多，乱叫起来，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和尚感到形势不妙，肯定是武工队来了，慌忙去钟楼打钟。正在他歪歪咧咧地拿起榔头要打时，藏在—边的吴德恒举起日本东洋刀，砍掉了老和尚的右胳膊。老和尚东倒西歪地向屋内跑去，刚迈进门口，吴德恒又照他的左胳膊砍了一刀，他一头倒在屋内的煤坑里，当即身亡。这时五十多岁的小和尚从屋内跑出，吴德恒将他喊住，带到指挥部，交了任务。在全军撤出后，经领导研究，这个小和尚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情报员，带走他无用，便在鹰嘴岩由吴德恒把他就地正法。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的队伍分成若干小组，在天亮前进入阵地，这正是下“地枪”人出来起“地枪”之时。时间不长，我军各组看到村里起“地枪”人来到下“地枪”处，立即对他们大声喊：全都不要动，把枪扛过来，缴枪不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谁要反抗就开枪打死谁。起“地枪”的人一看是武工队来了，都很害怕，乖乖的提着地枪，向我军缴来。有的抖衣而颤；有的边走边说，我们可不愿意干这个呀，大乡队非叫我们下地枪不行，我们是没有办法才下的；也有的边走边求饶，你们是人民的军队，这回得救救我们，我们可不是愿意下地枪啊。各组都对缴枪的群众讲了形势，并告诫他们把“地枪”缴了回到家好好劳动，对他们下“地枪”的事，不定罪名，今后不许再干了。

收缴过程中，碰到了三个非常顽固的反动分子拒绝缴枪，我军就地将其击毙，除掉了三个祸害。经过两

个小时的战斗,把南、北上万两村各条街道以及重要路口的“地枪”大部分都收缴了上来。经过甲长和知情人等个别关系指点,又从户中搜查出来一部分。为防止敌人反击,把在场的保甲长集中起来,向他们宣布,还没缴出的“地枪”,限三天全部收缴上来,并送到河北天零宫庙。如有人抗拒不缴,一定要将其镇压。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战斗,我军胜利而归,敌人从此知道了我们的厉害,不敢再让各村下“地枪”,我军政人员又顺利地敌占区开展起了各项工作。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良乡五区“破交”战斗二三事

顾宪图 口述 隗有忠 整理

1948年下半年,正值华北解放前夕。9月初,军分区命令良乡五区组织民兵武装搞好“破交”(破坏敌人交通)工作,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和通讯设备,使敌人运输受阻,指挥失灵。当时,我任良乡五区武装大队长。接到命令后,我立即从全区抽调150名基干民兵,每人佩带枪支、手榴弹,保证“破交”工作进行。另抽200名民兵组成“破交”队,记得下英水村基干民兵小队队长殷庆兴第一个到区里报到。当时已进入秋收季节,为了使抽调的民兵安心搞好“破交”工作,区里召开了村干部会议,要求各村保证民兵走后要做好秋收工作。因此,这支“破交”武装不仅集中得快,而且斗志旺盛,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负责保卫“破交”工作的主力部队是县大队独立营,由县武装部副部长晋朝明指挥。经过战地动员,明确任务后,就开始了紧张的“破交”工作。具体任务是,铁路段包括良乡以北、长阳哑叭河以南和良乡以南从肖庄到窦店火车站;公路段从肖庄以南到琉璃河以北包括这些地方的电线杆。“破交”目的是配合当时的保定、清风店和石家庄战斗。我们每天晚上天快亮时出发,天亮回营,来回步行七、八十里。白天休息、学习、总结经验。天一黑就进入战斗,拆铁轨声、爆炸声、口号声惊天动地,附近百姓都能听到。吓得敌人夜间不敢出来,只好在白天仓促修复,还没通车,夜间又被破坏了。使得敌人交通瘫痪,进退不成,供给不灵,这样反反复复搞了十几天,搞得敌人惊慌失措。

9月10日,我们接到军区司令员高普命令,告之有一股敌人准备从徐水乘车向北平撤退,命令我们在肖庄一带“破交”拦截,不让敌车通过。接到命令后,我亲自带领一个排的爆破队奔赴“破交”地点。“破交”开始时,严密组织,各负其责。有的放警戒,有的埋地雷。埋地雷班共12个人,分3组,每组4人负责3个地雷。殷庆兴负责拉绳引爆。大约夜里12点,敌人的汽车队开过来了。敌人非常狡猾,开始一辆一辆分散行驶,拉了开段距离:不容易炸。放过几辆车后,敌人觉得没问题,便一下过来十来辆,车距也近了。我抓住这个时机一声令下,拉响了地雷,把前面的军车炸毁,后面的车也通不过了,敌人乱成一团,有效地阻截了敌人,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表彰。

大约在9月25日,我们决定继续破坏肖庄以南、窦店以北的一段铁路,由良乡县武装部副部长晋朝明带队。肖庄北面有我独立营一个排,警戒良乡的敌人。快靠近铁路时,走在前面的殷庆兴和民兵李曾(佛子庄村民兵指导员,当时任班长),忽然发现从东面黑古台方向走过一支队伍,殷庆兴大喊一声“口令”,对方回答“自己人”,随后就“砰砰”冲我们打了两枪。原来是一股敌人,我们立即组织反击,随后我们撤到肖

庄村的一户农家院子与晋朝明会合，研究敌情后，认为不能打，又撤到吴庄村。集中点名时，发现没有殷庆兴和李曾，我立即派人到沙窝村了解情况，才知道他们二人牺牲了。

两天后，敌人将两名烈士的头砍下来，吊在良乡西街集市的大槐树上。听到不幸的消息，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由于当时的麻痹大意，造成两名同志牺牲，我觉得对不住这两位同志。

为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们回到磁家务村，开了总结动员大会，并对两名烈士进行悼念。经过动员，全体民兵没有灰心丧气，对敌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大家决心把悲痛化为力量。我们一方面派人向区里汇报，同时协同下英水、佛子庄村党支部做好烈士家属的善后工作，另一方面继续组织新的“破交”任务。在破坏肖庄至窦店段的路时，民兵们各个象猛虎一般，炸毁了铁路，把铁轨翻到了路基下面。同时，把良乡以南、窦店以北的电线杆全部拉倒，将电话线剪下背了回来，使得敌人火车三天没有通行，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破交”任务。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作者隗有忠系原区民政局局长

一次特殊的战斗

任成利

1948年11月，我平西军分区部队从深山开到平原良乡县一带，参加了围困北平的任务。指挥机关设在大苑村，各战斗部队守护在铁路周围，防止敌人利用铁路向北平增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部下二十余万人全部放下武器，开出城外，接受改编。当时傅作义部下有一部分人不愿接受改编，整连的人集体逃跑，我们部队又增加了截击逃跑部队的任务。

过了一段时间，势态已趋于平定，我们部队于2月底驻到良乡城里。虽然良乡和房山两城已于1948年同时解放，但良乡城里的秩序还未完全改观，有一些老百姓尤其是孩子还是躲着我们走。我们耐心地向他们做宣传工作，解除了他们的疑虑。我们在城里进行了休整，还举行了小型的庆祝活动，欢庆北平和平解放。

当时良乡城里除了我们部队外，还有东北军的一个师在那里驻防。我们平西军分区司令员侯正果邀请了该师师长、政委和良乡县县委书记霍梁、县长闫振峰来我部举行了小型酒会，共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

我平西部队在完成了对北平的围城任务以后，于同年3月来到刚解放不久的河北省涿县驻防。涿县是北平的南大门，是军事要道。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派重兵把守，并在城墙上建了许多碉堡，城外还修了护城河。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

我们刚进县城时，老百姓对我们还不了解，小孩子见了我们就跑。过了几天，我们发现老百姓的大门只有门楼却没有门板。百姓们告诉我们，门板被国民党兵弄到城墙上修了岗楼碉堡。我们来到城墙上一看，果然如此。部队首长立刻命令拆除岗楼碉堡。

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同志们干劲十足，刨的刨，铲的铲，扛的扛。不一会儿就拆下来一大堆木料。

我们把老百姓都找来，让他们认领自家的门板，还帮助他们送回家去，没有用的木头就搬回伙房烧火。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城墙上的岗楼碉堡全部被拆除。看到自家的门板重新安装好，百姓们又高兴又感动。从此，他们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对我们也不再称呼“老总”，而是改称“同志”了。

当时，我负责拆南门的碉堡。有一天，我干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突然“轰”的一声，碉堡坍塌了，我被埋在了碉堡的下面。当我醒来时，我感到腰部疼痛难忍，不能动弹。这里离后方医院远，附近又找不到医生。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同志们请来了天主教堂的一位老教徒给我做按摩。一周后，开始能下地走动了。一个月后，伤势还未痊愈，我就带着伤痛又回到了战斗岗位。1983年，我因病到房山中医院照X光片，发现腰椎有两处陈旧性骨折，才知道是当年受伤造成的。

那次拆碉堡，虽然不是同敌人正面拚杀，虽然我身负重伤腰断三节，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使人民群众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来面目。由于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才有了我们最后的胜利。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炮声隆隆迎解放

段汝连

房山城解放五十周年了。当年解放房山城的枪炮声，穿土黄色军装的解放军形象，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解放军大队人马开到了房山城周围。顾册村是城南的大村子，住满了解放军部队。村中拉起了一道道电话线；攻城的双轮大炮在戏楼前摆放了一大排；村口有解放军站岗；搬运粮草、弹药的战士川流不息；村中四处升起了部队做饭的炊烟；沿街墙壁上有解放军战士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打到北平去，解放全华北”、“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派战前的繁忙景象，给村里增添了许多生气。

守城的国民党军，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是早有预感的。从1947年开始，便在房山城四周挖了深深的护城壕沟，沟里放满了水。在南关外的马路正中挖了一个大深沟，内侧筑起了暗堡。四城壕沟内侧也修了许多暗堡。城东的齐家坡、城西的山顶庙、西北关和城西南的小山坡等处都建起了与房山城相呼应的据点，挖了壕沟，筑起了碉堡。房山城是用花岗岩建的城墙，十分坚固。在1948年秋后，国民党守军强迫百姓拆除了城壕四周外面影响视线的房屋，玉米秸统统用铡刀铡短，防止解放军用来填壕沟，其余部分便一把火烧掉，百姓怒不敢言，心里盼着解放军早一天解放房山城。

因为要打仗，小学校临时停课了，不上课欢了学生。一位解放军宣传干部，把一伙孩子招呼到大庙里的一块石碑前，用粉笔在碑上写歌词，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解放区的歌曲。有的战士还让学生摸一摸大枪什么的，有说有笑很是亲热，大受孩子们欢迎。

一天下午，有三、四位解放军干部，在小学校北墙里侧用望远镜往房山城方向瞭望。我们几个学生好奇地凑了过去。解放军干部发现我们后并没有把我们赶走，还把望远镜放在我的眼前让我看。嗨！小山坡、磨

盘山一下子近了好多，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磨盘山半腰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猫着腰走动，在观察地形，房山城守军好象有所察觉，不时地放几枪。

我们家也住了解放军，临时让出了四间北屋的两盘大炕让解放军住，全家挤在西屋住，东屋夹道处临时支起了部队造饭大锅，炊事员每天要焖三大锅小米饭。冬天没有鲜菜，司务长找到我的叔叔，和气地说：“二哥，部队没有菜吃，把你家的腌菜卖给些，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每顿饭都是战士用小搪瓷碗吃小米饭和咸菜条，吃渴了，就到水缸里舀凉水喝，生活很艰苦。每天战士们都把院子扫得很干净，水缸里挑满了水，与国民党大不一样。有的战士借用剪刀、针线总是大娘、大嫂的叫，很亲热，借的东西用完了立刻归还。司务长的个子很高，黑脸膛，牙齿显得挺白，对人和气，一有空就和我叔叔拉家常，还把用纸卷的旱烟给我叔叔抽。

那天住在村里的解放军都上了前线，住在我家的只有司务长和炊事员留下做饭。饭熟后，炊事员用水桶担着往前线送。太阳快落山时，房山城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司务长爬上北屋房顶观看，我也爬了上去。从屋顶可以看到小山坡上的圆柱形大炮楼，有三层楼高，这个炮楼被解放军的大炮击中，一块块的掉下来，最后被削去了半截。敌军也朝顾册村打了几炮，炮弹丝丝地响着从头顶上空飞过，在村南爆炸。天黑了，只能看到火光，其他什么也看不清，枪炮声响了一夜。天快亮时枪声逐渐停了。太阳刚出来时，解放军战士们从前线回来，带回了房山城解放的好消息。一位解放军向我们介绍说，攻城是从攻小山坡和齐家坡开始的，敌人抵抗很厉害，这两个据点是硬打开的。城里敌人见这两个据点已被攻破，就逃跑了。战士们一个个满身是土，脸上黑呼呼的，有的军装被划破，露着棉花，一个个显得很累。开早饭的时候，大锅里剩下了一大半小米饭，大个子司务长坐在台阶上很难过，手夹着半截卷烟也不抽，叭哒叭哒掉泪，因为有的战士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房山解放五十年，五十年中房山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这正是当年那些穿土黄色军装的解放军为之战斗的目标和理想。房山人民会永远记住和怀念那些为房山城解放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岁月难隔一支歌

——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诞生地

董 华

大千世界，世事恍惚，有多少名噪一时的人寰迹象还在人们记忆中停泊？在岁月流程里，一时之盛的迹音被历史湮隔的太多太多，即使延存，有的也轻如浮尘枯若死灰了。然而，有一支歌，却在岁月流转中，越唱越响亮。历沧桑而亲切，跨世纪而音同，任凭世界风云变幻，咱中华好儿女唱他个大气磅礴，满腔豪情。这首歌曲的名字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题记

出北京城向西南一百多公里，很高很高的山上，有一个林木葱茏、山泉鸣响的村庄。它在地图上没有标

记,却因为革命战争年代培育人民文艺战士,一首凝聚民族情感、唱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在这里诞生,它便成为人们心神向往的地方。这就是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2001年堂上村春节在老党员交互走访中度过。新房的春联映着山地的积雪,山村街巷雪路响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老党员围着火炉交谈,身边有孩子看电视,老人脸上都漾出了幸福。聊着,聊着,就像有一个经脉互通心络,念道起来心里暖烘-烘的:几年前天津来的老文艺家曹火星寻访故地,经他确认,那首传唱半个多世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就是他在咱堂上村写成的,而且从堂上唱到了全国,咱老区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今年是建党八十周年,要是请江总书记为咱这里题词有多好哇!

炉火烤红老人的脸,老党员的心又跃起来青春的心跳。这一心愿由乡党委汇报到区委,得到区委的支持。党支部召集全体党员开会,六十六名党员在写给江总书记题为“让我们心中的歌代代相传”的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一封代表房山区八十一万人民、充满热烈期望的信,振动着心的翅膀,从白云生处飞向了北京!

这天是3月5日,农历“惊蛰”节。

信寄出以后,房山人民在盼,堂上村在盼。每日最早投照山地的霞光映照中堂庙的两道溪水,水流静静的,像是屏住呼吸,谛听着人间的消息……

度过三个多月日思夜想,终于盼来了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江泽民总书记为革命歌曲创作发源地题词啦!这消息传到堂上村,山村一片欢腾。江总书记的题词是歌曲的名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十一个温润敦厚的大字。

6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等领导同志来到堂上村参加革命纪念地的纪念雕塑揭幕仪式,慰问了堂上村的老党员……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堂上村,又迎来了新时期的光荣!

江泽民同志题词

二

1943年,谷子垂穗、核桃满瓢的秋天,从堂上村西边山道上走下来四个背着挎包、打着绑腿,年轻的八路军“工作人”。他们是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的小分队。地下党组织接应,住进了堂上村的“中堂庙”。

这四个人分别是曹火星、赵艺平、赵克、张学明,此行任务是宣传抗日,组织村剧团创作演出抗日文艺节目。

堂上村1938年成立党支部,抗日烽火燃遍的太行山有党的影响,文艺小分队的到来,受到村里穷苦人欢迎。小分队白天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儿童革命歌曲,晚上手提马灯发动群众,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小分队中,曹火星不仅革命斗争意志坚决,还因为他参加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的学习,有比较系统的文艺知识和专业修养。到堂上这一年19岁,可已是一名年轻的“老文艺战士”了。他13岁当儿童团长,15岁任平山县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铁血剧社”音乐队长。在艺术学院学习期间,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即为触动时代风云的《上战场》。学习结束,他已经能够成熟地进行创作了。《统一累进税真正好》、《选村长》、

《养娃娃》等歌曲，在冀中冀西一带很受民众欢迎。1943年“铁血剧社”转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剧社更名“群众剧社”，他又创作了歌曲《春天里喜洋洋》、《春耕忙》、小歌剧《万年穷翻身》和谱曲歌剧《过光景》，同样得到群众喜爱。此来堂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半年时间。

曹火星战火里生，战火里长，战火对他革命战士的考验和艺术的锤炼增长，是任何环境都无法比拟的。19岁的曹火星不仅已经具有了坚定信仰，而且成为政治觉悟很高的文艺队伍里的骨干。歌颂共产党、批判蒋介石、鼓舞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魂。一颗心似铁，三寸笔如枪，他乐曲里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射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喉咙、令人侵者胆寒的子弹！在堂上村，他和老乡一样吃杨树树叶，睡土炕，而谱写的四支歌曲却迸发着刚强。这四首歌有两首宣传共产党抗日，有两首批判蒋介石真反共、假抵抗。

四首歌创作出来，中堂庙成为了村里大人孩子最乐于去的地方，愿听曹老师教唱歌。曹火星住地火炭似地吸引人。教唱熟了以后，曹火星隐隐感到还有一种宏大的精神未抒发出来，既总体概括这四首歌内容，又真实反映抗战形势，鼓舞人民朝着解放的道路迅跑。这首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曹火星苦苦地思索。清晨，他拧着毛巾在溪水边洗脸时在想；夜晚，站在庭院观看高山、望着满天星斗在想。革命生涯虽然还短暂，但一腔男儿热血的他却经受了中华民族最为惨烈的时期：日寇铁蹄入侵，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国势虚弱，蒋介石“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只作消极抵抗而全力对付共产党；民族危亡中，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抗战……这一时期无比丰富的史实积攒他的心胸。还有两幕锥心刺骨的情景他不能够忘记，而且就发生在来堂上村之前：日寇到河北省阜平县野厂镇扫荡，用枪逼着把全镇老百姓赶到麦场上，用机枪对着一千多名老乡疯狂扫射，藏在母亲怀里的婴儿也被日本鬼子拿刺刀挑破肚肠，当曹火星随队伍赶到，看到这一悲惨景象时，他和战友忍不住大声痛哭。随后，他从弟弟口中得知发生在老家平山县西岗南村的惨事，他的父亲和堂弟同全村人一起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国破尚如此，蒋介石却还装神弄鬼，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狂言：“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这一无耻之言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延安的《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等文章，并于1943年8月25日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用理论武器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澄清了事实。虽身在堂上村，这一论战的实质曹火星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在政治上真与假的较量。曹火星又回想起抗日根据地军民保卫家园、建设民主政权生机勃勃的情景，禁不住心潮起伏。由自己的身世、

1943年，曹火星在霞云岭堂上村中堂庙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家庭遭遇，联想到目前形势和根据地展现出来的希望，曹火星只觉得耳边响起隆隆的大音，一条火龙在云海里盘绕穿行。他的创作思路出来了，一个伟大的主题降落笔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坐在土炕席的炕桌旁，就着一闪一闪煤油灯的亮光，心里感情就像蓄满的库水，开闸而出！这一天夜晚，一首气壮山河的歌在堂上诞生了！

为了便于传唱，曹火星采用的是当地流行的“霸王鞭”曲调。

他先教抗日小学的孩子们唱，再教村剧团唱，很快全村老少都会唱了这首歌。拴在霸王鞭绳上的铜钱儿响，新编的歌唱得人心眼儿亮；唱醒了大山，唱红了太阳，唱得中堂庙溪水哗哗响……

曹火星的小分队完成了堂上的宣传任务，回到专区去了。回去正逢专区办县级干部学习班，涞水县的一名干部要去了歌曲，第一次油印成歌片子，在县里传唱。后来，边区在易县办一千多人的干部学习班，曹火星又教唱了这首歌。这首歌便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流行了。1945年9月12日，《晋察冀日报》首次在报纸上登出了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曲，只改动了原歌词“坚持抗战六年多”为“坚持抗战八年多”，从此这首歌传唱全国。

三

在日寇侵略时期，堂上村虽山高地远，也经受了劫难，全村房屋被全部烧光。民生寒苦，常以树叶、糠菜充饥。经曹火星小分队的宣传发动，堂上村对敌斗争情绪高涨，共产党的主张被群众接受。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生活有了指望。

曹火星小分队在堂上这一段时间，村剧团得以巩固，教会了很多抗战歌曲和小戏剧。曹火星他们走后，村剧团开展活动仍然很活跃。在八路军独立团队伍保护下，二十几人的村剧团到一百里以外演出，一去就是十几天。演的小剧目有《血泪仇》、《日本鬼子抓壮丁》、《大后方》等。当表演出现日本兵欺侮中国人时，台下也反映强烈，和台上共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革命口号。堂上村剧团为抗日宣传，也发挥了作用。

当初跟曹火星学歌、打霸王鞭的抗日小学的学生李福会、李增生、李增光、李万荣是接触曹火星最多的人，如今有的健在，有的去世了。当初学唱的革命歌曲，有的歌名记不住了，但歌词儿记得很牢靠，比如这两首歌词，就反映了时代特点——“吃了我们小米干饭倭瓜山药蛋，吃饱了上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出中国，至死不当亡国奴！”、“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田庄课堂。脚步靠着脚步，臂膀靠着臂膀，我们的队伍光大强壮，朝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我们就要坚持大众的国防！大家拿起武器，打倒汉奸走狗出中国，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努力奋斗，杀！”。有一首《太行山青年》，他们记忆很完整，一并录下：“我们是太行山的青年，我们是晋察冀的好汉！我们爱祖国，站在祖国最前线；我们爱家乡，保卫家乡上战场！嘿！我们太行山青年，我们要做好学习工作，站在前面，走上前线，伤民的模范！我们弟兄千百万，我们决心铁一般！我们是太行山的青年，我们是晋察冀的好汉，我们爱家乡，保卫家乡上战场！”。虽然远隔了时代风烟，但听着这进行曲速度的旋律、看着沧桑老人手拍膝盖入神的唱，我们谁也止不住眼眶发湿，胸口发热。

被抗战热情和反抗国民党统治情绪鼓舞起来的堂上村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过很大贡献。他们待八路军、子弟兵情如骨肉，家有一捧粮，送给战士吃，自己宁肯吃糠咽菜；家有一盘炕，留给战士睡，自己宁肯睡柴房。抬担架运伤员，做军鞋补衣裳，打造石雷锤声连夜响，运送弹药自家毛驴赶得忙……堂上这一块山呀，既是后方也是前方。民兵组织也很强壮，当民兵的李万荣用一把铁锨，夺了侵犯堂上的日本军官一支手枪。民兵们随八路军队伍出征，星夜拆铁路、平战壕，搞得敌人不得安生，支援了平津解放。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以至抗美援朝，都有堂上村好青年上了前线。今日问起当年参加革命队伍的动机，他们被岁月镂刻的脸上表情很平静，以农民的朴实说明心迹：“共产党能帮助穷人打天下，从那时就看出跟共产党走有出路。”

四

曹火星离开堂上，重返故地，是五十年之后。一别就是五十年。他惦念这块热土，惦念这里的乡亲，还惦念在这里遗洒的青春。他回天津以后，先后给堂上来过两封信，表达了他情深意重的感情。

第一封信写于1994年9月23日，信文如下：

“我50多年前，1943年9、10月间曾在你们村工作过一段，当时是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为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政策，我们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深入到平西区来工作。我和三人分配到当时的房涞涿县搞宣传活动，动员人民积极抗战，粉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在堂上村给村剧团排戏，教霸王鞭等。我曾为霸王鞭写了歌曲，其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歌，从堂上村教孩子们唱起，一直流传全中国，传唱到今天，是堂上村广大人民群众给了我支持和帮助，特表示诚心的感谢！

在堂上村工作期间，村里给我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永生难忘。歌从堂上村唱起，传遍全中国，一直唱到今天，也是堂上村父老的光荣，祝你们一切顺利，祝全村人民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第二封信写于1997年8月15日，此时老人眼已患严重的白内障了，但繁体字仍规整地写在方格稿纸上：

霞云岭乡堂上村和四马台村的乡亲们，你们好！

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二周年之际，向我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原平西房涞涿县霞云岭堂上村和四马台村的乡亲们致以深情的敬意！

回顾在那艰苦岁月，是你们坚持抗战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深信今天的堂上、四马台等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使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水平前程似锦……

很遗憾，因身体不便不得前往看望乡亲们，天津友谊合唱团将带去我们的问候和思念之情！

谢谢乡亲们！

火 星

关于曹火星原创歌曲是谁加进了一个“新”字，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有记载，是毛泽东提出加进去的。增加了一个字，就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表述得更确切了。

风器云裹有时尽，高山流水无绝期。一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何以从上世纪唱到新世纪，从战争年代唱到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越唱越响亮，常唱常新？就在于这首格言式歌词准确地表达了人民心声，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宗旨；岁月不居，人心可鉴，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就是洗雪国耻、图国家统一富强、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历史上，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着人民利益百折不挠、艰苦努力呢？年轻的一代未有像我们的父辈祖辈一样感受过翻身解放、推翻旧中国的欢乐，未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复杂的政治风云，但从自己身边用心计数与前辈人的不同时，回想回想我们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录入镜头的查尔

斯王子那像乌鸦绕树三匝一般离开总督府颓然的表情，不也能感悟到我们党的光荣和伟大吗？

咒逝川的时代过去了，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只要时间不倒流，我们前代人唱的歌，就会由我们传给子孙！

而今的堂上早非曹火星作歌时的容颜了，站在高高的山地上，你除了感受到山谷里氤氲的雄然大气，还可发觉山村迈入了现代生活。以绿色生态为依托，数万株的精品核桃园已经成型，还将开发鱼谷洞，发展旅游事业。握惯了锄把子的手，大概要与锄把子解脱了。

乡村两级干部表示，一定认真贯彻传达区委区政府精神，引导群众领会江总书记题词的深刻含义，把山区工作做得更好。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京郊大地蓬发的人间好景，后人会接续述说……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周恩来总理视察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实录

王雨华

1971年10月9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前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参观。这天上午，秋高气爽，十里总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数千名总厂的干部职工簇拥在大道两旁，兴高采烈地迎接贵宾的到来。

上午十时左右，一列红旗牌轿车车队开来了。车停后，在第一辆车上下来的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后面车上下下来的是塞拉西皇帝和其他贵宾。周总理和迎上来欢迎的总厂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彭树楨等同志亲切握手，并把彭树楨等介绍给外宾。然后总理陪同外宾健步向厂办公楼走去。一路上，总理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有时还停下来和工人群众亲切握手。

来到接待室，贵宾们入座后，彭树楨致欢迎词，然后介绍全厂概况。

1971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北京石油化工总厂

(当彭谈到炼油厂一、二期工程

(赵思敬 提供)

11套装置已在1970年前建成投产，另外还有4个化工厂〔指胜利、向阳、曙光、东风化工厂〕正在陆续建设时)

总理问：这些化工厂什么时候建成？

彭答：七三年全面建成。

(当彭谈到投资问题时)

总理问：现在完成了多少投资？

彭答：现在一共用了三亿七。

总理问：还要用多少？

彭答：还要用三亿三。

总理：节约一点嘛！七亿还行吗？建设这么一个厂要这么多投资不行啊！不能给那么多了。我们还要支援外国朋友。花这么多还行啊？要很好地发动群众，和工人群众商量。

(当彭介绍到厂区环境时)

彭(指图)说：这是燕山山脉。

总理问：这个山有多高？

彭答：(指装置南边的山)这边这个有二百六十多公尺，(又指北边的山)这边的有三百四十多公尺，后边最高的有一千二百多公尺。

(当彭介绍到水源问题时)

总理问：附近有水吗？

彭答：有水源。

总理问：是地下水吗？

彭答：是地下水，是外边引来的。

总理问：你们这里一共要用多少水？

彭答：一共要用 2.6 个水(指每秒立方米流量)，现在能解决 1.8 个水，整个水还解决不了。

(当彭介绍到炼油厂生产能力由年处理二百五十万吨原油提高到五百万吨时)

总理：你们不要说假话。

总理问唐克(石油部副部长)：达到多少？

唐克：他们经过技术改造，标定能力可以达到五百万吨，但实际生产没那么多。

(当彭介绍完了)

总理问：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给指一下。

彭答：(指图上厂办公楼外宾接待室所在的地方)在这里。

总理：你把参观路线介绍一下。

(彭介绍参观内容和路线)

总理问：先到炼油厂、橡胶厂，最后到污水处理场吗？

彭答：是。先到炼油厂、橡胶厂，后到污水场。

(总理要求介绍厂区进出路线，彭于是介绍由房山，经凤凰亭进厂，过胜利化工厂、炼油厂、东风化工厂、向阳化工厂、曙光化工厂，然后出厂)

彭答：我们厂区整个是一个循环路。

总理问：你们一共占了多少土地？

彭答：三百公顷。

总理：三百公顷？土地也占多了点。

(当彭介绍完毕坐下后)

总理：总投资多了点。

塞拉西(对彭)：你刚才介绍得很好。我非常感谢你。

彭答：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总理和外宾站起来，走到规划图前，仔细观看，询问了一些地方，彭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总理作了四点指示)

总理：听了刚才的介绍，我觉得你们这里存在四个问题。第一，运输的问题要解决。用火车运不行，得用管道运。第二，水的问题要解决。第三，工人太多了。第四，投资太多了，要压缩。你说七三年全部建成，原材料有困难。写报告时要把这个问题写上去。

(总理做完指示，陪同外宾朝接待室外走去。当总理走到门口放着油样的展品柜前，停下来仔细观看)

总理：(指着展品)你们布置得很好，很朴素，这样展览很逼真，一看就清楚。今天介绍得很好，你们跟红卫兵不一样，介绍得很简单，随便。要是过去，至少要一个上午。你们不是先讲最最最。

塞拉西：你们成绩很大。

彭：这是总理领导得好。

(总理一行看完展品往外走，在门口见到接待员付文贤等同志)

总理：(亲切地问)你们是不是这个厂的？

众：是。

总理：(问小付)你多大了？

付：十九岁。

总理：是中學生嗎？

付：是。

总理：你们今天这样很好，很有秩序，不象红卫兵时那样了。

(总理作了个立正姿势)

付：(笑了笑)。

总理：(跟小付握手)你们这样很好，很随便。

刘关秀：(接待室负责人之一)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总理看后多指教。

总理：我在里面已经讲了，你没有听见吗？我再说一遍。四条(掰着手指说)第一，运输线太长，第二，水源要解决，第三，投资太多，第四，工人太多。

总理问：你们这里多少青年人？

彭答：青年工人占百分之七十。

总理：那么多？

(贵宾们出办公楼上汽车，到炼油厂南常减压车间参观。总理和塞拉西皇帝在操作室门口与干部、工人一一握手，然后进操作室)

(孙伯成一总厂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给总理介绍情况，谈到记录仪表是国产的上海电动仪表，总理点点头。接着，总理询问了仪表的操作情况和装置的生产情况)

(总理见到操作员吴万金等同志在仪表盘前)

总理(问吴)：你多大了？

吴答：三十四岁。

总理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吴答：石油学院毕业的。

总理问：干了多少年了？

吴答：六五年毕业的，干了六年了。

(总理跟吴握手，又问旁边的男徒工徐庆华)

总理问：你是哪年进厂的？

徐答：去年进厂的。

总理问：是中学生吗？

徐答：是初中毕业生。

总理问：今年多大了？

徐答：十七岁了。

(总理点点头，很高兴。接着，又同旁边的赵庆中同志握手)

总理问：你多大了？

赵答：二十三岁了。

吴：他是从大庆调来的。

总理(很高兴，热烈地同赵握手)：你是什么地方人？

赵答：东北人。

总理问：你讲的太宽了。

赵答：是黑龙江的

总理问：你是哪个县的？

赵答：是××县的。

总理问：你们一个班多少人？

赵答：七八个人。

总理问：这么多？

孙答：七八个人一个班，管整个车间。

总理：噢，是这样。

(然后，总理高兴地向塞拉西皇帝介绍)

总理：(指吴万金)她是一个大学生，当了六年工人。(指徐庆华)他是一个中学生，当了一年工人。(指赵庆中)他是从大庆来的。

(当总理陪同外宾走出操作室，欢迎的队伍中有一个青年女工想跟总理握手，车间主任拉了她一把，正好被总理看到)

总理：(笑着说)你不要拉她嘛！应该理解她的心情。(然后走过去同那个青年女工热情握手)

(女工高兴地指着车间主任向总理介绍：他是我们连长[当时车间主任称连长]，总理又同车间主任握手，同时又同其他许多人握手)

(当总理往催化车间走去时，陪同总理的孙伯成对总理说)

孙：我们给外宾介绍是二百五十万吨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进行了改造，这一套(指南常减压)是三百五十万吨，还有一套(指北常减压)是一百五十万吨，一共是五百万吨。

总理：(笑笑说)我也没有这么多油给你炼。

(来到催化裂化装置)

孙伯成：(向总理介绍)这套装置，我们原设计年处理量是一百二十万吨，现在经过改造，已经达到一百四十万吨。

总理：(高兴地说)很好。

总理：(看到加热炉烟囱，高兴地说)你们这儿没有黑烟。

孙：我们还有些废气没有利用上，用火炬烧了。

总理：气都要用上。

(参观完催化裂化装置，贵宾们又乘上轿车去胜利化工厂参观)

(在橡胶厂单体车间附近，有许多穿工作服的同志拥挤在那儿)

总理问：这些工人白天不上班吗？

孙答：他们都想看看总理。

总理：这样不好。

(总理往前走，看到装置的烟囱冒着一股浓浓的黄烟)

总理：(指着黄烟)那儿冒黄烟，有毒啊！(对工人们说)你们要想办法把黄烟消灭掉，要树雄心立壮志嘛！

(总理向路边的欢迎群众招手，鼓掌，致意。见到一个女工年龄较小，便走过去)

总理(亲切地问)：你是什么时候进厂的？

女工答：去年。

总理问：安心不安心哪？

女工答：安心。

(总理又见到一个年近三十岁的女工)

总理问：你干了多少年了？

女工答：十年了。

总理：你应该好好教她们(指徒工)。青年工人要好好学习，老工人要带好头。

(总理往前走，又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象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总理(走过去问)：你干什么工作？

女同志答：设计所的。

总理问：是石油学院毕业的吗？

女同志答：设计所的(很紧张)。

总理问：你参加劳动没有啊？

女同志(红着脸)答：没有。

总理问：(严肃地)不参加劳动不好，知识分子要参加劳动。

孙：她来的较晚。我们准备让他们结合实际设计工作参加劳动。

总理：那好。

(总理走到橡胶厂成型车间门口时，有一批在门口欢迎的女徒工伸出手争着要和总理握手，总理看到人太多，太挤)

总理：唉，这样不行，太乱了，不行。

(总理来到橡胶成型机房，观看出胶，有一个青年女工手捧一团胶花向总理介绍，总理很高兴)

总理问：你干了多久了？

女工答：进厂一年了。

总理问：安心不安心啊？

女工答：安心。

总理说：要好好干，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

当总理来到聚合釜旁时，对孙说：我刚才看到那里有黄烟冒出来，有毒啊！应该想办法把它消灭。

孙：我们准备配甲烷当燃料烧掉。

总理说：烧掉是下策，放空跑掉是下下策，应当把它综合利用起来。

(参观完橡胶厂，贵宾们又来到炼油污水处理场，观看了显微镜下的活性污泥活动情况，参观了隔油池、浮选池、曝气池、养鱼池、养鸭池等。彭——作介绍)

彭：(指着养鱼池说)这是处理过的污水养的鱼。鱼能养活，说明污水过关了。

总理：你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对世界的贡献。这是个大问题。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嘛！这是毛主席的话。

(接着，总理又去看了用污水浇灌的水稻田)

孙：(过去摘了一颗稻穗给总理看)这是天津小站稻。

总理：噢，是天津小站稻(仔细地看，然后送给塞拉西看)。

总理(问彭树桢)：现在污水处理达到什么水平？

彭答：处理后的污水可以灌溉庄稼。

总理：你们污水处理得很好。污水处理在世界上也没有解决。你们还要继续努力。要发动群众，提出讨论，你们一定要消灭黄烟。我在非洲参观过一些炼油厂，他们的废气烧掉了。他们的装置是意大利的。

(参观结束后)

彭问：回办公室？

总理：我们就从这儿回去了。

塞拉西(对彭)：你们介绍得很好。非常感谢！

彭：这是我们总理领导得好。

塞拉西：感谢您(对总理)，非常感谢。

总理：感谢您，感谢您来参观。

我们就在这里告别了。(同外宾——握手，送他们上车)

(外宾走后，总理又对彭、孙叮嘱)

总理：水源还得找一找。要解决水的问题。

彭：准备在上方山搞个水库。

总理：那好。还要用投资三亿三，不能要那么多了。要节约，我看要压缩投资。工人多一点不要紧，可以为别的厂培养后备力量，可以一分为二嘛！你们要节约投资，要和工人一起讨论。要把污水处理好，综合利用是个大问题，要立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污水过关了，对全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总理与彭、孙等同志——握手，告别，乘车离去。总理离开时，大约中午12点20分)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作者系《燕山油化报》总编辑

胡耀邦同志视察大韩继铁厂纪实

顾宪图 隗有忠

1958年9月底的一天上午，区委书记李明通知区工业局局长顾宪图、团区委副书记隗有忠速到他的办公室。当我们来到办公室，李明同志正向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汇报周口店区在大跃进运动中工农业生产的形势。见到我们进来，李明把我们二人介绍给耀邦同志后，胡耀邦同志简要问了顾宪图全区工业情况。然后，隗有忠汇报了团组织在大跃进中如何发挥作用的简要情况。

中午，耀邦同志在区委吃完饭后，我二人陪耀邦同志去大韩继铁厂视察。到铁厂后，从车间找到厂党支部书记罗玉庆。耀邦同志首先听取了罗玉庆的汇报。当汇报到全厂800多工人，有3座炼铁炉，半机械化生产，日产最高到15吨铁时，耀邦同志很关心地问：“赔不赔钱？赔多少钱？”因罗玉庆到厂时间不长，一时汇报不上来，顾宪图回答：“每吨赔80到100元。”耀邦同志沉思片刻后，站起来说：“咱们到车间看看。”来到炼铁车间，见到工人个个汗流满面，耀邦同志向工人喊：“同志们好！你们辛苦啦！向你们学习！”走到炉前，见到装炉的铁矿石很大，耀邦同志问顾宪图：“为什么不搞烧结？”顾宪图说：“只有一台旧粉碎机，还不好用。”耀邦同志点了点头，又问罗玉庆：“你们工人中有多少青年？”罗玉庆回答：“有三分之二。”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工人生产情况，耀邦同志又让找三位青年工人，开了座谈会。耀邦同志既关心生产又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身心健康。问他们：“累不累？上过几年学？想不想家？有没有对象？”这时，把大家都逗笑了。最后问到谁干过炼铁厂工作，只有炉长魏长荣回答说：“在首钢学习一个月。人家是机械化生产，我们是半土半洋。”耀邦同志听后说：“你们半土半洋炼铁也很不简单，希望你们学习好科学知识，将来也搞机械化生产。”

最后，耀邦同志把我们叫到一起问：“一天赔一千多元，能办下去吗？”顾宪图说：“国家缺铁就要炼，不能算经济账。”耀邦同志又说：“你们应该搞联合企业，炼铁带炼钢，用电办不到，可以土洋结合，炼出来再轧材，最后生产出机械设备。”之后又高兴地说：“这就叫做恨铁不成钢，恨钢不成材，恨材不成器。”

耀邦同志回到团中央后，还很关心大韩继铁厂。大约两个星期后，他又安排了苏联青年代表团来铁厂参观。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一二九”运动在良乡

赵思敬

发生在六十六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曾组织南下扩大宣传队。其中第三团先后在良乡、窦店、琉璃河等地宣传抗日救亡，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从《百年中国》电视片中首次得知，“一二九”运动最初的发起者是胡适。起因是：日寇占领东北、热

河后，又入侵察哈尔和冀东，进而逼进平津，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面对日寇的阴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也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写了一封信，劝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这一来激怒了胡适，便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随着“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在中共河北省委的特派员李常青和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彭涛、周小舟等同志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积极参与、领导了这场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粉碎南京政府玩弄提前放寒假和召集学生代表“晋京聆训”以瓦解学生运动的阴谋，在共产党领导下，平津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宣传团的四个团分别于1936年初出发，经过不同路线到河北固安集中。

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的行动路线是：由平西沿平汉路向西南行进，经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琉璃河，再东折固安。这个团的成员有燕京、清华两校的学生，出发时各校有男女生49人。另有没来得及赶上其他各团的学生一百余人。这些同学分别来自辅仁、中法大学、中法中学、朝阳学院、广安中学及市立一中。为了便于管理，组织者把这个团分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为清华大学学生，下设4个小队；第二大队为燕大学生和两个贝满中学，下设三个小队，加一个华光同学；第三大队为其余各校同学，下亦设三个小队。各大队有代表1人，三校的代表组成固定的总指挥部，决定团里的一切工作及行进的路线。但每个大队中另有大队长1人，负责大队内的事情。同时，各小队还有小队长1人。至于横向组织，在每个小队中设有宣传员：担任一切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组织员：担任组织群众的工作。此外，还有先遣员、调查员、交通员、看护员等。各小队的各部门合成总的各大队的宣传队、组织队等。同时，各大队之间的各队又组成了团的宣传队、组织队等。

第三团于193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在燕京大学贝公楼东边集合出发，先遣队骑自行车在前边开路，大队随后步行。10时到达蓝靛厂，与清华大队相汇合，直奔田庄，途中有许多新闻记者拍照。下午5时到达卢沟桥，行程40里，当晚在卢沟桥城外的简易师范学校，向该校师生报告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意义。

5日上午九时半，第三团离开卢沟桥，10时到达长辛店，1时经过长营（即今天的长阳镇），在那里稍事休息。5时抵达良乡，当晚住在了第一完全小学。该校校长和良乡民众教育馆的科长已经预先等在学校欢迎同学们，并对大家表示同情。于是，各大队分头上街，利用街头剧、发传单、演讲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当天，除联络了良乡第一完全小学，还与另一个女子完全小学，一个初级小学和一个简易师范的教职员取得联系，帮助这4所学校成立了一个由在职教员组成的“联合教育会”。6日早8时，第三团离开良乡，于10时到达窦店火车站。正巧，赶上有一辆从南开来的火车进站，队员们便登上火车，向车内的乘客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亡，还在火车车厢上贴了许多标语。11时，到达窦店镇。队员们仍然分头去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从张谷衣给邹韬奋的信中，我们可以得知，讲演一般分成四个步骤：“一、学生下乡宣传之意义及其目的；二、东北人民遭受亡国惨痛之现状；三、农民的苦状由于某国及准买办阶级之剥削与摧残；四、解决各种痛苦之途径及今后组织之方法。”宣传员们流露出来的沉痛的语句，悲哀的声调，都在每一个民众的心上留下永远不能忘却的印象。

在窦店镇的戏台，同学们演出了街头剧《打回老家去》，接着，便又开始对群众宣讲。值得庆幸的是，有人在肩背背包，手拿喇叭的同学身后，举起了照相机，为他们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见照片）。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听众至少有60多人，从仰起脸，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学生的表情中，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甚至是困惑的。靠近戏台的几个儿童，显然是没有弄懂这个大哥哥讲演的“伟大意义”。戏台不远处，好像是一个手工业作坊，那附近的三个人，也都向台上张望。看来，宣传是成功的，在以后到达宫村演出时，大家都说在窦店的演出是最好的。至于那个演讲的学生是谁，我们已不得而知。

在窦店吃过午饭，第三团便向琉璃河出发。下午4时到达古镇琉璃河。同学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个镇上的“老百姓都十分表示惊异的态度”。当天晚上，便住在了良乡第二完全小学，因为，琉璃河也属良乡辖区。

晚上,在校内召开了一个谈话会,仍向师生们报告北平学生运动真相,前来听讲的还有附近学校的教员。会后,帮助筹备了各校的救国会。还联络了琉璃河镇的邮政局长、公安局长和商会的个人团体,筹备了一个各界救国会。之后,又连夜召开了第二次全团会议。

7日早,燕大的教职员雷洁琼(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毕士礼、韩庆廉和郭嘉理4人,突然来到第二完全小学慰劳大家。他们带来了许多棉被和药品,教职员来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赶快回校,结果,只有一位同学跟他们回去了。这个说法,见于燕大《十二·九特刊》第10号。

雷洁琼一行为什么来到琉璃河慰问学生?《十二·九特刊》没有说清楚,但在1995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雷洁琼》一书中,却有比较详细的描写,为说明问题,现全录如下:

宣传团出发不久,北平发生了一起谣言。传说清华大学的纸篓里发现一个纸条,上面写的是“共产党将在固安暴动”。其实,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个阴谋,妄图以此谣言阻挠学生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燕大校长(胡适)听到谣言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人去追赶学生通知消息。派谁去呢?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学生中威信高的雷洁琼,还有一位是美籍教师毕文(Beren)和注册科科长韩景廉。当天晚上,外面飞飞扬扬下着鹅毛大雪,雷洁琼一行三人就冒着大风雪出发了。同学们究竟在哪里?他们沿着粤汉铁路线,一站一站地打听,到琉璃河车站,他们才知道学生的下落。这时,已是深夜,他们只好在车站附近一个小客栈里休息。雷洁琼急于见到学生,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北风刮得更大了,大雪还在飞,雷洁琼急切地和两位同事找到宣传团住的小学校。同学们突然看到三位老师顶风冒雪出现在面前,大家又惊又喜。雷洁琼紧紧地和同学们握手。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生活情况,健康情况。一股暖流把师生的心连结在一起了。雷洁琼向大家传达了学校的决定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中心意思是说他们在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很受群众欢迎,不能半途而废。雷洁琼看到青年们那股坚强意志和赤诚的爱国热情,从心里感到十分钦佩。她回到学校后说:同学们离开舒适的书斋,到贫困的山村,住在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吃着冰冷的大饼子和咸菜,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唤起农民大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怎能劝他们回来呢?

从上面两段文字看,有两点是出入的,一个是那位美籍教师的名字,一处记载为:毕士礼,一处记载为毕文,这可能是翻译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处便是《雷洁琼》一书中没有提到同去的学生郭嘉理。两处记载互为印证,使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史料。

7日上午,雷洁琼一行返回北平后,第三团全体队员便于10时出发,直奔码头镇。宣传一天后,于8日早9时离开码头镇,奔向固安,与其余各团会合。而后,各团又拟定了会师保定的宣传行进路线。第三团于9日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鉴于在良乡、琉璃河等地的宣传情况,燕大的同学提出质问关于《一二九打牙牌歌》和《打回老家去》剧本的修改问题,结果,被大会否决。导致内部发生分裂。造成第二天一早,即10日,一部分同学在所有同学尚未起床时便决然脱离大队出发,自行返回学校。

第三团其余同学于10日上午9时,离开固安,南到涿县、松林店等地宣传。到达高碑店时,已是13日,当地的公安局、小学校长都拒绝接见学生们。等大队到达后,学生们只好直接住进学校,下午饭后各小队又分别出发到附近小村宣传。不料下午3时,当地公安局长和北平派去的便衣队,还有当地的保卫团、警察,将学校大门封锁,并包围学校。然后持枪的便衣队入内强迫搜查各同学身上和所有物品,同时并有击打污辱同学的举动,所以一部分同学与他们发生冲突。在这个时候,外出宣传的同学相继回校,但被拒绝入校。同时还有十数名同学被扣留。正在混乱中,有自称为冀察委员会的委员三人,会同新城县县长前来训话,并要解散宣传团。相持结果,决定要求全团返回北平这个办法比较稳妥。于是,经过千辛万苦和英勇斗争,第三团全体队员才于14日从高碑店乘火车返回北平。

“一二九”运动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光辉的范例。它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指明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在良乡留下的这些事迹，无论如何都应载入房山的历史史册。

参考书目：

- | | |
|-------------------|-----------|
| 1、《一二九运动》 | 北京出版社 |
| 2、《北平抗日斗争史资料选集》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3、《雷洁琼》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 4、《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二辑)》 | 北京出版社 |
| 5、《中国现代史词典》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 6、《旧中国大博览》 | 科学普及出版社 |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房良两县过渡时期的党建工作

许冬梅

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保证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中共房、良两县委在农村开展了整顿基层组织，注重在“三大改造”中加强党的建设。

通过一系列整党与建党工作，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健全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两县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

整顿农村基层组织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决定在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195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从此，整党工作逐步展开。根据中共河北省委、通县专区地委指示，中共房、良两县委分别于1951年、1952年开始在农村进行全面整顿基层组织与建党工作，全部工作至1955年7月结束。两县委分别成立工作组，入乡指导帮助开展整顿工作。中共房、良两县委共抽调县、区党员干部815名，经过省、地委和县委训练，有计划分期分批投入了大规模的整党工作中，全部工作大体分为四个步骤。入乡后，首先通过宣传贯彻生产与整党的方针政策，稳定党员情绪。第二步，分头了解情况，检查生产、互助合作工作，解决互助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整党计划。支委确定专人领导生产和互助合作工作。第三步，紧密联系各支部实际问题向党员进行八项标准条件教育，提高觉悟，使其认识到农村基本任务是以互助合作为中心，搞好农业生产，才能有力地支持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四步，审查鉴定，细致处理，纯洁组织，支

部改选,建立制度。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中共房山县委共整顿农村支部109个,小组32个,其中,重整两次的有4个一类支部,51个二类支部;参加整党党员3250人,参加整党学习的党员2980人,占时有党员86%;全县农村达到或基本上达到整党要求的二、三类支部134个。中共良乡县委共整顿农村支部155个,占全县158个乡村支部的90%;参加整党党员1346名,占时有农村党员69%;全县农村达到或基本上达到整党要求的二、三类支部147个。

经过整党教育,取得了很大收获:首先纯洁了党的组织。中共房山县共有136人被清除出党,其中开除41人,劝出54人,退党28人,取消预备资格的13人,占整党村原有党员总数4%;受处分的89人,占整党村原有党员总数2.7%。中共良乡县共有120人被清除出党,其中,开除29人,劝退30人,取消预备资格的37人,退党16人,清除各种坏分子8人;受处分的81人。其次,使党员全面深入地受到了一次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党员的阶级觉悟均有显著提高。中共良乡县委对66个支部、577名党员调查,在整党前有202名党员工作消极,思想落后,经过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主动进行了检查,积极参加了工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挥了作用。据房山县10个村整党前统计,有长短期互助组88个,入组农户1100户,占总户数86.4%,入组党员243人,占党员总数87.7%;整党后,要求转社630户,党员193人,参加互助组农户550人,党员291人,组织起来农户占总农户98.6%,入社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7.8%。三是,建立健全了支部领导班子,增强了党的团结,改善了领导作风,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中共良乡县委在整顿的155个支部中,有90个支部进行了民主选举支委会,有29个支部进行了补选,经过选举和补选,有48名忠诚老实,积极工作的模范党员被选为支部委员或支书。中共房山县委共提拔281名新生力量充实进基层支部班子。四是,在健全支部领导建立各种制度的同时,对政权机构中非党人员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和调整,提高了政权领导作用,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五是增添了新鲜血液。整党期间,按照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和严格的入党手续吸收新党员,中共房山县委按质按量地接收了716名新党员;中共良乡县委接收495名新党员,并在农村7个关系村建立了小组,建立13个支部,全县183个行政村都有3名以上的党员。

在“三大改造”中建党

为了给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思想和组织保障,中共房、良两县委注重在“三大改造”中抓住有利时机在无党员或党的基础薄弱的社(组)中发展党员。其主要方法是:在日常工作中和较大的运动中,注意发现思想意识坚定、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的青年团员和技术人材骨干分子,及时登记,支委分工采取个别谈话,吸收他们旁听党课,交给他们工作任务,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等方法进行培养,并随时了解他们的历史问题,经过长期的培养和考验,真正具备了条件才能接收。如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至1955年底,中共房山县委在手工业者中共培养入党积极分子75名,发展新党员17名,全县手工业共有党员131名,占手工业者总数的4.3%;运输业共发展党员4名,占社组员的0.82%。良乡县在手工业中共发展党员50名,占手工业者的3.6%,运输业共有党员43名。到1956年底,手工业、运输业实现合作化后,房山县在手工业、运输业中发展新党员40名,良乡县发展新党员32名。壮大了党的队伍。

1956年8月,房、良两县农业实现合作化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根本的变化,原有的基层组织和区划已不能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河北省委、通县专区地委指示精神,结合房、良两县的具体情况,中共房、良两县委分别进行了并乡撤区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调整工作。房山县将原有70个乡(镇)合并为30个乡(镇),其中有2个乡级镇,按照党员数量和工作需要在组织形式上成立10个党委,20个党总支部;青年团的组织形式是成立团委10个,团总支20个;良乡县在原有46个乡(镇)的基础上合并为21个乡(镇),一个乡级镇。在组织形式上,成立一个镇党委,2个乡党委,18个乡总支部,52个分支部;团的组织形式

为1个镇团委会，5个乡团委会，14个团乡总支部，49个团分支部。

完成并乡和基层组织调整工作之后，中共房、良两县委根据9月2日河北省第四次组织会议提出的：“要求每个支部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战士”的要求，结合生产、整社等中心工作继续开展整党建党。两县对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了一至二次整顿。这次整党房、良两县共开除党员62人，自行退党9人，劝退17人，留党察看33人，受其他各种处分51人，取消预备资格20人，发展新党员641人，完成全年计划的95.95%。

房、良两县党的基层组织，经过适时整顿，以及在各个运动中对广大党员的教育和实际考验，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均有了很大进步，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了，纠正了某些党员中“生产不用领导”以及“半截革命论”等错误思想倾向。农村支部有了较明确分工，能主动地坚持集体讨论工作制度，有正常的领导秩序，对其他工作也能做到有计划地安排，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房、良两县党的组织建设得到健康发展。到1956年底，房山县有党员5250名，其中有正式党员4862名，预备党员388名，党员总数比1953年的4608名增加642名；全县有基层党委21个，其中农林部门有党委20个，党群机关有党委1个；有党总支10个，支部184个，其中企业部门有支部5个，交通运输部门有支部1个，农林部门有支部158个，商业部门有支部9个，金融部门有支部1个，学校有支部2个，党群机关有支部7个，其他有支部1个。良乡县有党员3277名，其中有正式党员2524名，预备党员753名，党员总数比1953年11月底的1808名增加1469名；全县有党委3个(农业部门)；党总支19个，支部110个。其中，工业部门有党总支1个，支部10个，农业部门有党总支18个，支部60个，交通运输部门有支部6个，商业部门有支部20个，文化教育部门有支部3个，金融部门有支部2个，机关有支部8个，其它支部有1个。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回顾原良乡县一区的工作

罗玉源

我于1951年1月至1954年7月在良乡一区工作。良乡一区是原良乡县在1951年由七个区合并为四个区中的一个较大的区，合并前为城厢区，地址就在现在的功德福饭庄。当时一区区委书记、副书记三人，我任书记，王树瑞、刘茂兰任副书记，组织委员由书记兼，组织干事支士修，宣传委员由陈林森、申克巨担任。行政方面刘增勤任区长，李明任副区长，1952年以后朱树奎任区长。民政委员董明清，教育委员程占元，办公室有陈照远还兼司法委员，秘书张月波，文书温隐雷，公安员赵洪才，武装部长邱广学，团委书记韩萝廷，妇联正副主任是姜希文、刘连云。区委和行政各部门共二十多名干部。

一区有几个特点：

一是区域较大。东至小清河，西至大董村，南至十三里，北至长阳，包括现在的官道乡和良乡、长阳、闫村三个镇的一部分，共有七十多个行政村。占全县村户的三分之一以上。

二是任务繁重。当时还没有镇的设置，一区包括良乡城内，五街四关从事工商业的非农业人员较多，区

委既要重点抓好农村工作,同时还要抓好城镇工商等城镇工作,解放初期对城镇工作还不熟悉需要从头学起。

三是妇女干部较多。又多是县领导干部家属,如副书记刘茂兰是县委书记霍梁同志的爱人,妇联主任姜希文是县长闫振峰同志的爱人,妇联委员刘连云也是县领导张令德同志爱人(张令德同志开始为县社主任,并任县长,县委书记)其余几名妇女干部也都是家居城内的同志。尽管这些女同志都很自觉自强,我们区委也教育大家正确对待女同志的特点,在工作上、生活上尽量给以照顾,但毕竟女同志由于家庭、孩子、身体等方面情况不同,下乡不能太远,时间不能长,不能跟男同志一样要求,这也是与其他区不同的地方。

四是压力大。当时全区二十多名干部都是青壮年,争强好胜。在工作上谁也不甘心落后,区所在地又处在县委、县府领导机关的眼皮底下,好事坏事,有点动静上级领导很快便知,有时甚至知道的在我们前头,因此我们不论是精神上,工作上都有一定的压力。我们把压力变为动力,我们把与领导见面机会多,与县委各部委办打交道多的机会,多沟通情况,勤汇报,勤请示,勤交换意见,使好的经验得以较快推广,使问题得以较快解决。因此我们一区的各项工作一直是比较主动,基层先进典型较多,得到县委的重视和肯定。

解放初期良乡一区的干部,仍然坚持和发扬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开始全区只配备一辆自行车,供交通员取递文件、通知使用,其余干部都是带行李步行下乡。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吃派饭,每次交半斤粮票两角钱,没有节假日,一下去就是两三个月,除了有孩子的女同志给以照顾外,其余平时谁也不能随便回机关更不能随便回家。虽然当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差,但大家团结奋斗干劲足,情绪高,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认真学习,信念坚定,进取心强。不论城里还是农村工作组,都是白天同群众一起劳动,开会一律在晚上,不得占用生产时间,领导和一般同志,干部和群众,作到了团结一致心连心。

从1952年开始,干部分批分期由供给制改为低工资制,供给制每人一个月一百多斤小米,折成人民币不过二十多元,改为工资制后比供给制要多得一些,这时县委分配给我们一区一个指标,并提议先给我转。当时我是区委书记,我就把这一指标让给了生活更加困难的民政委员董明清了。解放初期广大农村干部生活均比较困难,正如有些不脱产的农村干部讲:“你们区县干部是供给制,而我们农村干部是义务制,饿了得回家去吃。”确实农村干部是很艰苦的,因此我们区委要求下乡干部把关心农村干部疾苦,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抓好。1952年将要过春节时,我和副书记王树瑞到良乡城内西门里的集贸市场去察看情况。当我们看到南上岗村支部书记邢玉堂正在出卖自己家里应用的东西准备过年时,我们触动很大,心里发热,立即回到区里与有关同志研究决定批给了这位支部书记困难补助费。随后,叫通讯员直接送到他的家里,使他过了个好春节,全家人都深深感谢党和政府。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虽不像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但抓生产搞合作化,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一个,工作生活都很紧张,特别是领导干部就更加紧张。王树瑞、王祝华二同志结婚的情形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情况下举办的。那是在一区干部回区集中汇报总结工作的时候,当天晚上工作告一段落大家才喘了一口气。当时,王树瑞正和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王祝华考虑何时结婚,王树瑞考虑会后马上又要下乡,再回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就叫其他同志打电话,把王祝华请到区里来。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请区里行政秘书张月波帮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没有新房,没有请客送礼,真是又简单又朴素,就举办了婚礼。现在听起来,很难令人相信,但这确是真的历史事实。

在工作方面,考虑到全区区域大、村数多的特点,我们把全区七十多个村划为四个大片;东南片就是现在的官道乡范围,十四个行政村为一片,中心集中点设在那家坞村;西南片即现在的闫村镇所属范围,中心集中点设立在大董村;中心片即县城内和城外较近村庄,中心集中点设在区机关;东北即北片,中心集中点设在广阳城。这样,采取了区委分工包片,抓点带面,一般问题在片上就解决了,解决不了的较重大的问题待区委碰头会研究解决,还解决不了再请示县委。工作组下乡实行“下去一把抓,回头再分家”。区里集中汇报时各部

都要听汇报，并请县有关部门和领导来听。这样好的经验能得到及时推广，问题也可得到及时解决。

全区的日常工作，除遵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如历次政治运动等，积极认真抓好外，我们全区重点抓了以基层支部为中心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抓了农业生产和教育组织农民发展互助合作，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艰苦细致工作，各村的党支部、团支部、妇联、民兵武装、公安治保等都先后建立健全起来，并且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按照县委的要求，我们区委委员首先学好文件，搞好调查，联系实际，集体备课，然后分片再分期分批首先培训支部书记。之后是支委和各部门干部，党员都轮训一遍。通过学习培训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这对加强和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教育，学习和培训，广大农村掀起了党员、干部带头宣传，带头组织和参加互助合作的热潮，各村普遍建起了临时性、季节性和常年的互助组，先进一些的已办起了以土地股参加分配为特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当时叫作半社会主义性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区出现了一批生产劳动模范和走合作化道路的骨干，如小紫草坞高建国，炒米店柏维祥，肖庄李淑兰、张早，小营白房子曲祥申，梨村左有权，于管营田思勤，东羊庄刘宽、闫海荣，吴店刘金安，鲁村安玉平，南关赵宝珍，纸房叶永权，水碾屯李凯，南广阳城刘德奎，小西庄柏凯，常庄洪玉桥、胡广金，石羊王中、柏泽等等。后来大多数都成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或生产劳模。对推动全区工作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1954年7月我被调到了中共良乡县农村工作部，从此集中精力主抓全县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房良抗日后方工作记略

杨济之

1940年5月，中共平西区党委组织部长张明远同志同我谈话，调我到房、良联合县工作，任中共房良联合县县委书记。他说，房山是半山区半平原，良乡是平原，要大力开展平原地区的工作。那里是产粮区，平西主力部队的粮食供应，今后要靠平原区。平原区人口多，兵源也充足，也要动员平原青壮年参军。我按着张明远同志的指示精神，去房良工作。当时县委书记是赵然同志，区党委决定赵然改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柳特同志仍任宣传部长。

县委认真研讨了上级的指示，要大力开展平原地区的工作，并要我多负责平原地区的工作。县委决定：县委机关、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由山区马安村搬到瓦沟、南流河一带村庄。这里地处山区和平原的交界处，便于开展平原地区的工作。县委调遣了几名山区青年干部到张坊、惠南庄、前后石门等地区工作。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群众运动中注意物色当地青年干部以备提拔。时值青纱帐季节，便于开展平原地区的工作。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工作。在大规模的群众工作中办积极分子学习班，从中发展党员。党的基层组织也得到健全。

群众团体组织扩大了，人民载歌载舞，开展了征运抗日救国公粮和参军活动。妇女为部队做军鞋、缝洗衣服，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中军民团结一致，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伪军慑于群众的威力，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肆意活动。我和当地党政干部一道，进出游击区、敌占区，和他们一同工作。

上层人士也发动起来了，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周硕臣先生。他是房山惠南庄村人，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富有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在房山县上层有崇高威望。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6月，周先生被选为县议会副议长(议长由赵然同志兼任)，他工作积极热情，对房山平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群众工作的顺利进行，周硕臣先生是有功绩的。

当时动员敌占区、游击区人民交纳运输救国公粮，大都是夜间进行。人民担挑，驴、马驮运到山区，顺利地完成了救国公粮工作。当时平西部队缺乏医药和电讯器材，周先生动员他的子女及亲属设法到北平去购买。

惠南庄、南尚乐一带是北平通往晋察冀边区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秘密交通线路。周先生的家是通往根据地的一个联络点、转运站。他的家庭是革命家庭，晋察冀北方分局的一些家属如姚依林同志的夫人周彬就是周硕臣的长子周景岩到北平亲自将她接到平西根据地后方边区的。大批由北平进入根据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大都经过这里进入根据地。这一带是游击区，离伪军据点长沟镇很近，但抗日工作未受到阻挠，各项工作照常进行。

1986年，在房山县南尚乐乡为周硕臣先生树立了纪念碑，并于当年7月10日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怀念这位英雄人物。广大群众赞扬他是我党的忠诚朋友，人民的忠诚战士。我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深切怀念这位在艰苦的岁月中与我们同呼吸共患难的挚友。

开展对伪军的政治工作，也是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驻长沟镇的伪军头目是孔宪江，经县委研究，对伪军开展工作，由县长刘介愚负责。县委决定，要刘介愚与孔宪江进行秘密会谈，刘只身经过单线关系在长沟镇坟庄村同孔单独会谈。我方提出，伪军不得干涉我在敌占区、游击区对公粮的征运和扩军工作，不得干预我同敌占区的人员来往……在我强大的部队为后盾和人民高昂的抗战声中，孔宪江答应了我方的条件，从此伪军很少到游击区来。1940年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并在塔照村建立了据点，房山平原地区工作损失较少，这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上述事情记忆犹新。我怀念这些地区的人民和我共同患难的战友，对已故的战友我深切怀念，对健在的战友祝他们长寿。我祝愿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原名杨流萤，曾任抗战时期房涿涿联合县县委书记，国家技术监督局离休干部

粉碎日寇三路进攻的经过

张成基

1939年5月3日至16日，日寇两千余名，分三路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此次进攻平西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因为平西不仅是冀热察宁边区的后方，同时又是阻止日寇南下进犯晋察冀边区，保卫与扩大军区坚强固的屏障。

因此日寇对平西这块贫瘠的又是心腹之患的根据地，日夜在用尽一切阴谋，派遣收买大批汉奸特务混进

平西，侦察我军行动。此次敌分三路来犯，我早有周密准备，故仅在半月时间，经我军及基干游击队和以村组织的模范自卫队猛予痛击，使日寇溃不成军而退。

日寇分三路进攻被我击溃的经过

第一路日寇是从宛平县的燕翅出发，向清白口、斋堂一带进攻，沿路对军响、东胡林、西胡林、马兰等村烧杀抢掳，烧房最多，就连斋堂人们重建起的一百四十多间房屋，又全部烧掉。但由于群众实行了坚壁清野，粮物损失较小。我基干游击队及模范自卫队英勇配合主力军作战，猛予阻击与不断袭扰，使日寇不敢久驻，三天后撤回清白口。我军立即跟踪追击，敌溃窜回燕翅据点，不敢再出。

第二路日寇是由房山县城出发，进攻南窖、上下石堡、房山九区。敌以猛烈的炮火与我激战数日，在庄户台受我伏击，伤亡甚重。石堡被我收复，我并在南窖与石堡间的大南山，调基干游击队埋伏，毙伤敌二十余名，缴获胜利品甚多。敌在溃退时，沿途烧毁村庄十五个之多，并奸淫妇女无数。经我基干游击队追击，敌退至南窖构筑据点，与我顽抗。南窖为产煤之区，敌为掩护高线公司开工运煤，死不退出，我军对敌继续包围和袭扰。

第三路日寇是由宣涿怀联合县、大庙，进犯河北村，直趋大龙门、野三坡。经我三十三大队与敌在河北、赵家庄间来回冲杀数次，激战两昼夜，击毙敌兵三十余名，军官四名，内有陆军少尉一名。敌遭惨败，向矾山方向逃窜，在石门子构筑据点，要与我长期对抗。

以上三路之敌，虽均被我击溃，然敌在此次进攻平西与前显有不同。敌此次进攻到处构筑据点，分明有作为将来进攻的准备，我们估计到，敌人是给长期侵犯打基础。

击退敌人三路进攻的经验教训

敌人以二千余人的兵力向我平西进犯，假若仅靠主力军作战，是不能在半月之内将其击溃的。平西基干游击队与模范自卫队，积极与主力军配合作战。尤其是宛平与房山的基干游击队与模范自卫队，在接近敌区的地方，曾多次深入敌区袭击敌人和扰乱敌人，并捉到了几个军事汉奸及一个汉奸头目。

在群众动员上，各县都组织了群众侦察队、运输队、担架队。宣涿怀联合县做得最好，几乎大部分群众都参加了担架运输队等工作。

在这次击败敌人进攻中，坚壁清野工作做得不十分好，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做得过早，妨碍了自己；一种做得不够，如大安山一带的粮食被敌人抢走了一部分。

在击败敌人之后，平西地区都以村、区、县的形式举行了不同规模的庆祝大会。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大安山人民革命斗争片段

任成利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发动猖狂进攻，并对抗日军民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1938年至1939年期间，仅大安山地区就遭日伪三次进攻，大安山村80%的房屋被烧毁，先后有三十多人惨遭杀害，牲畜、粮食被抢劫一空。元港村、中山村、宝地洼村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一

1940年10月，日军在大安山设了据点，由一个日本警备队和房山孔宪江部三个中队的伪军驻守。他们强迫老百姓先后在大安山的村东、村西、村北、南坡、街中心南庵修了五个岗楼。后来又在离村五里路的南沓晃口和宝地洼村修了岗楼，并且架设了电话线。

紧接着，他们又在此地建立了伪政权组织。主要有：大编乡（乡长张成典）、维持会（会长张清海）、警察所（警长弥宗周）、联保处（主任杨德堂）。伪保甲组织遍布各村。

1944年初，他们还建立了伪地方武装自卫团，团长由张成典兼任。该组织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带日伪军到各村进行烧杀抢掠，并抓捕抗日干部。

此时的大安山，到处是日本法西斯恐怖统治，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

这时，我方抗日活动已经安全转入地下。宛平二区区委干部（后任区委副书记）杨怀清、区公安员于振边等同志积极领导人民抗日。他们每天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他们组织民兵摸岗哨、埋地雷、破坏电话线、散发抗日宣传材料。

西苑村民兵数次到大安山村西摸敌人的岗哨，抓获哨兵一名，缴获步枪两支，子弹五十余发。

1939年，有一次日本鬼子进攻大安山，还没有进村，就遭到了我三十四大队和本地民兵的沉重打击。消灭敌人五人、俘虏四人、缴获步枪十来支、子弹二百余发。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一位英勇的连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1年夏天，敌警长往家送老婆，由四名伪警察护送。我方接到情报后，立即派民兵半路堵截，在距大安山村八里路的峪湖设下了埋伏。警长的老婆骑着毛驴，警长跟在后面，四名警察前后保镖。当他们进入埋伏圈时，一声高喊“缴枪不杀”，吓得敌人全都举手投了降。不费一枪一弹，缴获步枪四支，手枪一支，子弹百余发。五名俘虏接受了我方的教育，表示以后不再为鬼子效忠。我方给他们布置了任务，最后把他们释放了。

三

敌人屡屡受挫，气急败坏。杨怀清、于振边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贴出布告，悬赏五百大洋

进行抓捕。

敌人抓住了于振边的父亲，威逼老人找回于振边。老人找到了儿子，还没把话说完，就被儿子训了一顿。于振边对父亲说：“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于振边至死也不会投降！”

敌人还对杨怀清家进行多次包围、清剿。把他家的东西全部抢走，并把他七岁的儿子杨文国抓到伪警察所，威吓他说出父亲的下落。小文国只是哭，什么也不说。敌人气急了，伪警察王振国抱起小文国就要往井里扔，并恶狠狠地说：“你不说，老子就让杨怀清断子绝孙！”这时，另一个警察拦住说：“慢着！别扔！他要是死了，还怎么抓杨怀清啊！”

1943年4月，因特务告密，元港村民兵队长肖仕儒和他的母亲被敌人抓到大安山伪警察所。对母子二人严刑拷打，让他们说出杨怀清、于振边的下落，肖仕儒宁死不屈。凶残的敌人用铁钉把肖仕儒活活钉死在门板上，然后放到大街上示众，直到尸体发臭了才让家属取走。西苑村村长王喜怀也是被敌人用这种方式杀害的。

1943年9月的一天夜里，敌人包围了元港村，村长安守邦和弟弟安守相等十余人被捕。敌人把他们用一根绳子连绑在一起押送到大安山伪警察所。经过严刑审讯后，将安守邦、安守相和群众谭发才杀害。

四

敌人的屠刀吓不倒革命者，血债只能用血来偿还。

1943年春，杨怀清、于振边等在西苑村召开会议，决定处决铁杆汉奸张清海，以此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们先派民兵张奎元打探好张清海的住处，然后把任务交给了王荣英和赵广地。两位民兵找来了两把杀猪刀，连夜奔大安山去了。他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摸到了张清海的住处。王荣英蹬着赵广地的肩膀翻墙而入。二人一同摸到张清海的卧室，踢开屋门，进去就是一痛乱扎，张清海还没清醒过来就一命归天了。等二人跑出村外，王荣英才感觉出右臂疼痛，用手一摸，鲜血把衣服都染红了，这才知道是在黑暗中被战友赵广地误伤。敌人发觉后，紧急集合进行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第二天天一亮，敌人发现了血迹，他们顺着血迹的方向从大北河一直跟到元港村。敌人将元港村的老百姓抓来几十人进行逼供，让他们说出杀张清海的人。逼了大半天，毫无结果，只好把他们放了，收兵回大安山据点去了。

五

1944年3月，宛平县公安局科长王再田、二区武装大队长杜凤鸣带领手枪队十余人来大安山开展工作。

有一天，他们接到情报，说伪军团长尤茂志三月六日要来大安山。王再田、杜凤鸣、于振边等召开紧急会议，经研究决定活捉尤茂志。

6日这天，手枪队和民兵二十余人来到黑龙关进行堵截，将参战人员布置在村东头戏楼附近。半个小时过后，尤茂志和警卫员骑自行车上来了。当他们来到埋伏圈时，我方一声令下：“捉活的！”同时向尤开了一枪。谁知子弹是一颗臭子儿，倒让尤向我们反开了一枪，击中了赵金山同志。尤茂志和警卫员乘我们抢救伤员之机丢了两辆自行车和一支手枪逃跑了。手枪队和民兵们抬着伤员向北峪方向撤去，但是在途中，赵金山同志牺牲了。因为一发臭子弹，我们不但失去了一位战友，而且失去了一次良好的战机。

掩埋好战友，同志们继续向中山方向前进。天黑时，来到中山村的水峪。找到中山村民兵队长杨兴广，让他派了岗哨，然后就在这里住下了。

谁知，杨兴广早已叛变。深夜，杨撤走了岗哨，亲自写了情报并派民兵张世毛送到东坡张志太手中，张

马上把情报送到大安山伪警察所。敌人接到情报后,由自卫团成员王永年带路,日本鬼子,伪军和自卫团全部出动,绕道从甲湖沟到水峪后山,再向水峪包围。

天快亮时,我方发觉已被包围了,便立即集合向北沟方向突围。然而所有的道路全被封锁,敌人据高临下,机枪、步枪一齐向我开火。

在战斗中,于振边同志倒下了。他忍着伤痛,把身上的文件全部撕碎、吞进肚里,把缴获尤茂志的手枪摔坏,把自己心爱的手枪塞到石缝里。

这时,自卫团成员杨国栋冲上来,他看到受了伤的于振边恶狠狠地抽出刺刀向于振边连刺数刀。英雄于振边同志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们情同手足的战友,离开了他为之献身的解放事业。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在这次事件中,手枪队战士李万怀、杨国臣和中山村群众张小乐都牺牲了。杜凤鸣同志身上十九处都受了伤,后来被水峪村群众董凤福冒着生命危险背回村里藏起来养伤。民兵许广亮、王凤稳、赵成伯也都负了伤。手枪队战士刘九峰、民兵王国旺被俘。

中山惨案是敌人在大安山的最后一次疯狂挣扎。敌人的屠刀并没有让大安山人民屈服,他们擦干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拿起刀枪又冲上了抗日的前线。在我军的严厉打击下,1944年3月14日,日本鬼子从大安山撤走。大安山人民的抗日斗争最后以胜利告终。还可以告慰烈士英灵的是,叛徒杨兴广也于1947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

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愿以此文祭奠英灵。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霞云岭地区抗日斗争概述

栗景鸿

霞云岭地区位于房山西部,处太行山北段支脉即大房山西部深山区。全区面积220平方公里,是大石河发源地。境内群山起伏,沟谷纵横,地形险要复杂。抗日战争时期是通往我晋察冀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至1938年9月,霞云岭地区为原房山五、九区管辖:银水、下石堡、大草岭属南窖五区;从凉水泉往上,霞云岭村、三流水、石板台、王家台、庄户台、龙门台、四马台、堂上八大村属霞云岭九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野蛮入侵,迫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反抗。房良两县兴起各种地方武装,多属保土安民的自卫性质。1937年9月,旧区政府在南窖村召开五、九两区联防大会,成立联防机构,建立了分别以五区南窖村罗荣、长操村李德芳和九区王家台村杨万芳为团长的三个自卫团。会上决定,每个村出两个人,两条枪,有情况时集中在一起,统一调动。

1937年11月7日,霞云岭附近的堂上、四马台、下石堡、霞云岭等八个村的村长、副村长在庄户台村大庙聚会,决定扩大地方武装,建立自卫团。团长杨天沛、副团长李甫荣、参谋长杨万芳、安济云。自卫团下设三个营,百余人。一营营长宿有宝、二营营长李春文、三营营长罗宗奎。自卫团计有步枪七十支、手枪两支,还有一部分土枪土炮。

1937年12月，自卫团逐步扩大编制，成立了房山九区联庄会，司令安济云。到1938年春，联庄会发展到200多人。联庄会由于被杨天沛、杨万芳等坏人把持，后来公开与八路军作对，在1938年11月，被八路军邓华支队击溃。

1937年冬，安济云率联庄会驻防王八岭，以防活动在长沟、涿县、张坊一带的一、二路土匪侵扰。

1938年春，二路土匪头子白秀亭派副官邢德章与在六渡驻防的安济云秘密联系，提出合作。1938年5月，九区自卫团与其它五路土匪头子在西域寺召开联合大会。会上，推选安济云为各路土匪、自卫团司令。霞云岭九区自卫团排为六路，安济云兼六路司令，团长杨万芳、杨天沛任参谋长。各路土匪虽都打着抗日保民的旗号，但很少与日军交战。他们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到处打家劫舍，成为各霸一方的扰民害民的地方组织。

1938年3月，我八路军邓华、宋时轮支队来到平西，先后组建了昌宛、宣涿怀和房涿涿三个联合县政府。

1938年5月，在长操建立房、良联合县政府，县长杜伯华。房、良联合县政府在八路军邓、宋支队的配合下，积极开展创立根据地的工作。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团结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在原房山四、五区很快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在此基础上，房、良联合县政府决定开辟霞云岭九区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派王友梧等县区干部经常到霞云岭一带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群众。一方面，与杨天沛、安济云、杨万芳等人进行了几次谈判。主要内容是：一、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二、九区由房、良联合县政府统一领导，三、部队整编问题。最后形成协议，九区同意联合抗日；同意八路军来往路过九区地界，但不能驻守；不同意统一改编，不受政府调动。杨天沛、杨万芳等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敌意，认为八路军早晚要下他们的枪。所以明里和八路军联合，暗里积极与其他几路土匪勾结，妄想将我八路军和县政府消灭，实现独霸九区进而侵吞五区的野心。秘密地请求二路土匪邢德章和殷昆带土匪进驻霞云岭地区待命。

1938年7月，紫石口董凤海部叛变。叛匪逃到霞云岭，引起杨天沛等人的恐慌。这时邓、宋支队已开赴冀东，平西力量相对减弱，又加上日军要扫荡平西，同时，晋察冀军区派独立师二团一个营和分区特务营为处理五支队司令赵同叛变一事，要路经霞云岭地区，给杨天沛等土匪作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8月8日晚，八路军三个连分驻霞云岭、堂上、王家台三村，准备第二天直奔宛平斋堂。杨天沛立即勾结邢德章分两路对我八路军偷袭。一路由邢德章偷袭霞云岭村的八路军，因我军发现较早，及时撤出，未受损伤。另一路由杨万芳带领，偷袭驻王家台八路军一个连和一个营部(约一百五、六十人)。由于我军未做提防，又处于不利地位，几次突围均未成功。除少数八路军战士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在战斗中牺牲。这就是王家台惨案。

王家台惨案后，房良联合县政府暂时转移到山西。霞云岭地区被杨天沛、杨万芳等土匪把持。杨天沛与驻河南据点的日伪军勾结，不仅吞并了一路土匪的一部分，还将二路土匪头子邢德章杀死。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小九区，真敢干，打不了八路请老便，打了八路打老便”，可见杨天沛等土匪的本性。

1938年8月，杨天沛又进驻下石堡村，将下石堡、银水、大草岭划为九区管辖。

1938年10月，八路军邓、宋支队返回平西，开始恢复根据地工作，重新成立房良县政府。11月，邓、宋支队有三十一大队在庄户台一带与九区民团激战，将其击溃，活捉了杨天沛、杨万芳、罗宗奎等人，本应严惩，但县长杜伯华认为可以争取他们抗日，只对杨天沛罚款6000元，对杨万芳罚款5000元，便放了他们。

九区打开后，为了根除后患，县政府决定收缴散在民间的枪支。成立了收枪委员会，委员会由县工委书记郭强负责。经过一段工作，计收缴步枪400余支，手枪10余支，机枪10余挺。

邓、宋支队在消灭了旧九区反动武装后，房良抗日根据地又向西扩大，霞云岭地区列为房良联合县政府一、六区。以后合并为房良县政府一区(包括现蒲洼乡)，区公所地址在庄户台村。

1938年11月，我房良联合县政府迁回下石堡村。12月，召开一区各村村长会，县长杜伯华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县政府的抗日工作。会后，印发了《告九区同胞书》，由各村长带回村里，向群众宣传。

《同胞书》的大致内容是：一、九区同胞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日本侵略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二、动员九区同胞回家来，对王家台惨案的参加者只要放下武器，不再做恶，政府不追究任何责任；三、存有武器的村民，包括参加过“六路”土匪的，只要把武器交给政府，政府欢迎，并保证其安全；四、存有武器不交者，查出后必严惩；五、对收缴武器工作开展得好的村、干部或群众，政府给予奖励和表扬。《告九区同胞书》发出后，得到各村群众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县政府组织起县游击大队。又做发展党员工作。霞云岭地区建立党组织最早的村是上石堡村，也是房山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她是由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赵然和上石堡村共产党员于进深建立的。1938年6月，经县委批准，正式成立上石堡村党支部，支部书记于进深，支部委员谢景和王水。

之后，四马台、庄户台、龙门台等村都先后发展了共产党员。霞云岭地区第一个党员是由县工委书记郭强发展的李兴通。

至1938年底，霞云岭地区抗日工作又活跃起来，各村相继成立了救国会、抗联会，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9年4月底，日伪军集结兵力2000余人，分三路进犯平西抗日根据地。敌人的第二路由房山县城出发，经南窖、下石堡、上石堡，进扰霞云岭一区根据地。我八路军主力和霞云岭地区的抗日基干队、模范队共同作战。广大群众也纷纷行动，组成了侦察队、运输队和担架队，配合我军行动。为前线送情报、运物资、抬伤员。4月23日，日伪军分两路，直扑房良县政府所在地下石堡。我县大队和三十一大队二营奋勇阻击。为保存实力，县长刘介愚一方面指挥作战，一方面指挥群众转移，最后撤出下石堡。第二天，日伪军又分兵两路，分别沿北直河和大石河方向进犯，妄图一举消灭我八路军。我三十一大队二营和县大队采取避实就虚的打法，在庄户台村设下埋伏，日伪军遭到伏击后，伤亡惨重。击毙日军20余名，缴获一些枪支弹药。随后我军主力乘胜收复上石堡、下石堡村。敌人在溃退中，沿路烧杀抢掠，计烧毁村庄15个。最后，敌人退到南窖，建立据点。敌人的春季“扫荡”已基本被我军民粉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1940年秋，日军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向我平西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在房良地区，日军仍分兵三路。10月12日，从河南、南窖出发的敌人21日在霞云岭汇合，进驻庄户台、龙门台，22日往西在东村与从石亭出发的敌人汇合后，到涑水县三坡侵扰了三天后撤回。在敌人“扫荡”之前，我主力部队早已转移。

日伪军秋季“扫荡”后，八路军主力部队由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主力部队调到抗日前线。霞云岭一区是根据地，军事力量相对减弱。一区群众情绪低落，悲观失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县委决定由一区中心向东西两面恢复区村政府、组织武装、重新整顿游击小组，由区委直接参加领导石堡到霞云岭一带警戒工作、群众工作、党的工作。

1940年11月初，土匪杨天沛、罗宗奎见与八路军公开对抗时机已到，便与驻南窖伪军头子程子良勾结，密谋偷袭一区公所庄户台村。我上石堡村支部书记于进深曾派人送信未能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

11月13日凌晨，匪首杨天沛、罗宗奎带土匪和日伪军包围了庄户台区公所。拂晓，敌人在叛徒郑玉梅(村长)内应下，发起攻击。我工作人员仓促应战，因众寡悬殊，区长王英武、区干部景一民等七人被捕。突围中，又有四人被捕，其中六人被押往霞云岭，均遭杀害。这就是“庄户台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杨天沛、罗宗奎召集各村村长、村副及地痞流氓、叛徒在霞云岭开会，由杨天沛公开宣布叛变投敌。

从庄户台事变开始，一区又连续发生了堂上事变(15日)、黑牛水事变(17日)、宝水、龙门台事变。在这一连串事变中，我县区干部共被捕46人，牺牲21人，一区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1940年12月13日，为严惩叛乱分子，我挺进军九团二营于拂晓前包围了叛匪驻地三角城，经两小时

激战，彻底打垮了叛匪，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1941年春，区委书记晋跃臣着手恢复一区工作，逐村进行建党建政工作。到1942年，各村均已建党。到1943年，霞云岭地区已发展党员183名。到1945年已达345名，其中女党员37名。四马台村刘兰凤，1939年7月入党，为霞云岭地区第一个女党员。同时，村政权经过整顿，都掌握在党的手中。

从1941年3月开始，日军开始大规模疯狂地进攻我霞云岭地区等根据地，我根据地暂时缩小。1941年6月14日，房良、涞涿两县合并为房涞涿联合县，县委书记杨流莹，县长王天瑞。联合县下辖九个区，霞云岭地区归属九区，区委书记晋跃臣，区长刘天利。

1942年，日军制定“经济封锁”政策，给霞云岭地区军民带来严重困难。为度过难关，保证抗战军需物资的供应和转递，霞云岭地区建立了“抗勤转运栈”，每三十里左右设一转运栈，整体上形成转运网。贾峪口、霞云岭、龙门台、堂上都是重要的转运栈。各栈设栈长一至二人，负责调运工作。各村设抗勤委员，服从转运栈的调运命令，保证各种军需物资的及时送运。

在转送工作中，主要运送兵工厂所需煤炭。从史家营地区莲花庵到堂上、东村、芦子水形成了一条“大煤运输栈”。从1942年到1943年，每年平均运送煤炭1500吨到2000吨。同时，霞云岭地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与日伪军展开了游击战。还开展了村政权的选举活动，对旧政权进行了改造。霞云岭地区应参加选举的3642人中，有2650人参加了选举。选出了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8年开始，霞云岭地区人民不断得到锻炼，地方武装一步步成长壮大。上石堡民兵连就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民兵连队。队长隗和宽带领民兵连几十人，多次阻击进犯之敌。1943年秋，隗和宽带领民兵摸进敌据点，活捉了伪军大队长程子良。上石堡村曾被评为“抗日模范村”，隗合宽被评为威震敌胆的民兵英雄。

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根据地内部还展开了除奸工作，组成了“除奸打狗队”，坚决铲除那些死心踏地为敌人服务的汉奸。也曾涌现出了一批除奸英雄，如隗合宽、任显本、于兴存等。

随着抗战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1944年3月底，霞云岭地区从原房涞涿九区划归昌宛房九区。

1944年10月，撤消房涞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设置房山县、涿县和宛平县。霞云岭地区归属房山县一区管辖，区委书记芮敏，区长韩晓瑞。

1945年3月，房山县委县政府在十渡召开扩大会议，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参加，研究如何进一步拔掉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会后，县政府从十渡迁到霞云岭。霞云岭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房山县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心，在房山的抗战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 1、由郑宗雄等同志提供的有关资料
- 2、《房山革命史》、《房山人民革命斗争史》
- 3、《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房山区组织史料》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抗日前哨下石堡村

卓成栋

霞云岭地区的下石堡村，在抗日战争期间有着光荣的抗日斗争历史，有“抗日前哨”之称。

1938年，新任九区区长庄敬山带着区政府宣传队来到了下石堡村。在村内开展了各种抗日的宣传活动。贴标语、举办日军侵华罪行展览、召开声讨大会。在村干部郑荣深、邢德昆、赵峰、赵之林，陈三泰等人的带领下把全村的抗日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成立了儿童团，陈希亭任第一任儿童团长。同年5月区政府接管了九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10月30日，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一个营进驻下石堡，先后和土匪杨天沛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8年11月土匪被邓华三十一大队击溃，土匪头子杨万芳被活捉。

此后，下石堡地区的抗日形势逐渐趋于正常，1938年11月政府办公地迁移到下石堡村，办公地点设在郑宗雄家的院里，政府下设财政、民政、实业、教育四科，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同年11月由杜伯华县长召开了九区抗日工作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并向全县发出了《告九区同胞书》，大大激发了村民们的抗日热情。当时在毗邻下石堡村的上石堡村成立了九区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为上石堡村的于进深担任。当时，下石堡村被列为这个支部下辖的一个党小组，由四名党员组成。

1939年初，数千名日伪军，兵分三路向抗日根据地扫荡。其中第二路扫荡日军，由房山出发首先占领了南窖。然后又从南窖翻过山岭直扑当时房良地区的县政府所在地——下石堡村。进入下石堡的日伪军兵分两部，一路沿大草岭而上，包围当时驻扎在下石堡的县大队；另一路是沿大石河谷直插下石堡村，目的在于消灭当时设在下石堡的房良抗日县政府。4月23日，县大队率先与日伪军接上了火，接着便是驻扎在该村邓华部的31大队独立二营也与日军在大横岭一线展开了激战。目的是避其日军锋芒，掩护政府及当地的百姓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所以阻击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后，部队便撤出了阵地，仅留十余名战士掩护下石堡村村民转移。三名战士在阻击日伪军时，牺牲在双窖东沟的山坡上，其余的八名战士和群众一起撤到了安全地点。

进入下石堡的日伪军，继续向西进攻，一路烧杀，妄图消灭九区的抗日力量，但在庄户台一线遭到了我军的伏击。日军伤亡甚重，于4月24日又退回下石堡村。日伪军到处放火，烧毁了村民住房760间，村民郑万深的儿子被活活烧死，四个村民被抓走，一村民被砍伤。敌人撤走后，在南窖安插了据点。至此，下石堡村成为敌我双方拉锯战的前沿阵地，饱受了日寇铁蹄的蹂躏。

进入下石堡村距南窖据点仅20华里，中间隔一道山岭，既是我军出山运输物资，进入敌占区的必由之路又是日寇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进犯的通道，所以抗日战争期间多次重大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1939年，日寇第一次扫荡烧毁了全村房屋，乡亲们倍受饥寒，又加上接连几十天的降雨，山洪迸发，冲走了赵家18口人，冲毁了几百亩土地，乡亲们流离失所。这年冬天日寇又开始了第二次扫荡，10月下旬日军飞机轰炸该村，郑家11口人就有6人死亡。又加上日寇的经济封锁，全村100多人出外逃荒要饭，数十人饿死街头。但是英雄的下石堡村人民，并没有被日寇的淫威和艰苦环境吓倒，他们在战争环境里越战地壮大和成熟了。村抗日组织在村东头道山梁顶上竖起“消息树”。一发现敌情，迅速组织队伍掩护村民转移，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日伪军轻易不敢进犯。

1940年至1941年是日寇疯狂地封锁抗日根据地的最困难的时期，下石堡的人民不但为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和情报的传递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为进山输送物资的商贩起到了保护作用。

有一次，一批运送布匹的商贩被敌人的奸细探知，南窖日伪军出动了100多人包围了下石堡，村民们得知后把十几名商贩混杂在几百个村民中间，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保护下来。一开小店的村民因此被敌人抓进了据点，在敌人的酷刑下，没有吐露出商贩为八路军送货的真情，后来村里出钱将其保释了回来。

1940年，由于叛徒告密上石堡党支部遭到破坏，支部书记于进深被敌人杀害。下石堡村人民继承了烈士的遗志，又重新在下石堡建立了党支部，郑玉廷出任村第一任书记，带领全体村民同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还积极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复仇运动，先后对村中以大地主郑荣增为首的四户地主和八户富农进行土改斗争，实行“二五”减租。还动员全体村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仅1940年就开垦荒地一百多亩。全村大部分人学会了纺线，有效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打破了敌的封锁，使抗日战争在平西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抗日形势的转变，日寇更加猖狂。1943年夏，南窖日军企图侵占下石堡，建立向山区进攻的新据点，敌人刚一进入下石堡村边就被上下石堡的游击队击溃，但日寇仍不死心，同年8月日寇星野部又集中了200多名日军，100多名伪军，200多名民夫，再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刚一进入下石堡地区就遭到了以民兵英雄隗和宽为首的游击队的阻击。从上午九点多一直战斗到下午四点多，一举粉碎了敌人的这次秋季扫荡。

1944年，下石堡地区抗日游击活动和除奸反霸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上下石堡的人民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不断袭击南窖、长操、安子高线站等日寇盘踞的据点，涌现出很多抗击日寇的英雄模范人物。

1945年，各解放区对日寇发动了春季攻势，房良地区在主力部队先后攻克了长操、安子、南窖、孤山口等日伪军据点，使这些地区重回人民手中。下石堡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战迹寻踪（一）

——记曾来房山抗战的八路军部队

贲麟

抗日战争时期，后后来我区的八路军部队有由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组建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本文将按照这两支部队来我区的经过、部队的由来、及两支部队以后的发展演变分别进行介绍。

八路军第四纵队

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八路军一一五师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和八路军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组成。

1、来房山活动经过

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第一军分区）政委邓华接到命令，由他率领一支队的第三大队为主组编邓华支队，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三月初，邓华率三大队及由刘杰、李光汉、刘慎之、杨春圃等人组成的平西游击第一支队由涞源出发，出紫荆关沿长城东北行进，经涞水县的板城、涿县的三坡（当时归涿县范

围),进入平西。4月8日,邓华部扩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六支队,但人们仍习惯称为邓华支队。

邓华支队到达平西后,立即组建党的地方组织——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第一营在斋堂川向周围发展,第二营开赴房山,在坨里车站一举摧毁一个维持会,十几名警察携械投诚。由二营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的三十三大队总支书记包森(赵宝森)到房山五区开辟工作,他对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说服地方武装参加抗日,组建了房涑涑游击支队,扩大了党在房山地区的影响,为抗日工作局面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不久,邓华支队在涑水紫石口建立了房涑涑联合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4月14日,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奉命向平西转移,他们由山西雁北地区经河北蔚县、桃花堡于5月25日与邓华支队汇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支队的到来,使平西及房山抗日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共房山第一个党支部在上石堡村建立,抗日活动得到积极的发展。

6月8日,第四纵队离开平西,开赴冀东开展武装斗争。主力部队离开后,由于日寇的进犯和当地土匪武装的叛乱,斗争形势逐渐恶化。

10月,第四纵队由冀东返平西整训,立即开始恢复根据地的工作,重新建立了房山抗日政府,恢复了党的一些基层组织,消灭了房山、涑水、宛平的土匪武装。到1938年末,平西抗日根据地不但得到恢复和巩固,而且比原来扩大了很多,群众的抗日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邓华同志

2、第四纵队的由来

(1) 邓华支队

邓华支队原隶属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三四三旅六八六团。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三原泾阳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三四三旅是由原江西的中央红军主力红一军团组编的,该旅辖六八五、六八六两个团,原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委的邓华任六八六团副团长。

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山西北部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战役以后,八路军奉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0月下旬,一一五师主力向晋南和汾河流域转移,师政委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近两千人留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军区,聂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任第一军分区政委(杨成武任司令员),第一军分区的活动范围包括灵丘、广灵、阳原、浑源、蔚县、涑县、涑水、定兴等县。12月中旬,第一军分区改为第一支队,下属第一、二、三大队。

1938年2月,晋察冀军分区决定邓华率第一支队的三大队组成邓华支队向平西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2) 宋时轮支队

宋时轮支队原隶属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在三原泾阳镇改编中,贺龙创建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加上陕北红二十八军合编为三五八旅,辖七一五、七一六两个团,时任红二十八军长的宋时轮改任七一六团团长。

(注:红二十八军原任军长刘志丹,刘志丹牺牲后,由宋时轮接任)

9月28日，一二〇师决定由七一六团第二营组成宋时轮支队（也称雁北支队），开赴晋北。10月10日，宋时轮支队在晋北怀仁、堡岳之间的辛庄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二十八辆。伏击战以后，宋支队在怀仁、朔县、平鲁一带活动，寻机打击日军。

1938年4月，八路军总部为扩大平西根据地，并为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作准备，决定宋支队挺进平西，与邓华支队汇合。5月25日，两支部队汇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苏梅任政治部主任。

3、第四纵队的发展情况

1938年6月8日，第四纵队离开平西，挺进冀东。7月8日爆发了冀东七县大暴动，暴动队伍攻克玉田县，毙伤日伪军千余人。8月中旬，起义部队与第四纵队汇合，加强了冀东抗日武装力量。

10月，日军集结四个旅团向冀东抗日武装猛扑过来，第四纵队除留包森等一部分部队在冀东与日军周旋外，主力回师平西整训。

第四纵队回到平西后，以邓华支队为第十一支队，以宋时轮支队为第十二支队进行恢复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消灭了三坡、堂上等地方反动武装，恢复了平西的局面。十一支队又开辟了房涞涿新区，打通了与冀中根据地的联系，并扩大了部队，同时建立起一个房涞涿游击支队。

1939年1月，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带部分干部来到平西，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由肖克任司令员。2月7日，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三坡正式成立，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决定十一支队向房涞涿及东南平原地区发展，十二支队向永定河北岸发展。不久宋时轮调走，程世才、伍晋南分别任十二支队司令员和政委。

11月，挺进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编，取消了各支队的建制，十一支队和房涞涿游击大队合编为第六团和第七团；十二支队和平西游击队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九团；抗联和平西游击队的另一部分编为第十团；冀东来平西整训的部队合编为第十二团；在冀东的包森部编为第十三团。

1940年4月，十团开赴平北，十二团也返回冀东，6月，六团、七团也另有任务离开平西，平西地区主要只剩下九团，活动在房山十渡地区及涞水和涿鹿县境内。房山人民亲切地称之为老九团。九团第一任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季龙。此时我们再回顾一下九团的组建历史：

陕北红二十八军——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第二营——八路军宋时轮支队——第四纵队十二支队——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

九团编成后，在司令员肖克带领下，发动了房山南北窖战役，一举攻克南北窖敌军据点，解放红煤厂和坨里，炸毁敌人水电站，给日伪军重大打击。不久，九团又在反扫荡中四战四捷，并参加百团大战，打出了军威。

1943年，在平西战斗了六年之久的老九团奉命离开平西，开赴陕北，于4月到达陕甘宁边区。这时，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的邓华也率部到达陕北，这些由晋察冀军区调来的主力团合编为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部教二旅，邓华任政治委员，从此，这支部队成为保卫党中央的主力部队，一直到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九团先后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教导旅；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始终是西北野战部队的主力团之一。

1945年初，七团返回平西，向敌伪发动了猛烈的进攻。7月，七团攻下长操敌伪据点，接着又连克花港、安子、河北、河南、长沟峪据点之敌。7月17日，七团突袭房山县城并一举攻克。

抗战胜利后，七团先后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战斗任务。

留在冀东的包森等部，逐步汇入到冀热辽军区，1940年，包森成为冀东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包森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

1、来房山活动经过

1938年4月,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由河北阜平奉命开往平西,途经涞源时,消灭一支日军运输队,歼敌百余人,击落日机一架。四月下旬,部队抵平西,接替邓华支队巩固和发展平西根据地。

4月底,五支队先后派杜伯华、郭芳、尚英、贾嵩明在房山五区南窖进行工作,他们吸收了付伯芳、赵然等一批党员,将五区保卫团改造为平西游击队七支队(即房良游击队),建立了房良联合县政府。由于工作开展得好,房良抗日局面有了不小的发展。

7月,正当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时,五支队司令员赵同突然带十几个人叛离,在永定河北岸的田各庄一带拉起百八十人的队伍,自称“华北游击总司令”,使五支队起了很大波动。7月下旬,房涞涿县大队在涞水叛变,杀害抗日干部,形势变得十分复杂。这时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接聂荣臻司令员急电,带两个营星夜兼程从涞源赶到平西。因五支队领导人高鹏、纪亭榭等多次要求将五支队归并入一分区,8月8日,聂荣臻命令五支队的战斗部队与一分区的新三团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团,纪亭榭为团长,袁升平为政委。九月,杨成武带一团、三团奔赴阜平参加反扫荡活动,离开了平西。

2、五支队的由来

五支队是“七七”事变后,起源于北平城郊的一支抗日武装。以流入关内的东北义勇军残余人员和北平爱国学生组成队伍的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东北人民奋起反抗,在白山黑水之间打击日寇。为了策应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张学良不断派人进入东北与这些队伍取得联系,当时在北平东北大学学习的苗可秀、高鹏、纪亭榭被张学良派回家乡联络义勇军。当时在他们家乡本溪有一支邓铁梅领导的民众抗日军,经苗可秀等人联络,参加了这支部队,苗可秀任部队的参谋长。一名叫赵同的中学生参加了苗可秀与邓铁梅的联络,也同时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

1932年4月,邓铁梅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部队由苗可秀带领继续战斗。1933年苗可秀指挥部队袭击汤沟日军时不幸中弹,被日军俘虏杀害。不久部队被打散,赵同等人流入关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赵同、纪亭榭、高鹏等人联络昌平县白羊城民团团总汤万宁父子组织武装。中共地下党委见机派杜伯华、阎铁、汪之力、张如三、史前进等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当这次队伍转移到圆明园遗址正觉寺时,北平地下党又派了王建中、王远因、尚英、贾嵩明等十几名受过军事训练的党员参加这支队伍,部队达到50多人。

8月20日晚,这支部队砸开了位于德胜门的河北省第二监狱,放出几百名犯人,其中许多人参加了部队,部队增至700多人,称号是“国民抗日军”。唯一公开身份的党员汪之力任秘书长。这支队伍经过三星庄整军、黑山扈战斗、妙峰山战斗后,进入宛平的斋堂川,在这里部队得到休整,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十一月,部队收到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亲笔信,决定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汪之力、韩庄、王远因三人由斋堂出发,过清水、东灵山、小五台山终于在蔚县见到了一支队杨成武司令员、邓华政委。他们详细汇报了部队情况,要求部队与八路军合并。

经一支队向聂荣臻汇报并取得同意后,赵同集结部队向蔚县开拔,平西地区留焦土(焦若愚)、宋光等坚持斗争。部队经蔚县、涞源到达河北阜平,军区聂荣臻、舒同等党政领导接见了国民抗日军。经过阜平整军,1938年1月,国民抗日军正式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

3、五支队去向

五支队编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随杨成武司令员战斗在晋察冀边区，成为杨成武部队的主力团。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团的建制一直沿袭了下来，今天这支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第五七七团。

赵同逃走后，经军区多次派人做工作，他坚持不愿回来。1938年底赵同经北平、天津、香港到达重庆，投靠了蒋介石。1939年赵同返回华北，继续敌视八路军，被八路军一二〇师部队在石家庄附近击毙。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战迹寻踪(二)

——记曾来房山抗战的其它部队

贲麟

“七七”事变后，来房山抵抗日军的其它部队有：国民党二十九军零星部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国民党第二十九军

1、最早进入房山正面抵抗日军的是二十九军零星部队

“七七”事变爆发时，二十九军共有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特务旅和两个保安旅，共计十万人。由于军长宋哲元一直寄希望于与日军和平解决“争端”，从而使日军从容从关外、朝鲜及日本本土调集大量兵源。7月25日后战争渐趋激烈，到7月28日，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当晚九点，宋哲元部撤离北平，驻北平的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该师原驻任丘、河间，已调来北平南苑）相继经门头沟、长辛店、房山南撤，二十九军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和驻张家口的一四三师也在与日军战斗后分别于7月末和8月末撤离了防地。

二十九军在撤退过程中，一些零星部队尚在房山继续抵抗日军。据记载，曾有二十九军部分将士在房山西南浴血奋战，另有一个连在定府辛庄坚守两天，打退日军三次进攻，至全部阵亡，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2、二十九军的由来

二十九军的组编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中原爆发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大战以蒋胜，冯、阎失败告终。11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残部由河南战场北渡黄河撤入山西南部。冯的旧部，当时任反蒋联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的宋哲元通过向驻北平的张学良活动，得到二十九军的番号，宋出面收编西北军残部，编为一个军，辖两个师。宋任二十九军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刘汝明以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暂编师师长名义隶属二十九军。

后来，经向宋子文、蒋介石活动，取得蒋的认可和信任。“九一八”以后，张学良撤离北平，二十九军经喜峰口抗战，并继续扩军（刘汝明任一四三师师长、赵登禹任一三二师师长），成为华北地区中日前沿的最大军事力量。

由于二十九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共加紧了对其中上层人物的活动，如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何基沣旅长，

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此时均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加上北平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二十九军抗日热情日趋高涨,这成为部队能浴血抗战的主要原因。

3、二十九军的发展及最终去向

二十九军撤离北平不久,就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二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冯治安任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由宋自兼军长;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由刘汝明任军长,军的番号都暗含“七七”二字。部队集中沿津浦路布防,不久马厂、大名、青县相继失守,第一集团军调第五战区参加台儿庄会战。六十八军直赴皖北向南警戒,五十九军(此时张自忠任军长)在临沂阻挡沿津浦路南侵的日军,七十七军也向五十九军靠拢。徐州会战以后,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扩编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任总司令。1940年5月,张自忠带部队渡汉水在枣阳南瓜店与日军作战时拚死不退,直至阵亡,成为我国八年抗战中死于战场的最高军事将领。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被推向内战前线,遭解放军打击,士气低落。1948年11月8日,驻徐州北大门贾汪矿区的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大部共二万三千余人光荣起义,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这次起义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未参加起义残余部队后来多数在河南永城被聚歼。

由原二十九军发展起来的另一支部队第六十八军因驻守淮河蚌埠,淮海战役结束时逃至江南,与五十五军共同担任铜陵至九江的四百里江防。4月21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六十八军急速南逃,但两个师在江西景德镇被解放军追上歼灭,两个师长被俘。另一个师在江西弋阳由副军长带领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

刘汝明逃到福建后,又恢复了六十八军番号,蒋介石也把吉星文的一二五军缩编成三十七师归属六十八军序列。8月,解放福建战役打响,六十八军立即溃散渡海逃命,一部分逃往台湾的被台湾蒋军缴械遣散,吉星文部逃往金門岛担任守备任务。后来,在解放军对金門的炮战中,吉星文被炸身亡,成为原二十九军最后一件可以交待的事。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二十六路军是“七七”事变后,在房山成建制的正面抵抗日军的国民党部队。

1、来房山抵抗日军经过

1937年7月12日,驻守湖北武胜关一带的二十六路军奉命北上抗日,一路受群众热情欢送,士气十分高昂。但因宋哲元谋求和平解决芦沟桥事变,阻二十六路军于保定。直至宋撤出北平,二十六路军才被允许北上,战机已失。刚到琉璃河就与日军发生激战,掩护二十九军撤退。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留二十七师守琉璃河,其余部队向左翼延伸,三十师张金照部守房山西南高地,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守坨里至南观村一带。从7月30日到9月18日,二十六路军在房山与日军拚死激战五十天,重创日军,推迟了日军的攻势。

到9月18日,各师已伤亡惨重,又无任何后援,日军已运动到后侧,有被包围之势,孙连仲指挥各师交替掩护,撤离了房山县。

2、二十六路军是由原来的二十六路军和二十二路军合编的部队

(1)原二十六路军

原二十六路军是西北军的一部分。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瓦解。孙连仲奉鹿仲麟之命在焦作收容西北军残部,共收容了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董振堂的第十一师、李松昆的第二十五师、季振堂的手枪旅。孙用这些部队向蒋介石讨价还价后,被蒋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共编为两个步兵师,一个骑步师。

1931年春,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剿共”,当二十六路军到达江西宁都、兴国等地后,孙的总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策动旅长董振堂等带领一万七千多人举行著名的宁都大暴动,暴动的队伍编为红军

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组成红五军团。

不久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又在宜黄弃城而逃，造成全师溃退。孙只得把全部队伍缩编成第二十七师，另加一个独立旅。全部人马由二十二个团缩为七个团。

1933年春，蒋介石准备对江西红军第五次围剿，将收编的吉鸿昌二十二路军两个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统一划归孙连仲指挥。

(2) 二十二路军

二十二路军两个师的组成都与吉鸿昌有关。1924年，任营长的吉鸿昌与上司韩复榘闹矛盾，被冯玉祥责打五军棍，撤了营长的职。吉只得去绥远投老上司李鸣钟，任李的副官，不久升警务处长。

1926年，李鸣钟调甘肃督办，李让吉把绥远警察加上一个手枪团凑成一个旅，西去援甘，稳定了甘肃局面。后来吉带这个旅在孙良诚指挥下为困守西安八个月的杨虎臣、李虎臣解了围，声誉倍增，以至盛传“两只虎不如一只鸡”（鸡谐音指吉）。接着吉入关北伐，部队也由一个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九师。1928年吉负伤离队，十九师旅长张印湘升任师长。

吉伤好后去陕西接收了佟麟阁的两个残破的团。他带这个队伍平息了宁夏的叛乱，把宁夏原主席门致中的队伍充实进来，编为第十一师，辖三个旅。吉任师长，兼任宁夏省主席。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吉带十一师参战，多次击败蒋军。但又首先接受了蒋的收买改编。原十九师也同时归附吉接受改编，第十一师改编为三十师，十九师改编为三十一师，两个师组成蒋的第二十二路军。

二十二路军重组编后，调大别山“剿共”，由于吉在“剿共”中与红军发生了联系，被蒋免去总指挥之职，部队也再次被瓦解，终于归并到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七七”事变后，孙就是带着这三个师组成的部队来房山抗战的。

3、二十六路军的发展和最终去向

二十六路军撤离房山后，经易县南下，这时孙连仲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辖由二十六路军组编的三十军和新扩编的四十二军。部队奉命到娘子关阻敌西进，孙部又在娘子关获得击毙魏登大佐并毙伤敌两千人的战绩。但友军协同不力，娘子关被突破，孙将部队开河南整补。

1938年春，孙连仲突然接到紧急开往台儿庄阻敌南下的命令，孙当即命池峰城带三十一师先行占领台儿庄，余部陆续跟进，终获台儿庄大捷，三十军声威大振。

台儿庄战役后，三十军随五战区西迁。先后于唐河、南阳驻防，又随孙连仲调鄂北和鄂西。多次与日军激战。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到北平接收日军投降。三十军调归胡宗南指挥，被驱往河北，参加向解放区进攻，十月遭邯郸附近解放军的重创。后来三十军调太原参加守备，这时原在琉璃河、良乡重创日军的黄樵松升任军长，他反对内战，倾向革命，积极策动三十军起义，不料事泄被害，成为一件憾事。

1949年，三十军随胡宗南十八兵团退往四川，随着解放军的逼近，十八兵团由李振带领于12月27日在成都宣布起义，三十军也由军长鲁崇义带领一道起义，参加了解放军的序列。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房良地区的锄奸反特斗争

王凤奎

房山公安分局，始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称房良县公安局。成立之初，正是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入最艰苦最困难时期，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它积极开展锄奸反特以及同土匪的斗争，有效地维护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为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形势和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一方面操纵伪警务人员，捕杀抗日军民；一方面在边区周围建立特务组织，大量收买当地卖国贼、汉奸，潜入抗日根据地，对我搞渗透、诱降、策反和暗杀等破坏活动。例如，1938年2月，日本鬼子在房山成立的宣武班，就是专门配合日军刺探情报，捕杀抗日义士和无辜百姓的汉奸特务组织。当时的伪房山县长项镇安秉承日军驻房山县联络员的旨意，从伪县署司法警中挑选6名“精干、忠实的人材”编入宣武班。他们四处刺探捕人。两年间，经项镇安审讯后杀害的抗日义士和无辜百姓近50人。

1939年1月至1940年9月，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五次“治安肃正讨伐”作战，实行“囚笼政策”，全面封锁，连续组织兵力进行“扫荡”之后，根据地处于敌顽夹击之中。在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地主豪绅甘当亡国奴，一些土匪、流氓乘机认贼作父，充当密探，为敌效劳；抗日队伍内部也有极少数投机分子对革命产生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充当丁日伪爪牙。1940年11月13日，原民兵中队长王秉旺叛变革命，带领土匪头子罗宗奎、伪军头子程子良等80多人包围了庄户台区公所。在原村长，叛徒郑玉梅的内应下发起攻击。战斗中，我一区区长王英武、县公安局文书景一民等11人被捕，其中6人被杀害。当天夜里，原九区联庄会参谋长杨天沛和罗宗奎召集10多个村的村长30余人开会，声称“八路军确已逃走”、“被日本解决了”，宣布叛变投敌，下令抓捕我工作人员，成立维持会，请“皇军”来“保护”，给“皇军”送情报。接着，又发生了堂上事变、黑牛水事变、王老铺事变、及宝水、龙门台事变(统称一区事变，后被我部队平息)。事变中，我县区干部共被捕46人，其中20人被杀害，一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开展锄奸工作，保卫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便成为刚建立的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

房良县公安局的建立和发展

1940年2月，平西公安分局成立后，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在广大群众中建立锄奸堡垒，建立群众性的公开锄奸组织——锄奸团。3月，平西分局派科员杨明新同志到房良联合县开辟公安工作。杨明新同志到达房良与县长刘介愚取得联系后，在各区干部的配合下，深入各区、村开展工作。先后到六渡、十渡、蒲洼、张坊、上中院、下中院、霞云岭、黄山店、孤山口等地，利用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村建锄奸组，在区建锄奸团。至6月，共建村锄奸组44个、区锄奸团6个，共有锄奸团员268人，干部30人。7月，房良县公安局正式成立，负责人杨明新。又从各区选拔10多名积极分子组成警卫班，配合公安局工作。一区事变后，1940年12

月，平西公安分局为了加强房良县公安局的力量，派王云同志任房良县公安局局长，1941年7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房良县与涞涿县合并成立房涞涿联合县，县公安局局长王法西。1942年2月王法西调走后，王云住局长。当时，房涞涿联合县有村治安员4人，区锄奸团2个、锄奸组29人，共有锄奸团员111人。锄奸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特汉奸，防止特务奸细的渗透破坏活动，监视亲日通敌的可疑分子，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敌特人员活动情报。治安员的职责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掌握敌情动态，协助锄奸反特工作。至1942年4月，房涞涿联合县公安局在锄奸反特斗争中，共破获敌人坐探等案件50余起。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规定：县政府设公安科，掌理锄奸、敌工、清查户口、缉捕盗匪、检举违法分子、维护社会秩序及其它保卫政权、保卫人权事项。3月1日，遵照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房涞涿县公安局改为公安科，其任务是在专员、县长及上级公安局领导下，办理该署、县范围内侦察据点工作和预审、调查、情报、社会管理、干部训练、群众锄奸等事宜。1944年初开始，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八路军和游击队不断攻克日伪据点，根据地不断扩大。7月，房涞涿联合县分开，房山独立建县，刘德湘任房山县公安科科长，至1945年6月，刘德湘调房山县委工作后，由王朝义继任。

锄奸斗争的开展

初建时期的房良县公安局，正值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入困难时期，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对华北采取军事进攻、政治欺骗、经济封锁、文化腐蚀的“总体战”。在十渡一带大肆烧杀抢；对张坊地区严加经济封锁，不择手段地掠夺；在霞云岭、长操山区收买利用叛徒、奸特制造了一区事变，房山的抗日工作一度受阻。为了狠狠打击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消灭死心踏地的汉奸，县委和政府一方面组织精干武装，开展武装锄奸。如1940年11月底派部队平息一区事变，消灭了“三角城”的叛乱分子，打垮了一区的反动武装；一方面组织锄奸团、组和公安员开展群众性的锄奸工作。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1940年11月，县长王天瑞、县公安局负责人杨明新在六渡村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将在日军扫荡中公开欢迎日本鬼子、为日本人送情报、带领敌人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的汉奸分子蔡涯轩和隗甫臣镇压，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

再如，原西苑村农会主任、共产党员张明太，在日本进山后叛变投敌当上保长，为敌人筹粮捐税，给敌人送情报。由于他的告密，敌人杀害了我西苑村民政委员王喜怀，民愤极大。1941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区公安员于振边率几名队员在深夜潜入西苑村，将张明太抓捕处决。

又如，大安山乡维持会长张清海，是日本的铁杆汉奸。1940年日本进山后，他为虎作伥，抓捕杀害我区村干部和党员，先后杀害了宝地洼村村长杨连通、元港村村长安守邦等共产党员，罪恶累累。根据上级决定，1943年3月，区公安员于振边带领王荣英和赵广弟两名游击队员用杀猪刀将其处决。

由于锄奸工作的开展，迫使一些有罪恶的汉奸惶惶不可终日。如伪大安山乡自卫团团团长宋德福，死心踏地为日本效劳，因此决定锄掉他，但宋很小心，经常呆在团部不轻易出来。1943年秋，于振边带领游击队员来到元港村，利用我游击中队长肖士儒是宋德福的盟弟的特殊关系引蛇出洞，将其活捉，审讯后处决。

当时，在解放区内，不但各级党委、政府抓锄奸反特工作，其它部门如武装、民运、敌工等部门都抓。比如1945年6月，我地下工作者和锄奸队一起将汉奸王永珍逮捕处决就是一例。王永珍，岩上村人，汉奸张德祥的同乡义弟，原是我方情报员，但为我方报告敌情是假，暗为日伪忠实谍报员是真。将全村地下工作者名单（共22个）出卖给伪军队部。由于我地下工作者及时了解到情况，果断采取行动将其铲除并提前转移了我方人员，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为兵工厂采运红煤始末

李万富

百花山下的史家营地区盛产优质红煤,在抗日战争中,这里出产的煤炭及时供应着我后方兵工厂的需要。

1939年2月7日,肖克将军在涑水县三坡建立冀热察挺进军。为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在平西建立了后勤供给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等机构。这个兵工厂主要修理军械、铸造炸弹、手榴弹等武器。厂址设在涑水县拒马河边的刘家河村。兵工厂自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曾用百花山下史家营地区的红煤铸造了大量武器弹药,装备了我们抗日部队和民兵,并运到晋察冀、冀热察、冀鲁豫等抗日前线。

该兵工厂搞铸造,多采用史家营地区莲花庵的红煤。此煤溶化的铁水好,铸件不出蜂窝孔,不乱炉、铸炉。

晚清时代,百花山下的红煤就倍受青睐,在距佛子庄村4公里设红煤场(现在的红煤厂村即由此得名),并修建了高线站。每天收购史家营、大安山运出来的红煤炭。那时骆驼、毛驴、骡子驮运煤炭昼夜不停,通过高线斗运往坨里火车站。

北洋政府时期史家营地区大村涧煤山就被圣米石堂庙(原名百山寺)道主蔡一先买下。蔡一先是大兴县庞各庄人,当时和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有来往,段曾挪用军款资助蔡买煤。并出资设计修建了大村涧高线站,将煤运往坨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停止。这时,蔡一先已开出窑口炼了约50多吨煤炭,后来,将这些煤炭运到刘家河兵工厂用于铸造生产设备。

当时,平西专区强调昌宛县(于1939年3月改昌宛联合县)四区(现在史家营乡)发动群众运输。家里凡有牲畜的户都被发动起来驮运。没有牲畜的户出劳力组成自卫军,每人背30到70斤转站。路经堂上村、罗家片、东村庙场等转运站。十天后,50吨红煤炭全部运到了刘家河兵工厂。参加运输的人都是自己带吃的,分文未取。

根据形势需要,我宛平县政府决定在莲花庵开办煤矿,以保证兵工厂日常供应。当时宛平县抗日政府县长魏国元同志对莲花庵地区较熟悉,就亲自前来组织安排,将煤矿定名为“平西专署莲花庵华兴煤矿”,先由谭天书任经理。为搞好平西的统战工作,魏国元又安排了张成苗为经理(原宛平县老八区南山保卫团团长)。我当时十五岁,和张朝勋任会计,开支由专署财政科主管。

煤矿投入生产时,由莲花庵党支部的张国稳,陈文登等找了耿宏文、耿宏武、耿宏同三兄弟和张国为、陈文士共三十多人动工采煤,日产红煤十多吨。

“华兴煤矿”建立后,缺乏资金和设备,靠工人自己带吃的,用一些小工具干起。工人每人每工给四斤小米的折价包干,每天作业十几个小时,自己上山砍取窑柱,没有钢钎,就用铁棍由铁匠炉沾钢后去打眼,一丈多高的坚硬煤层始终是用黑药炸取,导火线是用白毛纸卷黑药做的。有时黑药供不上,就用尖镐掏掘,用最原始的方法取煤。窑内的照明是用当地自制的核桃或杏核油灯。用大荆条编成长圆形的窑筐,筐底下串上“床子”。窑道宽一尺左右,装上横木,这样拉起窑筐滑行省力些。还要特别防备日军往窑内放毒瓦斯,必须搞好窑外对日军的监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保障了兵工厂铸造用煤的生产任务,未发生伤亡事故。

大红煤的运输力量,主要是靠后勤群众完成的。每次运多少,如何转运和交付,由华兴煤矿承担。我曾到堂上当过站长,在建矿开始,专署财政科杨成同志带我到刘家河,去见兵工厂负责人白队长,确定煤炭供应的数量、时间、质量等事宜。

据史家营地区的资料统计：那时 15 到 55 岁的男性自卫军，运粮、运煤等日出勤工一般是 15 个，多的超过 20 个。专区、县为减轻这里的群众负担，从马栏、黄塔一带派人来帮助运送，并抽来补工款补偿。

经过后方人民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将大批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我军兵工厂，保证了兵工厂及时制造武器装备，支援了我军前线作战。在房山抗战史上，百花山下的大红煤起了重要的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 9 辑）

永定河畔的枪声

唐占忠

1943 年冬，张晋龄奉上级党委派遣到涿、良、宛联合县任五区区委书记兼武卫会政委，到窑上（今窑上乡）一带开辟工作，建立抗日根据地。

一天下午，张晋龄化装成卖货郎肩挑货担从固安县出发，沿永定河北上，到大兴县赵村正西时，突然发现一股日本鬼子打着太阳旗迎面走来。为避开敌人，他迅速拐进河道。敌人一见便高声喊道：“站住，不然老子开枪啦！”张晋龄听到敌人嚎叫便加快步伐，踏着枯萎的蒿草，奔向西堤，敌人象疯狗一边追赶，一边“哒、哒、哒、嘟、嘟、嘟”地开枪。

为缩小目标，张晋龄扔下货担，猫着腰机敏地跃出西堤。这时，正在堤下碱铺前熬碱的农民张珍听到枪声，知道鬼子来了，刚要熄灭灶里火准备躲避，只见一个年轻人冲他跑来；跑到近前冲张珍说：“我是八路军，鬼子追我呢！”张珍听说八路军是打鬼子保护老百姓的，早已盼花了眼。在生死关头，他对面前这个八路军，惜爱之心油然而生，于是想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两人急忙对换了穿戴，张珍嘱咐张晋龄说：“敌人来了要问你你就说那人钻草塘了。”转身便飞快地钻进了草塘。

刹那间，鬼子象饿狼向碱铺扑来，张晋龄镇定地蹲在碱锅旁往灶里添着柴禾，汉奸端着枪逼问：“熬碱的，刚才跑过来那个人呢？”张晋龄往西一指说：“钻草塘了。”这时，太阳快落山，北风刺骨寒，敌人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塘前，感到束手无策。于是，恶狠狠地向草塘里乱开一阵枪。一个鬼子叫了声：“回去的干活！”敌人滚蛋了。

张晋龄松了口气，站在碱铺前望着夕阳西下的草塘，正在思虑熬碱人是否被敌人乱枪伤害时，只见张珍钻出草塘向碱铺走来。两人四目相对，象久别重逢的战友拥抱在一起了。进了碱铺亲切地各自作了介绍，张珍高兴地说：“有你引路跟敌人干，我们穷苦人算有希望了！”张晋龄语重心长接着说：“这里还是敌占区，要开辟抗日根据地，当务之急是找个秘密立足点，然后开展地下活动，组织民众同敌人斗争……”张珍听了说：“这碱铺离村远，没人来，做你的落脚点最安全，怎么样？”张晋龄笑着说：“那你就是我的堡垒户啦！”

从此，两人象亲兄弟，白天一起在这里熬碱，晚上一同进韩营村宣传抗日政策，串联贫苦农民。为壮大党的组织，一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夜晚，在这个碱铺里，张晋龄把韩营村张珍、车兴贵、韩仲山等苦大仇深的农民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起窑上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以后，张晋龄领导武工队、区小队、民兵和广大民众，在京汉铁路以东永定河两岸，纵横驰骋，曾三闯良乡城、四进葫芦堡、三打公义庄、夜战小清河等同敌人斗争，创造了不朽功迹。

（《房山文史资料》第 9 辑）

我所经历的民国三十二年

隗有忠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成立五十周年。在这举国上下共庆共和国五十岁华诞之际，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在这幸福的日子，不禁回想起我在解放前的悲惨生活。今昔对比，由衷地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喜人变化。为使后人不忘过去，特将我所亲身经历的一段难忘生活写出来，作为纪念。

民国三十二年，我的家乡下英水一带遇到从来没有过的天灾人祸。当时家乡正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敌人政治上实行强化治安和经济封锁，经常要粮要夫，数不尽的苛捐杂税，把老百姓推向死亡的边缘。再加民国三十一年又闹了一场毁灭性虫灾，真是雪上加霜。

我记得刚进入立秋季，玉米开始吐天穗，谷子正在灌浆长粒。突然地里家家户户的庄稼都发现了粘虫，走到地头就能听到“沙沙”虫子吃庄稼的声音。那时既没人管又没有药，家家户户都到地里灭虫。有的用手捉，有的往簸箕里摇，有的使棍子打，用尽了办法。但因虫灾来势猛，面积大，几天就把到嘴边的粮食全部吃光，种玉米的还有两三成收成，种谷子颗粒无收。这一年大多户的粮食不到春节就吃完了，不少户春节连顿杂合面的饺子都没吃上。既没粮吃又没人管，怎么活？第一步是卖家当，借债维持生活。当时我家六口人，父、母、我、弟弟和两个妹妹。正常年景全家靠四亩山坡地和地里的土特产，再加上父亲农闲时走窑和打短工为生，日子过得就很艰难。这年春节只吃顿杂合面饺子，春节一过就没吃的了。先是到地里砍木头，卖给炭窑。当时砍一百斤也换不了二斤粮食，砍一天木头换来粮食不够一天吃的。家里的家具只要有人要就都卖掉了，只留下吃饭用的锅碗。最后只得借高利贷，什么小柿子钱、核桃钱、花椒钱，地里有什么果就借什么钱，还得按秋天的价钱，有果还果，没果还钱。春天借秋天还，利钱翻上两三倍（这是我们那一代特有的高利贷剥削形式），借的钱买粮食和糠菜。那年头吃上混合面是好的，白菜帮子、白薯秧子都得花钱去买，树叶、树皮，凡是能吃的都吃了。就在这拼命挣扎的情况下，也要想办法种上四亩山坡地。当时，种上这地非常困难。父亲没等地种完，就去门头沟走窑，剩下母亲和几个孩子。没有吃，母亲就带我们上午种地，下午砍柴，换回粮食吃了再去种地。家离地有四五里路，还要爬两道岭，越两道沟。早晨从家里吃点菜粥，到地里就饿了，还得坚持干活。没钱耕地，就种“铁茬”，没肥料就烧草木灰当肥料，就这样拼死拼活总算把地种上了。就在这死亡线挣扎的时候，日本鬼子和伪政权的苛捐杂税照收不误。今天要劳力出夫修炮楼，明天要粮要钱。拿不出粮钱，伪保长带人到家里去翻，见什么有用就拿什么，种子、水桶、锅，没有不要的。不给就打，时常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游街，简直没有穷人活的份儿。

第二步是逃荒要饭，给日本人做工。我母亲带弟弟和大妹妹，抱着小妹妹逃荒要饭。我和父亲去岭北（门头沟丰沙线）修铁路。母亲他们去房山东饶乐府村粥厂打粥吃，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人每次一勺。打的粥根本不够吃，还得去附近村要。夜晚找房檐、草垛过夜。听母亲讲，后来打粥的人越来越多，粥越来越稀，后面人时常打不上，只好挨饿。大约一个来月的时间，家里地里的小苗快锄头遍草了，就回家了。到地里一看，苗情还出得不错，但一点吃的都没有，怎么锄地呢？于是又把地里的柿子树、梨树、核桃树大约四、五十棵典给了西班牙庄村佟玉连家。地里所有的果树，只给两斗玉米，凑合着把头遍地锄完。这时，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体质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母亲，干在前头，吃在后头，还得照顾不满一周岁的小妹妹，

身体很瘦弱，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如果继续下去，大人垮了，三个孩子没人管，肯定一个也活不了。想到这里，母亲掉下眼泪，感到害怕。为了活下去，没别的办法，只好把小妹妹扔掉，觉得扔后万一遇到好人拣去还有生存的可能。有一天，母亲和弟弟走到房山城“长八里”的地方，又渴又饿又热，就商量把妹妹扔掉好往前赶路，但谁也舍不得。最后，母亲和弟弟围在一起大哭一场，一狠心还是把小妹妹扔掉了。母亲走出很远又回头看看，还听到小妹妹喊着“妈！”的哭叫声。后来是死还是活，至今没有音信。母亲在世时，无论什么时候提起这件事，都止不住地掉眼泪。

我和父亲先后去了安家庄、珠窝给日本人修铁路，日本鬼子既不给工钱又不让吃饱，挨打就不用说了。有病不但不给看，带着活气就拉出去喂狼，我和父亲商量不能再干下去了，就回了家。

第三步是卖掉房子去逃荒。这时，已到旧历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该卖的都卖光了，能典当的都典当了，只剩下地皮是自己的，村里人全家饿死的也不少。没饿死的人都是长长的脖子，瘦长的腿，走起路来回晃，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连一桶水都挑不动了。我们家六口人也剩下五口人了，是在家里等着活活饿死，还是想办法闯过这鬼门关。我父母商量，唯一办法是把房子卖掉，逃荒到外求生。原来的想法是，“能卖吃饭的锅，不卖住人的窝”，意思是出去要饭回来，也得有落脚的地方。现在想开了，如果人都饿死了，留下“窝”又有什么用。因此，决定把两间半旧石板房卖了，卖了一百四十元日本鬼票子，除了还债，剩下的做路费。旧历六月初三，从坨里乘火车，全家去了下花园。

到了下花园，遇到了先去那里的老乡。由老乡介绍，我们到离下花园三里的戴家营村，托人在村边找到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场房，一家五口人就住在那里。父亲在下花园电厂找了份临时活，每天挣三斤混合面。如果电厂没活，就给地主打短做农活。母亲带着我们拾麦子、打野菜，后来我又在戴家营村找了个放羊的差事，总算还能过得去。

到了旧历六月底，父亲和母亲商量怎么回家的事。因为快到立秋了，家里种的地，来时锄了头遍，快到收获的季节了，回家也饿不死了。于是，就把来时我大伯给我们的一床被子和一件棉大衣卖掉了做为路费。旧历七月初三从下花园乘火车回到北京。路费不够，只能到北京西直门，从西直门步行三天才到家。但已是无家可归了，只好回到地里，一家五口人住在原来看庄稼、水果的“小铺棚”。这年雨水比较大，地里庄稼长势还不错，玉米已抽穗，谷子也发黄了。我们种地时撒了很多蔓荆菜子，苗也出了不少，长得也很好，这一年总算从死亡线上熬过来了。后来我们回村一打听，村里许多家死的、逃荒的、被卖的人很多，不少的房子无人居住，长了黄蒿，藏了兔子。我们这一家子除了小妹妹以外，总算渡过了这场大灾大难。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一次特殊的任务

顾宪图

1947年腊月二十四，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高璞来良乡县检查对敌斗争情况。我奉命到县武装部向高司令汇报武工队对敌斗争工作，当时县委书记刘祥庆、武装部长张志安和耿子华等都在场。

我一进门，刘祥庆同志就向高司令介绍说：“这就是武工队长顾宪图同志。”高司令问我近来武工队活动情

况,我说:“近日主要是两项任务。一是宣传动员敌占区群众抵抗敌人抓兵和抗粮;二是割断电话线,破坏铁路交通线,把铁路炸断,让敌人三四天不能通车。”高司令又问:“武工队都在什么地方活动?”我答道:“卢沟桥往南、琉璃河往北一段”。他表扬我们干得好,鼓励我们要设法扩大战果,向敌人心脏部位发展。接着,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高司令说:“据我所知,丰台车站西北有个华北最大的日本军用仓库,现为国民党占用。你们如果能把它炸毁,那比炸断两三处铁路线影响大得多呀!”刘祥庆同志说:“顾宪图同志能接受这个任务吗?”我忙说:“保证完成这个任务。”高司令说:“你考虑一下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提出来。”我说:“那个军用仓库在丰台西北大井村南,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途中要经敌人六、七处据点,人多了,目标太大,只能三四个人去完成。最好是化装成敌人在白天混过去,夜间去炸。”高司令说:“想法很好。你们如果能完成这个特殊任务,就能阻止北平敌人向南增援物资弹药,从而能有力地配合我军解放涞水、石家庄的战斗。”刘祥庆、张志安同志也都提出要求,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好,注意保密,完成任务后,要安全返回。

我回到驻地找到战士王俊臣,把任务作了简要交待。随后我二人去北洛平村找到伪保长王佃要了两辆自行车,化装成敌特工人员,去大井敌仓库外侦查好地形和敌人警戒情况,马上返回北公村。然后,我们要伪保长再准备两辆自行车、四件比较高级的棉袍,天黑后送到北洛平,并警告他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要车了,如走漏消息就砍他的脑袋。回到驻地由情报站借调了情报员马向录,从独立营借来一个姓康的班长(因这二人都会骑车)。腊月二十八下午,我们一行四人都是敌人特务打扮,带上二十斤炸药,每人两颗手榴弹、一支手枪,顺利到了卢沟桥东关的一个茶馆休息,伺机行动。

正当我们休息时,突然来了两个特务茶馆买烟。其中一个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一句:“你二位是干什么的?”他说是〇七六〇部队的,我说:“我们是警备队的,刚从桥西派出所郭振江所长那里来。你们有事吗?”敌人答:“没事。”幸亏我们的沉着应对,躲过一场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刚下过雪,天又快黑了。大家商议到五里店马路边小饭馆吃一点儿东西。于是,我们骑车到了五里店一个老两口开的小饭馆,每人要了四个烧饼、一碗炸豆腐。刚吃完,饭馆的老太太从外面跑进来,惊慌失措地说:“可了不得了啦,带铁帽子的那六个人又来了。”我们往外一看,六个头带钢盔,臂上有巡查队袖标的人朝饭馆走了过来。老太太说:“他们净抓人、打人。”正说着,敌人到了门口,要在这里烤烤火,避避风,还开口盘查我们。我佯装没听见,忙示意王俊臣说:“嘿,王队长,你得了儿子大喜事应该请客。”王说:“走,到我家里喝去。”我们镇定自若,离开了小饭馆。

我们到了大井村西进一步研究了战斗方案,又悄悄到敌仓库对面看了地形。仓库北大门有两个小木屋,有两名岗哨。过了一会儿,看到靠东边那个敌人进去了,西边这家伙还在小木屋站着。我和王俊臣二人上前假装问路。敌人见我二人推车过去,就对我们喊着“不准过来。”我说:“问一下路,请你告诉我。”敌人答:“不知道。”一面说着一面从小木屋边走过来。我们还是向前走,与他纠缠。这时,马向录猛地从身后扑上去把他按倒,用皮帽把敌人的脸、嘴全堵上,拉到南边小屋后给整死了。接着,我和王俊臣、小康三人看到院内西边一排大仓库门口有辆汽车,上边装着两个油桶,我就把炸药放到汽车上,命令王俊臣、小康把炸药放在仓库门口,点着引线后跑出院,骑上车径直往西北撤出。身后传来的炸药爆炸声响成一片,我们到卢沟桥时爆炸声还不断,敌仓库在一片爆炸声中飞上了天。

第二天中午,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不失一兵一卒返回驻地,圆满完成了高司令交给我们的特殊任务。这次特殊行动给了敌人一次狠狠的打击,支援了我军解放涞水、石家庄的战斗。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

我在北平市军管会的一段经历

杨文祥

回顾1948年11月末到1949年1月初，刚满14岁的我在北平市军管会当勤务兵的生活，仅仅一个多月的人生历程，奠定了一生忠诚于人民事业的人生观基础，这是永生难忘的。

1948年旧历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二姨母高高兴兴地来到我家，一进门没容喘气便告诉我母亲说：“大姐，锡珍（化名张晓梅）他们回来啦！和解放军一块过来的。他们两口子一块到东羊庄家去了。”我妈听到以后惊喜交加。二姨接着说：“他们都是解放军，说过几天还来看你们呢！”

张锡珍参加革命后化名张晓梅，是我二姨父张锡恩的三妹妹。大妹妹张锡瑗早年从事革命已病故。二妹妹张锡瑞和锡瑗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后被党派到天津搞工运时被迫害，死时还没结婚。三妹妹张锡珍（张晓梅）1928年便远离家乡参加革命，一直没有音讯。走时才只有十六、七岁，在我妈眼中还是孩子，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姨父在铁路上做事早年去世，家中只剩下我二姨母带着我年幼的姨哥寄身在姥姥家，伴随老人度过几十年，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因为没有音讯，所以他们参加革命的事情，从未对任何人提过。

1948年旧历11月良乡刚刚解放，我和姨哥都正在良乡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由于良乡刚解放，良乡中学又与北岳区第三中学并校、整顿，又加上快放寒假了，学校基本上已停课，所以我和我姨哥便呆在家里，每天除了要专心完成几篇大字和几行小字的书法之外，几乎只是玩。

我管张晓梅叫三姑，没见过面。她参加革命时我还未问世。1948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晴朗，我二姨母陪同张晓梅和三姑父徐冰（北平解放后任北平副市长）来到我家，一进门张晓梅见到我妈说：“这是大姐吧？”我妈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一时发愣，半晌才说：“这是锡珍吧？”。大家都十分高兴，几十年后的重逢分外亲切，一直坐了半个小时叙旧。我当时只知道三姑他们是解放军，看不出他们任什么职务。每人一身灰色的粗布军装和一双粗布棉鞋。三姑母谈话时常常露出笑容，圆胖的脸上显得饱经风霜。徐冰是个豁达开朗的人，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脸上还有些胡子茬，讲话爽朗清脆。谈话中问起我们，我妈说：“学校放假了没什么事，不行让这两个孩子帮你们干点活，不然在家也是玩。”自此我们兄弟二人便成了军管会的勤务了。

当时的军管会设在良乡北后街（原良乡医院后边的一家院落里），这是良乡有名大财主吴凤钧的旧宅院，门朝南开，一进院五间大东房和三间南房、三间北房。三姑俩口住在东房的北头两间，堂屋中间放着一张大条案，是开会时谈话用的。他们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兵和一个炊事员。做饭时三姑俩口也亲自下手帮忙。我们去了之后，三姑告诉我说：“这地方保密，这里的什么事不准对任何人说”。我们一一记在心里，所以我们对这里的事从不打听，每天去担水、扫院子、扫地、帮摘菜、洗碗等。没事时便和卫兵一块在地上来“联儿”，看他擦枪。这里的事一直没对任何人讲过。

这里穿解放军军装的人来来往往。常在这里上班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高高的个儿，据说姓薛，叫薛子正（北平解放后任军管会秘书长，后任统战部副部长）。我们只管干活，不打听闲事，但心中也隐约知道这些人都是为解放北平的事情在忙。

到这里我听到的最新颖的话是“为人民服务”。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悟出这词的意义，就是为人民为劳动群众服务，干好事情。我们干活到晚上回家，对家里人也不说什么。

三姑俩口在闲余时刻也和我们说几句话。他们平易近人，我们也不怕他们，因为那时我们只知道他们是解

放军，不知道有多大的官衔。他们常讲，你们长大以后要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好好为人民服务。有时他们拿出炒花生、冻柿子叫我们吃，我们在这里很随便。但他们叮嘱我们的话，我却深深地印在幼小的心灵之中了。

一天的午后，炊事员和警卫员买回来好多的青菜、花生和桔子，还带回一块肉。整个下午大家忙个不停，摘菜、洗菜，原来这天晚上徐冰的大女儿要举行婚礼。大家忙着把南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几张桌子对到一块铺上桌布，上面摆上一些花生、桔子，在南屋的西头墙上端端正正地挂上毛主席像。傍晚，婚礼即将开始之前，来了十几个穿军装的人，都彬彬有礼。一会儿从大门开进一辆军用吉普车，车上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位中年人身材魁梧，戴一副黑边眼镜，穿一件军用大衣。其他两人一看便是警卫，都带着枪。人们很有礼貌地把客人让到南屋，送茶上去。我们在窗外看到这个首长笑容可掬地向主人道喜(徐冰的大女儿也在军队里工作)。典礼开始，既无奏乐声，也无鞭炮响，院里那样雅静，更没有披红挂绿的景象。新郎新娘朝主席像行了礼后，只有几个人讲了几句话，人们便开饭了。我们端菜、端饭，没有听到让酒之声。后来听警卫员说，那天车上下下来的人是叶剑英，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官儿。

眼看春节快到了，1949年1月初的一天，三姑母把我叫到房里问：“你们学校快开学了吗？”又告诉我说：“我们快调走了，要去北平，你年岁还小，要回校继续读书，好好学习本领，长大参加革命。”三姑父指着房里书架上的书说：“这些书你能看懂吗？”我一看都是大厚本子的马列书籍，我说看不懂。三姑父站起来走到书架边，翻了一阵子找出两本书给我，这两本都不厚，一本是《女共产党员帅大姐(帅孟奇)》，一本是《我的大学》(高尔基著)。我高兴得不得了，如获至宝。三姑父笑着说：“这你能看懂的，好好学习罢，等长大以后学好本领，做个有用的人，好好为人民服务。”这些话我一记在心中。

学校开学后。我又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北平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我三姑父是北平市军管会的副主任(北平市副市长)，叶剑英是军管会主任(北平市市长)。我这才知道这些解放军原来是革命政府的领导人。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把送我的书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女共产党员帅大姐在敌人监牢之中坚贞不屈的伟大形象激励着我。看到高尔基在童年的艰苦环境中还坚持学习，最终走上革命之路。这一切都在指引和告诫我怎样做一个忠于革命事业的人，为我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回校后在学校里又接受更多的革命教育，使我更加明确了我的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我勤奋学习并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如欢送解放大军下江南、参加秧歌队演节目、大搞宣传活动等都使我受到实践锻炼。

194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光荣地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学生会干部和青年团团支部干部。我永生不会忘记我在军管会的一段珍贵的历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解放初期良乡中学的文化生活

刘振样

回忆建国前后良乡中学的文化生活，我的脑海立刻就会闪现出那欢欣鼓舞、朝气蓬勃、满腔热忱、追求真理、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火热年代。解放初期的良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也是文化的中心。当时战争尚未结束，政治任务还相当紧迫和繁重。当时良中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在有关政治任务的各个节日中，对大家都

起到了巨大的鼓舞推动作用。

1948年11月良乡解放，当时我在良中二年级就读。1949年初，察哈尔省北岳区第三中学的领导赵西平、王磊和部分老师高明允、高明远、谭九皋、李佩璋等接管了良中。三中的同学于1949年初先后到齐，原三中同学是为解放大城市培训的干部。不久，良中与察哈尔省北岳区第三中学合并，改名为察哈尔省北岳区第三中学，简称北岳三中。1949年底北岳区划归河北省，校名又改为河北省立良乡中学。

在建国前夕，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夺取全国胜利。在这火热年代中，动员群众参加战争、欢送解放大军南下、歌唱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是主旋律，良中同学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以下是当时同学们最喜爱唱的歌曲：

起来!同胞们!快起来!
全国的工农兵学商,
团结起来,上战场,
要把那法西斯卖国贼一扫光!
你看,全中国在怒吼,
革命的烈火正高涨,
解放军到处都接连打胜仗!
美国强盗,
叫他们快滚蛋!
消灭那蒋宋孔陈官僚买办,
老百姓,
今天要掌政权,
土地改革要实现耕者有其田。
起来!同胞们!快起来!
全国的工农兵学商,
团结起来,上战场,
要把那法西斯卖国贼一扫光!
打到南京去!
活捉蒋介石,嗨!活捉蒋介石。
蒋介石就要垮台,要垮台。
嗨!解放大军盖地来!
他后门失了火没有路逃,
劈头打他他头难抬,
嗨!四面八方齐下手,
活捉头号大汉奸,
打到南京去.....
万众一心,大军向南,
人民的力量蒋匪胆寒!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我们有兄弟兵团协同作战,
我们有高度的阶级自觉,

我们有广大的人民支援。
谁敢阻挡!
谁敢阻挡哪黄河的万里奔流,
谁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嘿,百万大军向前进攻,
那万恶的蒋匪帮,
封建和独裁都要灭亡。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
我们永远属于人民!
英勇善战,坚定顽强,
没有攻不下的城市,
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胜利前进!
前进胜利,胜利前进,胜利向前进!

淮海战役节节胜利,在追敌的战场上,当时普遍地歌唱着:

追上去!追上去!不叫敌人喘气,
追上去!追上去!不叫敌人跑掉!
看!敌人混乱了,敌人动摇了,敌人逃跑了!
同志们!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不怕困难,不怕饥寒,
逢山过山,逢水过水,
乘胜追击,迅速赶上,
包围它,歼灭它,包围它,歼灭它,
歼灭它!
中华民族英雄汉,嗨!人民解放军。
同志们向前进,
为祖国独立,为人民翻身,
勇敢向前进!
胜利紧接着胜利,
进攻紧接着进攻,
毛主席、朱总司令,
领导我们,百战百胜,
消灭反动派,攻占南京城,
人民解放军,
走到哪里,哪里胜利,
人民解放军,
开到哪里,哪里解放,

你看，他东边起了义，西边投了降！
他顾头顾不了尾，他喊爹又叫娘，
打垮蒋家小朝廷，人民得解放，
人民得解放！

在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良乡中学的师生，庆祝胜利锣鼓喧天，同学们扮演工、农、兵、学、商，打着腰鼓，扭着秧歌。10月1日的那天，全城人民聚集在良乡闫家大院，放炮二十八响，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学们唱干了嗓子仍激情不减，跳得汗流浹背，谁也不喊累。当时有些歌曲至今还记得：

千里雷，万里闪，
解放军，过江南，
上海武汉都解放，
胜利在眼前！
十月里的太阳照满院，
胜利的消息传遍各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呀！
红旗飘飘满中华……
大旗一举满天红嗨，
唉嗨哟喉，满天红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成立呀，
唉嗨哟喉，伊嗨呀喉！
我们欢呼！
我们高歌！
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高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新的国家，
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
这新中国像那太阳，
升起在东方，
放射出光芒万丈！
美丽的旗，
庄严的旗，
革命的旗，
团结的旗。
四个小星朝向一个大星，
万众一心朝向人民革命。
我们保卫他，
他引导我们前进前进向前进！

在解放初期的日子里，良中的同学，那真像孩子见到了亲娘，深夜里见了灯光。不论是对革命的知识 and 理论的学习，还是对革命的歌曲和歌剧的学唱，都是如饥似渴。我深深感到，当时良中的文化生活是时代的产物，

时代的感情，时代的动力，时代的呼声。这股无穷的力量一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发热发光。在这些歌曲中，除了经常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有不少歌曲至今仍能歌唱：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中国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中国一定解放！
年轻人，火热的心。
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前进！
挺起胸来，
年轻的兄弟姐妹们，
新中国的一切，
要我们安排，
新中国的一切，
要我们当家作主人，
嗨，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战士们！
为人民服务，勇敢地向前进，
生产战斗，努力学习，
消灭封建，消灭蒋匪军，
谁敢阻挡我们走向胜利，
谁敢阻挡我们万里奔腾，
毛泽东是胜利的太阳，
照耀着我们前进！
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战士们，
永远、永远地快乐前进！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作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要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讴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五四是我们中国的青年节，
纪念五四，
发扬五四救国的精神，
继承五四革命的传统，
新中国的青年，准备好在今天，
加紧我们的工作，冲锋！
前进！中国的学生们：
前进！前进！中国的学生们，
快献出我们的力量，来建设城市和乡村，
苦难的人民在等待我们，
坚决大胆，勇敢向前进！
越过平原，爬过山坡……
前进，前进，中国的学生们，
大踏步向前进！
胜利地向前进！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日子里，学生唱的有《五月的鲜花》、《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五月的花儿开呀》、《铁路工人歌》等歌曲。如《铁路工人歌》这首歌还记得很清，而且在其他地方不常听见。现记如下：

铁路工人日夜不停开动着火车头，
开着十挂列车、百挂列车，
一直地、一直地、一直地向前走！
历史的车轮飞快地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渡过长江大河，
穿过高山峻岭，
谁也不能扭转它退后，
它总是一直地、一直地、一直地向前走！
走！走！走！嗨！

在庆祝“七一”党的生日里，同学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学了很多有关的歌曲：

七月一，七月一，
男女老少齐欢喜，
敲起锣鼓开大会，
庆祝共产党过生日……
中国人民要解放，

中国有了共产党，
共产党为人民，
三十年来战斗在祖国的土地上，
一尺布来一颗粮，
一寸土地一支枪，
三十年来战斗，三十年来成长，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今天，江海在翻腾，宇宙在震荡，
从城市到村庄，从葱岭到珠江，
到处是红旗飘扬，
到处都把胜利的歌儿唱。
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就得到了解放，
今天，我们要高呼，我们要歌唱，
我们要高呼，我们要歌唱，
光荣属于人民，
光荣属于中国共户党！

在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尚未发动时，党中央开始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台湾岛内人民也在墙壁上、电杆上贴出了“欢迎解放军解放台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这时良中又唱出了有关解放台湾的歌曲：

我们生在海洋，
我们长在高山。
满清皇帝出卖我们，
台湾已沦亡了五十年，
自从那蒋介石来统治，
台湾地灾难说不完，
美帝国主义的诡计多，
妄想把台湾来侵占。
台湾的人民，坚决地反抗，
斗争的烈火遍地燃。
海洋呵，是祖国的海洋！
边疆呵，是祖国的边疆！
我们盼望着共产党、解放军，
毛主席的队伍赶快来解放，
像在茫茫的黑夜里，
我们盼望着天亮！

良中的歌剧，当时称得起响彻全城，深入人心。为宣传、教育、鼓舞、激励群众，同学们在保证学习好的基础上，晚上还要排练歌剧节目为校外演出作准备，这项任务非常繁重。《刘胡兰》、《白毛女》、《王秀鸾》、《小二黑结婚》、《宝山参军》、《兄妹开荒》等十多个歌剧，同学们背词、排练、导演，每个月最少要用几天时间。各班同学几乎都参加节目，至少要参加大合唱。

良中的文化生活不仅宣传教育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广大同学的政治思想觉悟。仅1949到1950两年时间，许多同学参军，被选拔为译电员、地方干部、京西煤矿骨干力量等。同学们都是听党的话不讲条件，如几次参军同学们都是积极报名，奋勇争先。我在班上也报了名，并写了要求上前线的诗，1950年上半年发表在《河北日报》上。

50年了，虽已时过境迁，但当年良中的歌曲歌剧的欢乐声音，有时仍响在耳边，挂在嘴边。良中的歌声伴随我风风雨雨度过了五十年，在我的生活中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些歌曲的片段已成了我的口头禅。现在，有些我经常唱的歌小孙女也会唱，可见解放初期，良中的文化生活的影响有多深多广。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房良两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王凤奎

新中国成立后，房山、良乡两县残留的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军政警宪人员和特务分子，以各种方式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尤其是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反革命残余分子在社会上大肆散布政治谣言，并疯狂进行路劫、袭击仓库、凶杀暗害、纵火暴动等破坏活动，大肆反攻倒算。7、8月份，反革命破坏案件明显增加。7月10日，房山县1名公安员被杀，抢走冲锋枪1支，子弹30发；7月14日，一个灰窑被抢；8月2日，1名民兵被炸伤；8月9日，3名村干部遭袭击，抢走步枪3支，子弹104发。

房、良两县公安局遵照中共中央和县委的指示，从1949年6月开始，重点惩治了一批公开活动且危害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对安定城乡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因新政权建立不久，群众发动不充分，许多干部片面强调教育改造和宽大处理，也存在宽大无边和镇压不足的问题，致使一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分子漏网。这不仅影响或挫伤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生产建设的热情，而且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的稳定和巩固。

第一次镇反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打击的对象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统称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镇反的政策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同年11月26日至29日，房、良两县公安局分别召开公安会议，传达中央“双十指示”，贯彻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部署全县镇反工作。房、良两县第一次镇反运动宣告开始。

第一阶段，（1950年11月—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开始后，两县公安局按照县委部署，认真贯彻“党委领导、全党动员、发动群众”的方针，首先在党内统一思想，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然后，运用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镇反政策。为加强对镇反工作的领导，11月25日，房山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崔洛春、县长杜恩霖为领导的保卫委员会；良乡县公安局与法院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联合办公室。首先，对现

押未决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清理,对过去处理不当的首恶分子、死心塌地分子或释放后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分子加以复查。同时实施重点侦察,掌握了一批有血债的特务分子、恶霸、惯匪和反攻倒算的地富分子。12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兰衣社”,依法逮捕了杜腾云、胡兆年、芦耀宗、赵玉良(1951年3月4日,杜、胡被处决)。同月,良乡县局破获了以高岩为首的“九路军”反动组织(1951年3月10日将高岩处决)。1951年1月,两县公安局遵照通县专署公安处关于对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大佛教、九宫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进行打击取缔的指示,在县委领导下,训练干部共83名,拟定了具体工作方案。月内,共逮捕首恶分子41名。2月,两县公安局在河北省公安厅与通县、保定专署公安处的领导下,与涿县、固安联合,一举侦破九宫道大元帅暴乱案,逮捕首要分子14名,朱锡华、朱锡龄等8名分子被判死刑。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后,两县公安局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原则,在县委领导下,迅速确定了一批捕判对象。3月1日,两县公安局分别与武装部、法院等有关部门配合,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采取第一次统一行动,集中逮捕反革命分子共121名。4月6日至8日,第二次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分子共185名。两县公安局结合公开逮捕反革命分子的具体行动,召开群众控诉会、公审会,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解除了思想顾虑,掀起了群众性的伸冤报仇、控诉检举活动。4月27日,两县分别举行公判大会,公开判处53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如军留庄村苏老太太,自政府杀掉反革命杀人犯刘汉奎后,看到我县干部就往家里请说:“家去吧!我那儿子活着时也 and 你们一样,背着枪干工作,被刘汉奎杀了,政府为我们报了仇,咱们是一家人。”边说边给我干部做饭。又如于管营村村民原被反革命道会门控制,村里130户人家有127户加入了道会门,区县干部到该村工作信心不足。镇压了反革命道会后,干部信心足了,群众情绪高涨了,一次抗美援朝捐款就达到300多万元(旧币)。再如:两个小商贩看见四区葫芦堡村道头子在城内贴反标后,主动将其抓住交给了政府。5月至7月,房山县共收到群众口头控诉反革命罪行的案件298起,书面控诉9000件以上。

随着群众镇反热情的不断高涨,河北省委根据省内一些地方开始滋长“多捕多杀”的“左”的情绪和草率从事的现象,根据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于1951年5月24日,及时作出将全省镇反运动收缩的决定。从6月1日起至9月30日的4个月内,除现行犯外停止了捕人。房山、良乡两县根据河北省委指示,把运动转入巩固镇反成果工作中。以主要精力清理积案。在城乡普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开展对不够捕判的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

清案工作在两县县委领导下,有计划地将人犯名单交区、村干部和群众讨论、评案,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镇反积极性,使案犯处理更加准确、迅速。7月15日,房山县召开各界代表会,由主席团提名,产生了审案委员会共13人(其中在职干部5人、荣誉军人代表1人、开明士绅1人、回民代表1人、工商界代表1人、农民代表2人、教育界代表2人),听取案情报告,审查案情,对38名反革命案犯进行了量刑处理。至8月初,房山县5个区群众所评案犯共92名。良乡县6至7月,将102名罪犯材料进行了清理,并经各界代表会量刑。8月,又组织公安司法干部下乡,将已审结的19名反革命罪犯材料交给群众讨论、量刑,并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建立起4个村的治安保卫委员会。至此,两县的清理案犯工作基本结束。

至9月10日,房山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79名。其中判处死刑的134名,判死缓的10名,判处有期徒刑的110名,交群众管制的20名,转他县处理的5名。良乡县至10月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21名,审结140名,其中判处死刑的71名。至此,房、良两县第一阶段镇反工作结束。

房、良两县经过第一阶段镇反,严厉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摧毁了一些反动组织。比如房良两县公安局与涿县公安局相互配合,在通专公安处领导下,1951年6月破获了以肖永祥、陈士新为首的“华北青年戡乱救民先锋队”反动组织,逮捕了肖永祥、陈士新等20名反革命分子。8月1日,良县公安局

破获了以国民党团长郑祖尧为首的“救国会”反动组织，逮捕了郑祖尧、刘春、朱宪章3名首要分子。

第二阶段，（1951年11月——1952年10月）。第一阶段镇反之后，房、良两县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运动发展不平衡。敌人基础较强的地区，应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尚在逍遥法外。如常玉、马静波等已潜逃香港；以霍孝昌、纪德财为首的土匪依然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少数群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思想顾虑。房山县委根据省、地委指示，组织力量进行典型调查研究。其情况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127个村。这类村群众发动起来了，应捕反革命分子79名，实捕68名；第二类82个村。这类村镇反工作不彻底，应捕139名，实捕61名；第三类18个村。这类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应捕170名，实捕18名。此外，全县还有一批在逃犯尚未追捕法办，反动会道门组织还没有全部摧毁，管制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未能走上正轨。

1951年11月，房、良两县县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贯彻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部署第二阶段的镇反工作。随即派出干部分赴重点地区宣传、指导镇反工作。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严格捕杀手续。在镇反比较彻底的地方，则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大会，让群众检查本村不彻底的方面和部分，把检举揭发引向深入：在反动会道门基础较深、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地区，结合公开逮捕，再一次组织取缔、打击。与此同时，各村继续进行健全、巩固治安保卫委员会工作。12月，两县公安局组织统一行动，公开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共56名。本月，房山县共建立治保会232个，收到群众控诉1673件，检举反革命分子343名（其中51名有血债）。1952年5至6月间，两县分别成立了清案办公室，至7月底，共清理积案250件，为第三阶段镇反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三阶段，（1952年11月——1953年9月）。房、良两县第二阶段镇反期间，正值全县开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两县公安局以主要精力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以保证“三反”、“五反”运动的正常运行。这种形势下，镇反工作还不平衡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转入地下进行破坏，仍有一些反革命分子在逃。

1952年11月，房、良两县召开了公安工作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公安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把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一切不彻底的方面都进行彻底”的方针，结合本县具体情况，分别制定了继续镇压反革命计划，开始了全县的第三阶段的镇反工作。两县按照省公安扩大会议的部署，认真总结前两个阶段镇反情况，确定镇反不彻底的村庄和不彻底的方面，组织力量，再次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核实、查证材料、掌握证据。采取随报、随批、随捕与统一行动相结合的办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9名。与此同时，两县公安机关按照既定部署，对治安保卫委员会建设和管制工作普遍进行了检查整顿，为巩固镇反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镇反

房、良两县大规模镇反运动结束后，一些潜藏较深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不甘心失败，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尤其是1955年春季以后，反革命活动更为猖獗。比如：焦庄村坏分子毒害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李君全家（经抢救未造成死亡）案，北坊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水车被砸案，岗上村一伪保长鼓动群众退社等。房山县发现8名反革命分子逃往海外，有的特务分子隐瞒身份，伪装积极，混入我基层组织，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如蔡家口村的蔡××1948年参加特务组织，后混入革命组织，当上了公安员、党支部书记等职，勾结地主富农抗卖余粮，破坏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北正村反动道徒陈××煽动群众退社，说：“要挨饿入生产社，单干户吃大肚”。坟庄村地主分子冯××用刀扎坏农业生产合作社胶轮大车轮胎等。

1955年4月，两县公安局根据公安部指示精神和河北省公安厅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

摸底计划,把调查的重点地区确定在:政策不易贯彻和镇反不彻底的落后乡;铁路两侧、边沿山区、县结合部地区、集镇。重要方面放在财贸、交通、文教等部门和厂矿、企业单位,合作社和粮、棉仓库。主要打击对象是漏网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解除管制、自首登记等宽大处理后又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改,继续欺压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军、警、宪、政人员中的骨干分子;有现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主、富农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惯盗、惯窃、杀人犯、恶棍、赌棍等现行犯罪分子。自此,两县全面开始了第二次镇反斗争。

房山县公安局根据通专公安处《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重点地区摸底工作计划》,于1955年6月成立镇反办公室,并以敌情较复杂的赵各庄乡为试点,摸出应捕反革命分子5名、刑事犯罪分子5名。8月,房山县委成立镇反委员会。9月,制定《一九五五年第一批搜捕行动计划》,组织160名专门人员,分成4个大队,对已批准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搜捕工作。至年底,全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55名、刑事犯罪分子67名。同年,良乡县公安局分两批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共82名。

1956年1月,房、良两县分别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贯彻省第四次公安会议精神,又一次部署镇反工作。会上,批判了保守、右倾、麻痹、轻敌思想,分析了当前的敌情,明确了1956年公安工作的任务,具体研究部署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保卫工作。

当时的情况是: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反革命的社会基础经过几年来激烈的斗争,已经大大削弱了。但是反革命残余分子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并且还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要把反革命分子全部肃清,要把反革命社会基础彻底消灭,是需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迅速发展,那些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反革命分子,必然进行抵抗和破坏。帝国主义和蒋匪特务间谍机关,正在利用一切空子向我派遣特务间谍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在农村,敌人破坏的主要目标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根据以上情况和省公安会议部署,1956年两县的工作是:(一)组织力量侦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破坏性案件,清查混入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二)继续组织打击反动会道门的现行破坏活动;(三)通过清理敌伪档案,审讯在押犯,发现和侦破一批国民党特务潜伏组织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形成有组织的案件;(四)通过对旅店业、旧货业、摊贩,以及无业游民等的调查摸底,从中发现和逮捕一批反革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至1956年11月底,良乡县公安局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8名、各类刑事犯罪分子56名。其中,有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于1948年解放时畏罪潜逃的伪县长杨立天,有10余条血债畏罪潜逃的伪还乡团中队长田增。至1956年6月底,房山县公安局共逮捕反革命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计150名。

在进行上述清查打击工作的同时,两县公安局在县委、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月25日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农村中“只有轻微罪行已经悔改的分子、刑满释放后表现好的分子,以及虽有罪行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立有显著功劳的分子”开展规划入社的工作。采取群众评议、政府审查的方法,将表现较好勤劳生产的定为正式社员,改变其成份,定为农民。表现一般的定为候补社员。表现差的仍由群众管制生产,此类多为被判以行政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这些政策一经贯彻执行,一至四月间,房、良两县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135名。如:房山县原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赵树章自首后,交待了自己所领导的5个区分部的组织系统和48名国民党员,并检举出9名潜伏在国家机关中的区分部委员。至8月底,房山县共有99名反革命分子、78名敌伪人员和1名刑事犯罪分子自首。

1956年9月开始,根据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房、良两县镇反工作全面进入清案和复查阶段。9月下旬,两县均成立了由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组成的清案复查办公室,开始对已批未捕、已捕未起诉、已起诉未判、久押未决的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复查。复查的范围是1955年1月1日至1956年6月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至12月20日,两县按照上述复查范围和内容,对244

名案犯逐一进行复查。对复查出的问题均严格依照有关政策界限和法律规定给予改正，特别对一些冤案、错案，分别做了平反、纠正处理。

此后，两县公安局把侦破、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逐步转入经常性工作之中。

内部清理

房、良两县解放时，原有厂矿等企业多由人民政府原封接管。国民党、团组织和特务组织，以及反动会道门等封建组织遗留其中。特别是国民党最后溃败时，大批突击发展党团特务组织，并组织潜伏。当时，工矿招工审查制度不严，致使社会上一些逃避斗争的反动地主、恶霸、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乘机混入藏身。经调查，房山县 257 个村的 516 名公安员中，有 50 名历史上有问题。他们当中有的暗中与反革命分子联系，将我方逮捕计划通知逮捕对象等。

1950 年 11 月，房、良两县大规模社会镇反运动开始后，各厂矿对广大职工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和意义的教育，开展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活动，感召和震慑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1951 年初，房、良两县在工矿企业内开展了清理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清理审查的重点对象，是来历不清的人员和反动党、团、特、军、警、宪人员以及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当年 8 月，整风审干和民主改革工作在房、良两县全面展开。

经一个月的清理工作，两县厂矿、机关、学校等一些内部单位，共发现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115 名（房山 64 名、良乡 51 名）。根据本人材料，除 2 名逮捕外，分别做了调动、参加省训班、戴罪立功、留职反省等处理。

1952 年，根据河北省委进一步清理“中、内层”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清理“外层”是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两县于 7 至 9 月，在房山县采石场、银行、卫生院、粮食局、邮局、供销社等 7 个系统，共发现有历史问题的人 159 名：良乡县机关、学校等 11 个单位、工矿企业等 8 个单位共发现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72 名。经审查，两县对其中有血债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 6 人给予逮捕；送省政训班 7 名；清洗回家 4 名，其余大部属一般历史问题。

1953 年，房、良两县根据华北人民政府公安局《关于基建系统结合冬训清理反革命工作方案》精神，结合继续清理“中、内层”反革命分子工作，开始对基建系统进行调查摸底。良县公安局在县总工会、联运栈的配合下，通过对县 210 名搬运工进行登记审查，共发现一般顽伪党团分子 77 名。按照党对技职人员“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启发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由本人做出交待。

1954 年，两县清理“中、内层”反革命分子工作深入发展。根据全国第六次公安会议精神，良县公安局于 9 月组织 16 名干部，分 4 个工作组，分头到铁路沿线 58 个村中，结合三秋生产，对被管制分子进行了审查。通过对 58 个村的调查，共发现顽伪党特人员及反革命嫌疑分子 572 名。其中，有造谣、反攻、抗拒改造等现行活动者 22 名；来历不明、历史不清者 8 名。

1955 年 3 月，根据河北省委清洗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总体安排，房、良两县内部清理工作重点是在交通系统、财经系统和文教卫生系统。两县分别成立了清理委员会和办公室。至年底，房山县共发现历史反革命 30 名、一般历史问题者 175 名、重点调查对象 12 名、敌对分子 44 名。良乡县共发现历史反革命分子 76 名，一般历史问题者 145 名，为清理工作奠定了基础。1955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房、良两县全面开始。9 月 1 日，中共良乡县委发了宣传提纲。9 月 16 日拂晓，房、良两县分别采取统一行动，对已批准逮捕的共 135 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了逮捕。

1956 年，房、良两县公安局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继续严厉打击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同时，组织人力积极投入肃反工作。良县公安局 1956 年在文保系统通过肃反工作，共发现反革命分子 56 名，按

照党的政策对其中 51 名做了宽大处理。

1957 年底,房、良两县肃反运动基本结束后,两县公安局仍把内部单位肃清反革命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任务,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初期。

(《房山文史资料》第 13 辑)

建国初期房山县委的组织员工作

刘占武 黄启才 刘悦

1951 年初,中共房山县委根据河北省委指示(当时房山县属河北省管辖),县委从在在职干部和农村党支部中抽调一批党员骨干,组成专职负责党务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组织员队伍。到 1952 年底,房山县委共送通县地委党校学习培训过的组织员达到 120 人,形成了一支很强大的党务工作骨干队伍。

组织员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建党,完善党的组织,发展党的队伍,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巩固加强农村的政权建设。

当时房山县的平原地区刚刚解放,农村的基层政权也刚刚建立起来,土地改革基本结束,清剿残匪和镇压反革命工作没有完成,仍有小股敌人还在暗中活动。党的组织及党员刚刚由长期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各项制度还很不完善,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一部分党员在胜利面前产生了一种享受思想,某些党的组织中存有组织不纯的现象,甚至个别组织中还存在着极少数的坏分子。

以上这些问题虽然数量不大,但问题的性质和对党组织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如不很好地加以解决,就会影响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甚至影响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搞好生产提高人民生活都会成问题。所以河北省委指示:要在全省从 1951 年开始至 1953 年底,用三年左右时间,重点对二、三类农村党支部和新解放区新建立的党支部,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一次整党、建党工作。当时房山县共有自然村 182 个,党支部 181 个(另有一个村是个别关系村)。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县委将 120 名组织员划分为 25 个工作组,县委建立了整党工作办公室,一次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整党工作在全县开始了。

由组织员组成的这支党务工作队(整党工作组)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从 1951 年开始,常年吃、住、工作在农村。他们以整党工作为中心,结合县委、县政府发出的指示,努力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任务,逐步锻炼成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这些组织员的工作很艰苦。首先是在机关、农村没有职务;第二,没有办公室;第三,县里没有宿舍,回县汇报工作、开会、培训都要到县城的四街两关派住民房。另外,下乡工作没有交通工具,完全依靠步行。吃饭完全到农民家吃派饭,没有任何补贴,长年没有星期日,工作、生活都比较困难。

1952 年,为了完成南尚乐、镇江营等十二个村的整党任务,组织员们一直忙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七。又接到县委指示,马上赶到县城,参加县机关“三反”、“五反”运动,并总结整党工作。因此,大家都没有回家过年。当时,通县地委决定:由房山县派出两个打虎队。一支队伍去矿务局房山煤矿和坨里运煤站帮助“三反”工作,另一支派去保定参加省委“三反”工作。两支工作队(打虎队)共 20 余人,都是由组织员中派去的。留在房山县内的组织员组成了若干个“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打虎队”,直接在县委

领导下参加各部门的“三反”运动，一直到“三反”结束。

县委要求，组织员下乡整党必须做到“三同”（就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严格纪律。做到“四不”（就是不挑食、不怕脏、不怕累、不说怪话），群众给什么吃什么，这是共产党革

命工作的主要作风。要求每个组织员在本工作组互相监督努力工作。由于长年下乡搞农村整党工作，没有时间洗洗衣服、理理头发……，所以组织员每次回县汇报工作，或工作结束回到县城，大家都跟他们开玩笑，称他们为“老花子”。在回城的两三天的时间，他们住在四街两关民房内，要抓紧时间洗衣服和理发，开会汇报就算休息了。如有特殊原因需回家，要经组织部长批准。就这样，每个干部都非常高兴，认为具

1955年9月27日，中共房山县委组织员合影（刘占武 提供）

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共产党和革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有个组织员家属在城关住，下乡回来连家都找不到了，因为家属早就搬家了。组织员刘悦准备结婚，借回县集中的机会，经组织部部长批准把新娘子接来房山，在马家胡同找了一间房子，组织员和领导晚上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抽几根烟，吃几块糖，就算结婚了。刘悦次日就下乡了，新娘子又自己回了娘家。新婚夫妇还十分感谢大家和领导的关怀，心里非常高兴。有的组织员由于下乡工作忙、任务紧，家中老人有病，媳妇生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

1952年夏，山区一部分村整党工作开始了，组织员要下乡到十渡、蒲洼、宝水、霞云岭等十个乡。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大雨瓢泼，整整下了两天的时间，拒马河的水上涨了，桥被冲断了。下乡的组织员背着行李，艰苦地步行去蒲洼等村开展工作。到了千河口，顺拒马河往上走根本不行了。十几名组织员下决心一定要到达蒲洼，实在不行也要赶到六渡村。于是，他们和老乡联系研究怎么办，结果只能走“狐狸险”（“狐狸险”意思是这条险路就是狐狸从这走都不好走，危险得很）。雨停了，郭维郊、田志丰、隗甫太等同志决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走“狐狸险”。几个同志头里领路，其余人紧跟着爬上了高山。到了“狐狸险”一看，这段路根本不是路，整个面前是大山崖，上突下直，往下看山岩直插翻起大浪的拒马河，只要掉下去就有丧命的危险。大家下定决心，背起行李包，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往前行走，最险的一段有八丈远。这段路要手扒着崖石缝，脚尖蹬着只有一脚大的石头窝子，走一步后再找下步手和脚的一点位子。真是太危险了，但是还要走。如果想到停下来，身上一松劲会更危险。郭维郊喊了一声：同志们，一定要用手抓着石缝把脚蹬住，还有一丈多远就过去啦！大家互相鼓励着，累怕交加，手脚都酸了，哭的心都有。就这样，冒险过了真是狐狸都不敢过的“狐狸险”，过后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了地上，有的流下了眼泪。大家休息了一会儿，背起背包又穿过几道高山险路，到了六渡村。县委派人用电话往区里联系，才知此情况。县委书记李明、组织部长高华兴知道此情况，俩人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次日，都到达了自己的整党工作岗位。

邢玉生、郭维强、马献库、赵振月四人由西庄村出发去平峪，过河没法过，最后找到了晋德兴。晋给找了一架梯子，上边绑上一个大筐箩，人坐在上边过河。因为水流湍急，一下把筐箩冲跑了，四人急得狠抓住梯子不放，衣服、背包都湿了，最后找来绳子捆上梯子才把人拉过河。

工作队刘振存等几个同志去霞云岭，下午四点出发，到黄山店天快黑了，只好在供销社买上手电、食品趟水夜行，爬棺材山，整走了一夜，到达目的地天已经亮了。村干部们感动地说：“你们太辛苦了，你们真行……”

组织员在整党工作中与群众实行“三同”，既密切了党群关系，又解决了党心民心相符的主要问题。有的组织员带病坚持工作，刘悦同志发高烧到38度多，躺在屋内，房东大爷、大妈亲自煎药送到病人面前。还走几里路找医生，把自己的新被子给病人盖上，做面条、饺子一口一口地喂……。还有一位组织员患病夜里去厕所，大小便全拉在裤子里了，衣服没的换，房东老大妈把她儿子的棉裤拿来，硬逼着换上了，并亲自把棉裤刷干净，用火烤干。老大妈说：“我们知道你们工作忙，没时间回家，我这里就是你的家……”，组织员抱着老大妈叫了声“我的亲妈呀……”。

组织员的物质待遇也比较低。1951年前享受的是供给制，120斤小米补贴。1952年定级改成薪金制，每月20多万元(折合现在人民币20多元)。

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组织员苦干了三年多，完成了全县的整党任务。在总结整党工作时，县委书记李明、组织部长高华兴、副县长隗和友等领导对大家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积极工作、不怕牺牲的精神予以肯定，并给予表彰。三年的整党工作加强了党组织的建设。据1953年的统计，共整顿25个党支部，465名党员受到教育。有16名被开除党籍，3名被劝退，3名被撤销候补资格。如西周各庄村的孔庆树，曾当过房山县日伪军团长孔宪江的护兵。还有宝水村的张国权，是杨天沛(王家台事变的罪魁祸首)手下要人，曾将我八路军某部王排长等4人抓住后交到霞云岭敌人手中杀害。整党中将孔、张二人开除党籍，最后予以法办。三年的整党，纯洁了党组织，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巩固了政权，还培养了大批党的积极份子，吸收新党员485名。

整党工作完成后，组织员又被县委派到各条战线参加中心工作，如撤区划乡、统购统销、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还有些组织员到乡、镇担任了领导职务，成为基层政权的领导骨干。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作者黄启才系原房山县农业局局长、刘悦系原区老干部局副局长

五十年代的房山县人民政府文印打字工作

宋 湘

文印打字工作是机关文秘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房山解放后，县人民政府秘书室下设文书室，编制2人。人员调动、新旧交替的较短时间内有时3人，有时1人。县政府所属各科、室的上、下行文，凡需印制3、5份以上者，由科、室领导签署同意后报县长审核批准(一般是秘书代县长行使审批权，由秘书划“行”，

加盖县长方印)后交文书室刻写印刷,再交有关科、室发出。

文书人员多是刚参加工作的十几岁的小青年。由于终日接触各科、室的上报、下达文件,耳濡目染,逐步学到许多撰写各种文件的知识,文字书写功夫也迅速长进。少则一、二年,多则三、四年,大多调到各单位充任文秘工作。

我于1952年底参加工作,1953年2月分配到县政府文书室与杜义、赵文瑞一起工作。在这之前,从文书室已陆续调出荣月、李浩、王宗周、张秀峰、张德惠等人。

当时,文印工作完全手工操作。用铁笔在一块钢板(上有布纹,一面是平纹,一面是斜纹)上刻写腊纸,刻完后按领导批示份数用油印机印刷。油印机是中间镶有玻璃(比八开白纸略大)的木板作底,将预印的白纸卡放在底板上。上面是个长方形木框,中间安有纱篦子,可将腊纸固定在纱篦子上。上下两部分有轴连接,可以上下开合。在一块玻璃板上摊以适量调制好的油墨,右手持一木柄胶滚,滚好油墨,再在纱篦子上滚动,一张一张地印制。每天重复着这样看似枯燥的劳动,但潜移默化地学到许多知识,却也乐在其中。

1954年10月我调到县委文书室工作。1955年夏,县政府(当时称县人民委员会)购进一台从德国进口的中文打字机,这是房山有史以来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县政府文书白士臣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到政府参观。面对这个新奇之物,谁也不知如何驾驭。请来见过世面的职工业余学校杨志奇老师作指导,我们才初步知道了如何使用。没过几天,领导决定把这台打字机调到县委,我有幸从此成了打字员。但毕竟初学乍练,效率还不高。入冬,从通专调来打字员王宽。此后,打字以王宽为主,我仍担任刻写,并继续学习打字。1956年春,县人委又购进第二台德国进口中文打字机。我也被调回县人委,成了县人委第一任打字员。此后,白士臣调出,白秀顺、王俊起相继调入,文书室也改称文印室。

1956年秋,县人委购置了房山第一台国产手摇式滚筒印刷机,代替了木制油印机,从此减轻了体力劳动。直到1957年5月我调到县法院工作。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房山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王硕儒

195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后,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要求各县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试点工作。房山县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并于同年8月14日开始在一区夏村乡进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试点。试点工作到9月28日结束,历时一个半月。

试点工作在县选举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以县委组织部长高华兴为中心组长的15人的中心工作组进驻夏村乡。

夏村乡由夏村、双柳树村、梨园店村三村组成,共902户,4037人,其中男1927人,女2110人。全乡有地主24户,富农23户,其他被管制分子12名,道会门组织及国民党军政人员700余名,约占全乡总人口20%。全乡1948年底解放,1949年冬完成土地改革,1953年5月新建乡政权。虽然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但三村均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经过了第二批整顿,在生产上已建立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夏村王力为社长的合作社、双柳树村李春长为社长的合作社)。双柳树村是全县公认的模范村,工作基础比较好。试点工作正处于农忙季节,既要按时完成选举试点任务,又要保证三秋生产不误农时。

这次试点工作,共分四个阶段进行,即准备阶段;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阶段;候选人提名及召开选举大会阶段;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阶段。最后还要做一些善后工作。

一、准备工作。主要是宣传贯彻选举的意义、目的、政策和做法,安排生产,稳定乡、村干部和群众情绪;成立夏村乡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物色和训练技术员(登记员)和审查员,组织乡、村干部学习文件。

为搞好试点工作,乡党总支首先召开会议,制定工作方案。经讨论研究,确定乡党总支书记、团总支书记、妇联主任、民兵中队长等7人和县中心工作组长高华兴、县政府民政科长陈希亭共9人组成乡选举委员会,陈希亭任主席。同时,根据人口居住情况、干部力量和每选区产生两、三名代表的规定,提出全乡划13个选区,每选区人口200人至400人左右,并根据全乡人口初步确定应选乡人民代表名额为39名。从每个选区挑选一名了解本选区情况,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技术员;挑选出一名政治可靠,立场坚定,办事公道,具有一定审查能力的审查员。每个选区由技术员、审查员和一名县工作组组员共3人组成选区工作小组。对生产和选举试点工作的步骤做出全面安排。在生产上确定以两个农业社和每选区一个互助组为重点;选举试点以宣传普选为中心。中心工作组中乡、村干部适当分工,实行生产和选举试点划分两条线。

其次,召开各支部党员大会,贯彻乡党总支会议精神,并对选举试点工作具体部署。乡选举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明确任务,并正式开始办公。

第三是组织乡选举委员会成员、乡受补贴干部和选区技术员、审查员集中学习。为尽量少影响生产,占用5天,每天半天时间,由中心工作组讲课。主要学习省委有关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的指示、《选举法》、《选举草案说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填表说明》等。通过学习,统一了思想,提高了业务水平。为使这项工作家喻户晓,接着召开了村干部、团员、宣传员、民兵、妇女、老年人等不同会议,宣传选举试点工作。宣传主要依靠原有党的宣传员,逐渐扩大宣传队伍。全乡原有宣传员80余名,经过5天时间队伍扩大到470余名,如十二、三岁的小孩和60多岁的老太太(王兴之母、张庆仁之母等),都参加到宣传队伍中。宣传开始,有人说:“选举还不是老一套,什么民主哇!上边安排好了,大家一呐喊就得了。”经过广泛的教育,多方面的解释工作,这种认识基本上得到了扭转。

二、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人口调查要求不重不漏,选民登记要求正确无误。人口调查工作比较顺利,主要工作放在选民登记和资格审查上。这一阶段,除继续宣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行使好民主权利外,同时教育群众如实进行选民登记,特别是登记的年龄要实事求是。大部分群众都知道年满18周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就在实报年龄上有些群众有顾虑。有的过去瞒报了年龄,再实报怕追究责任;有的正在上学,怕年龄大影响升学;有的怕被选为代表当干部;有的怕到了成年人要负担社会公益劳动;还有大龄未婚青年怕实报年龄影响结婚等。针对以上情况,以村或选区为单位,召开了党、团员、民兵、青年、妇女等不同会议,对不能参加会议的人宣传到户,重点宣传选民登记要实事求是的道理。经反复工作,大部分取消了顾虑,但仍有个人不愿实报年龄。如有个上学的青年,经调查已满18周岁,直到公布选民榜后,他自己还从选民榜上撕掉了自己的名字,经工作组的批评教育,予以改正。

在宣传教育的同时,各选区的技术员做好登记工作的一切准备,根据选区人口多少,每个选区再聘请一、二名助手协助工作,并选择几户先行实习,熟悉后再全面开始。在人口调查的基础上,对年满18周岁以上

的人进行选民登记。边登记、边审查。

在选民资格审查过程中，主要是不让每一个公民被错误地剥夺选举权，也不能让一个不应给选举权的人得到选举权。对选民资格的审定，有些党员、干部有个认识的过程，如有个村干部在审定选民资格时说：“那老太太可厉害，长着一脸横肉，不能给她选举权。”因此，工作组反复交待政策，不能感情用事。同时密切与县公安局配合，按已掌握材料，依靠骨干分子，或工作组和法庭干部直接参与调查取证。各村召开两、三次党员会，对选民资格进行确切地分析，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经党总支委员会对照政策逐个确定，交群众讨论，村代表会通过，报县政府批准。全乡被剥夺选举权的地主分子54名，富农分子6名，其他被管制分子4名，共计64名，占全乡总人口1.5%，占选民总数3.1%。另有失去正常行使政治权利的精神病患者8名。其间严格区分精神病患者和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严格审定登记。

为保证选民自由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受理有关选举的诉讼案件，除口头宣传外，在全面进行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前两天，由县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庭正式成立及其工作范畴。

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后，又进行逐户复查，无误后再张榜公布。公布选民榜有两种形式：双柳树村因村小、人口少，在各选区张贴全村的选民。夏村、梨园店村以村为单位贴一张总榜，分选区公布本选区的选民，方便选民看榜。

选民登记结果：全乡共有选民2158人，占全乡总人口53.43%，其中男选民970人，女选民1188人。选民按最后划定的小组进行选举。

三、代表候选人提名和召开选举大会。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提出应选代表的候选人名单和选举正式乡人民代表。既要让人民群众选自己所爱戴的代表，又要防止不称职的人当选。工作组广泛宣传选好人民代表的重要意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提候选人前，中心工作组和乡党总支对各村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采取相应的方法。双柳树村党的集体领导较强，群众政治觉悟较高，则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由选民小组提出人选，在村干部会和选委会上，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再交选民小组讨论，思想统一后确定为正式候选人。群众居住分散，党的组织基础较薄弱，则采取上下相结合的方法，即由选委会邀集乡党总支委员、团总支委员、学校团支书、农业社社长等人协商，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交选民小组讨论。选民小组见到名单后，对候选人名单上的人提出意见。根据选民的意见，选委会两次修改名单，第一次就更换9人，充分体现了选民的意志。

在提出候选人名单之前，乡党总支委员会对代表候选人名单认真研究，做到心中有数。随着选民的发动，出现给代表候选人提意见是必然的事，这给工作组帮助干部分析，给乡、村干部在党内或群众讨论会上作检讨，求得群众谅解提供了机会。但有的意见带有片面性或报复性，针对情况，中心工作组和乡党总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作说服教育工作，一方面进一步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地处理。

正式候选人名单，在选举大会召开前5天公布，同时公布选举大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在这5天过程中，主要是进行选举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为争取最高的参选率，相继召开了党员、团员、民兵、妇女、选民组长等各种会议，动员选民积极参加大会，由选民组长具体作好组织工作。

选举当天，先在双柳树村两个选区进行试点，全乡试点干部和乡脱产干部全部参加，就地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在其他选区普遍开始。选举的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参加选举大会的选民，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以解决有些选民不会写字的困难；一种是投票选举的方法，主要是解决实在不能出家门的选民不能参选的困难。选票由乡统一制定，由选区工作小组带选票到户进行。

选举结束统计，选民参选率达98%，其中到会以举手方法选举的占90%，未到会用选票选举的占8%。选出乡人民代表39名，其中女代表8名，少数民族代表1名，党员19名。当选人民代表中原基层干部33名，占84%。

四、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总结建乡以来乡政府的工作，处理代表提案，选举乡政府组成成员。在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先召开乡党总支委员会，根据分支和代表酝酿情况，正式确定乡政府委员候选名单，通过提案整理意见，决定大会的时间和地点。然后以村为单位召开当选代表座谈会，研究征集提案的方法。

乡政府的工作报告，由中心工作组抽出两人协助乡脱产干部准备；对代表提案的处理，由三村工作组和县政府有关部门抽出部分人组成提案审查和处理小组。代表提案共分四类，即生产、教育、水利建设、干部作风，共计 30 余项，逐项提出处理意见。

筹备工作就绪，乡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开始由乡选举委员会主持召集，当场推选出大会主席团，然后宣布选举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由大会主席团主持大会。在大会上，由乡长报告了乡政府的工作，提案审查处理小组作了提案处理报告。大会用投票选举的方法，选举出乡政府委员，同时产生乡长 1 人、副乡长 2 人、委员 8 人。其中党员 8 人、女委员 1 人。有 8 人为原政府成员，占 72.2%。

乡政府成立后，中心工作组用 4 天时间进行一些后期工作。主要是开好第一次乡政府委员会，调整乡级组织，加强新、老干部的团结工作，特别是对落选和调整下来的干部多作教育工作，并给予适当安排。自此，整个乡的各项工作在乡政府领导下逐步展开，走上正轨。至此，试点工作告一段落。

二

房山县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普选工作，是根据夏村乡的试点经验进行的。从 1954 年 2 月 22 日开始，经过宣传准备、入门调查、选民登记和审查、选举等阶段，到 3 月下旬结束，历时 32 天。全县共计 33006 户，原有人口 159662 人，经过人口调查，总人口实有 150361 人(其中男 76614 人，女 73747 人)，比原有减少 9301 人。经过选民资格审查：全县改变地主成分的 337 人，占总数的 13%。改变富农成分的 3863 人，占总数的 73%。经过群众讨论，并报房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全县剥夺选举权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共 1260 人，占选民总数的 1.6%。全县共有选民 85978 人，(其中男选民 42501 人，女选民 43477 人)。参加选举人数为 81129 人，参选率达 90.4%。选举结果：全县 70 个乡、镇(68 个乡、2 个镇)，共选出乡、镇代表 1700 名，其中男代表 1417 名，女代表 283 名。在代表中，中共党员 1012 名，团员 201 名，群众 487 名。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 110 名，社员 91 名，生产互助组成员 1477 名，少数民族代表 22 名(回族 6 名，满族 16 名)。

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的。为了搞好县代表的选举工作，县选举委员会培训了 8 名干部，在平原顾册乡、山区霞云岭乡进行县选试点工作，自 1954 年 5 月 14 日开始，到 5 月底结束，共选出县代表 5 名，其中县机关干部 1 名，军属 1 名。在此基础上，从 6 月 8 日开始，集中时间，全面进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

县代表名额的确定与分配：全县 70 个乡、镇(2 个乡级镇)，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其中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 130 个，8103 人；烈军属和荣转军人 12318 人；有回、满等少数民族。另有教职员和学生 30550 人，工商业户 724 人，医务界 510 人。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42 名。在名额分配上，既要考虑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又要照顾到代表的广泛性、地区性，女代表要占一定的比例，并要吸收工农业劳动模范、烈军属、荣转军人、工商、文教、医药、少数民族等代表。对各方面代表名额作了适当的分配。

选好县代表，首先加强宣传教育。县利用两天时间，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会议，布置夏收和县选工作。然后，由县统一组织力量，分区作具体布置，并按片或联乡训练宣传员，结合夏季生产开展县选的宣传。通过宣传，要求人民群众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明确政权在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中的重大作用，明

确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对乡干部主要是进行民主作风的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批判党内特权思想和忽视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观点。宣传的方法，以原有的形式和工具为基础，作到宣传员包干到户。宣传的内容强调统一，按河北省委宣传部编写的宣传提纲宣传。除宣传选好代表的重要意义外，还要宣传代表的条件，宣传房山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听取和审议县政府的工作报告，选举县长、副县长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宪法》草案，并根据当前工作作出相应的决议。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一种表现。酝酿代表候选人，选好县代表，是县选工作的重要一环。在宣传深入普遍的基础上，开始酝酿代表候选人。采用由乡(镇)选举单位、中共支部、妇联、青年等组织联合提名，然后召开乡政府委员扩大会，协商确定，以村为单位组织乡代表讨论，交由选民小组座谈酝酿，取得一致意见后，报县选举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名单。从试点经验和一些乡(镇)具体情况看，酝酿候选人注意了四个问题：一是防止村级的本位主义；二是说明妇女、少数民族、特别是民主人士等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三是说明县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县长、副县长和政府委员，凡是本县(不一定是本乡、镇)有公民权的人都可当选为代表，以引起提名单位考虑具有领导全县工作能力的部分机关干部；四是提候选人时要比条件，但对少数民族、妇女、特别是民主人士要适当照顾，不能只比条件。

候选人名单公布后，在正式选举前，以乡、镇为单位召开了筹备会，讨论确定选举日期、地点、典型发言人、会场布置等事项。然后，按照确定的时间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正式选举。选出代表后，进行大会发言，对代表提出要求。代表也在大会上表态。有些乡、镇的选举大会，还吸收不少群众列席，以引起人民群众对代表的重视，密切了人民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选举结果：全县共选出县人民代表 142 名，其中工人(包括店员)代表 2 名，占 1.4%；农民(包括农业模范 6 名，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10 名)代表 101 名，占 71.2%；县、区机关干部(包括武装)代表 28 名，占 19.7%；教育、科技、文化界代表 5 名，占 3.5%；医药界代表 3 名，占 2.1%；工商业者代表 3 名，占 2.1%。在代表总数中，妇女代表 29 名，占 20.4%。生产互助组织代表 101 名，占 71.2%。少数民族代表 2 名，占 1.4%。民主人士代表 11 名，占 7.7%。

6 月下旬，选举工作全部结束。

(《房山文史资料》第 13 辑)